

前 言

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由于国民党不允许我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一批同志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整个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与需要，决定撤销武汉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南方局正式成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因南方局主要领导成员均先后离开重庆，经中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主持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

ZQ42/10

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将南方局改称重庆局，中共代表团成员即为重庆局负责人；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代表团东迁南京，对内即为南京局；四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在中央和南京局的领导下，负责领导川康云贵各省党的公开与秘密工作。

南方局的首要工作是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当时南方局的负责同志都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对我解放区制造军事磨擦，发动武装进攻，一九四一年一月，发动了围歼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破坏我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迫害进步力量，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多次激化。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了国内国际各方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并配合解放区军民的奋勇反击，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迫使他们不得不坐下

来谈判，从而，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与此同时，南方局大力加强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发展壮大进步势力，争取了广大中间势力，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南方局还开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国际舆论同情，广交了外国朋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围绕着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南方局又根据中央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奠定了基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南方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组织，积极加强党的建设，壮大了党的队伍，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南方局所辖有四川（川东、川康）、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党组织。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大都是在抗战开始前后的救亡运动中恢

复重建和发展起来的。南方局领导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又坚决地、及时地领导各地党组织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撤离、转移已暴露的干部，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要求地下党员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实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备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等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斗争方式。荫蔽方针和“三勤”、“三化”的贯彻执行，使地下党的工作更加扎实，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站稳了脚。尽管国民党不断加强特务统治，图谋消灭我党组织，但绝大多数地区党组织仍然保全了领导机关和主要骨干，积蓄了革命力量。在以后的斗争中，特别是在迎接解放的最后决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通过党领导和影响的各个群众团体、学术机构、学校阵地、新闻报刊，以及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美术等文艺活动，通过南方局领导人的演讲、谈话和文章，通过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宣传教育。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我党

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广大工青妇基本群众、爱国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常常是通过阅读《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来了解时局真象，掌握前进方向，吸取精神力量。南方局领导的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争取了多数。许多人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南方局领导了华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了广东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南路人民游击队等几支武装部队，开辟了敌后游击根据地。同时，南方局还根据中央指示，逐步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工作，发展了许多农村工作据点，掌握了部分武装，准备对付日寇的进一步入侵。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党组织都开展了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敌人。广东、云南、滇桂黔边、粤桂边、闽粤赣边、黔北等地的人民武装进一步发展成为强有力的正规部队，列入人民解放军的正式建制，在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南方局从开始就十分重视并加强军事统战工作，团结和推动国民党中许多爱国将领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支持民主运动。解放战争中，这些爱国将领大都先后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军队光荣的行列。

南方局还领导八路军驻重庆、桂林、长沙、韶关、香港、贵阳等地办事处、交通站和各地《新华日报》分支机构等公开机关，指导他们以合法身份开展各项工作，包括发展统一战线和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南方局在长期的斗争中，从各个方面培养了大批干部，也树立了良好的作风。许多干部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重要骨干。

实践证明，南方局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南方局时期创立的伟大业绩，积累的丰富经验，表现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是党的宝贵财富。南方局领导下的绝大多数同志经受了严酷斗争的考验，做出了贡献，不少共产党员和党外志士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南方局党史是整个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南方局的党史资料没有进行很好的征集与研究，因而在各种中共党史著述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林彪、江青、康生之类反革命野心家更是疯狂地对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污蔑与陷害，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被歪曲了的

党的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党史研究工作有了很大加强。一九八三年，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加强了对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得到原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以及各有关地区党史工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加。为了立准立好南方局党史，经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和有关地区党史工作部门协商决定，共同协作编辑一套《南方局党史资料》，并经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列入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的系列。这本《大事记》是其中的首卷本。此外，还将就南方局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运动、军事工作、文化工作和武装斗争等内容，分别汇编专辑，陆续出版。力求以一套较为全面、准确的南方局党史资料提供党史学界和各方面的读者研究参考。

目 录

前言	(1)
历史文献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3)
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局领导成员的决 定(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	(10)
中央书记处关于同意周恩来等六同志为南方局常委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	(11)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组织分工等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电(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	(12)
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摘录)(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14)
毛泽东：论政策(摘录)(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6)
周恩来：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一九四二年一月)	(22)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摘录)(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24)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	(25)
附录：中共四川省委大事记(一九四六年四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	(405)
后记	(439)

历史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亲爱的同胞们！英勇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无限之热忱与兴奋，纪念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的两周年！

两年来，我前方数百万将士，以热血头颅抵抗暴寇，忠勇奋发，劳苦备赏，当此抗战两周年之日，中共中央谨向蒋委员长及我保卫国土之忠勇将士，致崇高的敬礼。

两年来，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而在沦陷区域之同胞，虽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仍群起抗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谨向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致亲切的敬意。

两年来，在火线上，在敌机下，在敌人暴行中，

万千壮士，英勇捐躯，老弱妇孺，惨遭蹂躏，中共中央谨向我民族英烈致沉痛的哀悼，谨向英烈之遗孤遗族致亲切的慰问。

两年来，世界各国人士，或则主持公理，仗义直言，或则慷慨输将，助我抗战，或则抵货拒运，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谨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谢意！

同胞们！将士们！

民族解放战争的两年，对于中华民族是奋发的，进步的，光明的两年。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

强盗侵略战争的两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黑暗的、困难与危机日益增长的两年。两年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的进入了心所不愿力所不及的长期战争中，差不多一百万万的战费，近百万的伤亡，换来了广大辽阔的战区，处处遭受打击的战线，迫近危机的经济状况，孤立失助的国际地位，厌战反

战日益蓬勃的民情，日寇正在这种国力消竭危机四伏的穷途上迈进。

两年抗战的结果，已经最鲜明的显示了：只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团结统一，不畏困难，不惧险阻，力求进步，奋斗勿懈，那末，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而最后胜利的时机，也一天天地更加接近了。

正因为这样，日寇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采取了速和速结的政略。近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集其主力于“扫荡”游击区，对沿海各地作海盗式的袭击，而在前线上部队只能保持相机进取的姿态，日寇侵略之现阶段已侧重于以政治上诱降的阴谋来灭亡中国了，那狡诈无赖的近卫声明，不过是这种阴谋的公开暴露。虽是这种声明，仅获得少数民族败类的无耻响应，而为全国人民伟大壮烈的巨吼所反对，然自此以后，日寇却更积极施行其政治上诱降的活动，它一方面利用丧失胜利信心、阴怀贰志的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另一方面利用国际间对法西斯侵略者惯于妥协的反动力量，企图以此来达到它降服中国的目的。

在日寇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匐敌前，粉墨登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而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故意制造

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布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散布不亡于敌即亡于共的谬论。迹其种种论调与行动，无非是替日寇之诱降灭华为内应，替汉奸之叛国亲敌作声援。盖日寇视中国之进步与团结为灭亡中国之最大障碍，乃不得不千方百计摧毁中国的进步，破裂中国的团结，而这些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起而应之，如捧纶音，蠢蠢欲动。他们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乘间抵隙，便利私图，呼朋引类，奋其魔力。对抗战之各种进步主张与设施，或消极怠工，或破坏捣乱。对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团体，则肆意摧折，不遗余力。对赤忱为国忠贞正义之士，则视为仇雠，排击不休。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思想与文化，则目为洪水猛兽，毁之惟恐不力，去之惟恐不尽。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则更是他们造谣污蔑、攻击陷害的对象，视之为眼中钉，明攻暗毁，无所不用其极。对国家民族前途所赖的青年，则束缚其思想，桎梏其行动。而尤重要者，就是尽力分裂国内团结，制造纠纷，鼓励磨擦，挑拨内哄。其所用手段，则为伪造三民主义，以破坏革命的三民主义；加紧阴谋活动，以分裂国民党；伪造情报，散布流言，以破坏共产党；造作事端，挑拨感情，以离间

国共两党之团结，并引起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嫌隙与裂痕。凡此所为，或直接受命于日寇，或间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达投降之目的而已。盖不仅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亦且因为国共团结乃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三民主义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如不分裂这个团结，破坏这个基础，就不能造成其投降乞和的条件。阴贼险狠，愈出愈奇，国人不能不深加注意了。

至于国际反动力量，那么虽然我国的抗战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各先进人士的同情与援助，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中却存在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私利主义者，存在着想以中华民族为牺牲而与侵略者妥协的阴谋家，这些分子随时准备重演慕尼黑的罪行而以中华民族为宰割之对象。此种现象现时虽尚未表面化，但暗中策动，渐见积极，稍不注意，便有被其牵入圈套之可能。

凡此所述，一则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二则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三则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这就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重要特点，可能的

趋向。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

同胞们！将士们！

今日而与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日寇诱降中国的甜言蜜语，不过是灭亡中国吞并中国的钓饵。投降妥协分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哄，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膝的实际准备。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

同胞们！将士们！

我们以热血头颅所换来的抗战的光辉成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所毁灭所断送吗？我们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所破坏所分裂吗？我们千百万先烈的鲜血，能让它白白的流去吗？我们愿意受日寇甜蜜语言的钓饵，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吗？我们愿意作国际投机交易场上任人宰割的羔羊吗？不，决不！

同胞们！将士们！

我们要：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我们要继续抗战，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

我们要巩固团结，团结得如钢铁一般的强固！

我们要向前进步，进步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要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同胞们！将士们！

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

同胞们！将士们！奋斗吧！我们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

抗战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原载《解放》周刊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合刊）

中央书记处 关于南方局领导成员的决定^①

(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

中央书记处会议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②，参加的名单为：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党报)、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

(摘自《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提供)

①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按周恩来的提议，仍定名为南方局。

中央书记处关于 同意周恩来等六同志 为南方局常委的指示^①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

南方局：

1. 同意南方局名称，以周、博、凯、吴、叶、董六人^②为常委。
2. 如项^③不愿管赣北，江西全部可归南方局管。
3. 同意对鄂西北及湖北省委之提议。
4. 刘晓还未离上海，何人代替他还不知道。上海工作仍归南方局管。

中央书记处

(中央档案馆提供)

①原文系电报稿，标题系编者加的。

②周、博、凯、吴、叶、董六人，是指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

③项是指东南局书记项英。

**中共中央南方局
关于组织分工等问题
致中央书记处电^①**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

中央书记处：

甲、南方局已遵电示开会。组织分工为博古组织，凯宣传及党报，周统战，叶联络，克坚报馆，邓妇女，缺青年请派南翔来^②。

乙、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运输。

丙、川省委暂分川康及川东两特委。川东特委务请派一书记来。沪工作极便利发展，刘晓以不调为宜。

丁、鄂北及鄂西北仍请划入中原局，归豫西省委管理，鄂省委则管鄂西湘西北。

①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文中的博、凯、周、叶、克坚、邓、南翔，是指博古、凯丰、周恩来、叶剑英、吴克坚、邓颖超、蒋南翔。

戊、粵湘均开扩大会，博、叶分别出席，博今早
飞桂转粵。

己、江西区分待与东南局商定再报。

南方局

(中央档案馆提供)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摘录)^①

(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毛 泽 东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

^①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

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原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14—715页)

论 政 策^①

(摘录)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

^①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

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

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

(九) 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 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

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

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20—724页)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 西南党组织^①

(一九四二年一月)

周 恩 来

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以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条件是：

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

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

^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会议最后发了言，这是发言中关于西南党组织的任务部分。

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

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中体现出来。

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

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

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这七点都做到了，我们西南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

(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0页)

中 共 中 央

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摘录)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毛 泽 东

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

(原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38页)

**中共中央南方局
大事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芦沟桥发动进攻，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守军奋起还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严正呼声和日寇对我国东南地区大举进攻的威胁，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宣布了实行自卫抗战。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搁延较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蒋介石的谈话，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庄严履行国共两党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八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总司令、副总司令。九月，组成战时序列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十月，又将分散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叶

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两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在此前后，一些地方设立了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联络通讯处和交通站、兵站。

但是，国民党坚持实行一条不发动群众、单纯军事的片面抗战的路线，对日本侵略者依旧存在妥协幻想，对中国共产党和坚决抗日的团体和群众实行压制和迫害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面抗战的主张，将抗战进行到底，把中国引向民主进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常驻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国民党统治区武汉，公开出版发行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此之前，出版了党的机关刊物《群众》。

一九三八年二月，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三厅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在前线和后方作了大量抗日宣传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八年夏天，国民党在武汉宣布设立国民参政会，中共毛泽东、陈绍禹（王明）、林伯渠（林祖涵）、

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被“遴选”为“文化界”的参政员。参政会没有达到我党提议设立一真正的民意机关的要求，但为了团结抗战，我党七参政员接受了聘请。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均出席，他们和许多抗日爱国的参政员联署或分别提出并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战、进步的提案。

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中，全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特别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后退声中，我八路军在华北首战平型关，奇袭阳明堡等重大战果，大大鼓舞了全国的军心民气。在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上，虽然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统帅部的片面抗战的错误战略，导致节节败退和有生力量的大量消耗，但广大爱国官兵却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相继丧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面临着严重的局面。随着广州、武汉的沦陷，抗战进入了十分艰难的相持阶段。

一九三八年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

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来党的工作的基本经验，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规定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了使党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工作更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域党的各项工作，书记周恩来。

十月七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必须经过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保卫武汉的斗争，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强调：“力量是保证长期抗战的决定条件。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他宣告：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十月八日 《新华日报》重庆分馆（建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举行茶会，欢迎中共参政员、《新华日报》董事会成员董必武。董必武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

有一些对抗战无信心的动摇分子，散布失败情绪，说武汉如果失守，中国便不能再战，这是不明了敌我情势的有害的说法。我们保证在武汉即令失陷，仍是继续抗战。董必武说：《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自然是反映中共的政策主张，但是它还应反映其他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的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的意见和主张。他要求《新华日报》重庆分馆全体同志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时时刻刻把握住《新华日报》是抗战工作的一部分，时时刻刻要以越战越强的精神来开展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 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工委委员、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和列席代表共十四人，陈绍禹、吴玉章出席了会议。扩大会议总结了省工委建立以来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任务。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四川不再成立省委，分别成立川东、川西（次年一月后改称川康）两个特委。川西特委书记罗世文，副书记邹凤平，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程子健，宣传部长兼文委书记郑伯克。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宋林，宣传部长漆鲁鱼，青委书记陈光（杨述）。

十月二十一日 日寇占领广州，进逼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中共驻汉代表

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决定西迁重庆。

十月二十二日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华北前线飞汉口，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商谈军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商讨国共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问题。同时，朱德与周恩来等讨论了当前战局及撤退事宜。

同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大部分同志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率领下，乘新升隆轮船撤离武汉。二十三日，在湖北嘉鱼县遭日机袭击，二十四人殉难，其余同志改乘木船继续西行，辗转到达重庆和桂林。

十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与叶剑英在送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最后一批同志撤离武汉后去湖南。

十月二十五日 武汉沦陷。《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同日在重庆出版发行。《新华日报》总馆迁重庆后，各方面负责人未作变动，社长仍是潘梓年，总编辑华西园（华岗）、吴克坚，总经理熊瑾玎。

十月二十六日 中共参政员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谈话会。

同日 董必武在《新华日报》发表《国民参政会第

二次大会的展望》一文。指出：持久抗战，全民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地位，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以达建国成功，这是我国抗战以来久经确定不移的国策。参政会遵照这一国策，议决政府对内对外的施政方针，实是第二次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

同日 重庆妇女界在社交会堂聚会欢迎女参政员，请邓颖超、史良、刘蘅静三参政员演讲，到会五百余人。邓颖超在讲演中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抗战到底”。

十月二十八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在重庆举行，到会有参政员一百二十一人，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出席。会期十天，于十一月六日闭幕。

十一月十二日 湖南省当局奉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的命令“实行焦土抗战”，深夜纵火焚烧长沙城。周恩来、叶剑英于十三日凌晨离开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去衡阳。十四日赶至南岳向蒋介石指出这一作法之错误，提出善后救灾办法。十六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集干部会议，动员救灾，并指派洪深立即带领政治部第三厅干部和演剧队人员去长沙救灾。十七日，周恩来返回长沙指挥救灾工作。二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坚壁清野》，指出：这种置人民

生命财产安危不顾，而将长沙付之一炬的“火焚”办法，是“无人心的残忍与麻木”，“决不是坚壁清野”。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湖南省南岳召集的军事会议。

十一月二十六日 《新华日报》在重庆举行招待会，招待党政军当局及各界人士，到会来宾百数十人。中共代表和《新华日报》董事会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何凯丰、邓颖超等出席。吴克坚、潘梓年、吴玉章先后讲话，阐明《新华日报》的性质、宗旨。

十一月 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建立。吴奚如、李克农先后担任办事处处长。该办事处是经过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商谈同意后建立的。它负责承办我党我军所需的物资、经费的转运；重庆、香港、新四军之间的人员往来接送；领导桂林地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未建立之前，它还负责联系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香港地区我党的组织。

同年冬 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在广东敌占区周围相继建立。十二月二日，广东惠(阳)宝(安)人民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十二月五日，琼崖红军游击队根据国共双方谈判协议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

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大队，冯白驹任大队长；不久，扩编为独立总队。一九三九年一月，在东莞、宝安、惠阳边区成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同时，珠江三角洲、南海、顺德地区也建立了游击队，领导人林锵云。这几支人民抗日武装在南方局和广东党组织领导下，坚持战斗在琼崖、东江、珠江地区，并在抗击日本侵略军中不断发展壮大。

十二月上旬末 周恩来、叶剑英经桂林到重庆。周恩来、叶剑英是本月初由湖南衡阳到桂林的。在桂林，周恩来、叶剑英对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周恩来同白崇禧商谈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问题，希望白能支持，白崇禧表示支持，并答应资助复刊经费。周恩来接见了胡愈之、千家驹等人士，向他们分析了桂林的政治形势、桂系首领们的政治态度，指示他们做好工作；他还指示文化界的党员同志，不要太露锋芒，要荫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叶剑英应千家驹的邀请至广西大学作了形势报告。八日，周恩来出席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在大华饭店举行的筹备会，演讲了抗战形势。接着，周恩来、叶剑英由桂林到达重庆。

十二月十二日 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拒绝了我党提出的

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并为一个大党。早在南京、武汉两党谈判中，我党代表就一再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办法，未得赞成。本次会见中，蒋明白表示：跨党办法绝对不行。他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对蒋介石所谓的“一个大党”主张，周恩来等当即严辞拒绝了。

十二月十八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今后敌人的动向》。文章指出，目前战局正处在第一期战争已经结束，二期战争将要到来之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中，敌人在军事上，正在准备正面的继续进攻和深入，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外交通，并且在敌后也正在分兵进攻我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企图消灭我在敌后的活动；在政治上，也正在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团结，削弱我国际影响。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战略任务则是：政治上，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实施战时动员，集中全民族的生动力

量，贡献战争，以克服当前困难；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后方新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

十二月十八、二十日 为在大后方进一步广泛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援助抗战前线，《新华日报》在重庆各区同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义卖献金日”活动。

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等于十二月十八日离渝飞滇。次日，与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傅斯年、曾仲鸣等十余人离开昆明逃离祖国。二十九日在香港发表“艳电”，赞同日本《近卫声明》，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九年

一月二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揭露了汪精卫叛国投敌，自绝于中华民族的反动实质，批判了汪精卫之流的民族叛贼们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

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示说，在目前形势下，我党的任务是：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抗战，开除汪精卫出国民党的

进步行动，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批判其汉奸理论。汪精卫的反共主张是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者，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的各级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新华日报》本月二日社论精神，发动各阶层人民和群众组织，开展了一个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卖国，声讨汪精卫的群众运动。重庆、昆明、成都等许多城市都先后召开了不同形式的讨汪大会，纷纷发出通电和声明，谴责汪逆之流的叛国投降罪恶，要求通缉汪精卫，并对一切汉奸投降分子进行检举惩处。有力地打击了亲日投降派。

一月初 周恩来、邓颖超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参加了校友座谈会。周恩来应邀在会上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及青年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责任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战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青年们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有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支持、拥护；凡是不利于抗战的

事都要抵制、反对。十日晚，周恩来出席南开中学举行的新年聚餐会，又发表了《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演讲，他希望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

一月七日 周恩来到重庆市重属联中就抗战形势和坚持持久战问题作了演讲，并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月十日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的压迫加剧，于二月二十八日该报被迫停刊。两年多里，在南方局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沫若、夏衍等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努力办好这张报纸，为坚持抗战，反映人民的呼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新华日报》董事会及全体同志，祝贺该报创刊一周年。贺电说：一年来，《新华日报》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坦白的反映了全中国同胞的意志，坚定的发扬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的主张，忠实的执行了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责任。中央深信，《新华日报》在党的六中全会方针指导之下，对于巩固和扩大全民族团结，巩固国共长期合作的伟大任务，对于争取民族

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华民国的伟大事业，更能尽其应尽的作用；对于任何进步现象和任何有利工作，更能加以应有的阐扬；对于一切腐化堕落现象和一切汉奸国贼败类，更能加以无情的暴露。中央要求《新华日报》“力求内容的改进，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并希望加紧努力，在近期内实现自己提出的“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

一月十三日 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批准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南方局常委，并指示江西、上海工作归南方局管。在这之前的一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南方局委员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十六日，南方局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组织分工情况。电报说，南方局已遵照中央指示开过会，决定组织分工是：周恩来管统战，博古管组织，凯丰管宣传及党报，叶剑英负责联络，吴克坚管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缺青年工作负责人，请派蒋南翔来。南方局机关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至此，南方局正式组成。

一月十七日 重庆市文化工作座谈会在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举行，到会百余人。郭沫若出席并演讲

《战时文化工作》，提出“文化人到农村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口号。

一月十九日 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对他的关于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的提议的意见。周恩来又一次明白表示“不可能”。蒋介石要求周恩来再电延安，希望中共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二十日，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日前与蒋介石谈话的情况，并提议两点办法：（一）给国民党五中全会一个公开贺电。（二）另发一密电给蒋介石，表示我党愿与国民党进一步合作。报告说，目前的事实是，国民党到处反共捕人，杀人，封报，制造磨擦，甚至进攻边区。报告提议由两党组织联合视察团或委员会，进行实地调查，以求迅速解决此等问题，并寻找进一步合作的具体办法。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同意他在二十日电报中的两项提议，并告以中央给蒋介石的电报全文。中央给蒋介石的电报指出：“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断然拒绝了蒋介石鲸吞我党的主张。二十五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并将我党中央的电报转送给他。

一月二十一日 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即闽粤赣边省委)召开第五次执委会议。到有全体执委及潮汕、梅、漳、闽西各县的主要干部共三十六人。特委书记方方在会上作了闽粤边的政治形势及工作状况的检讨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姚铎作了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谢育才作了组织工作报告。会议提出“一切为着准备游击战争”的口号,决定今后具体工作是:热烈参加领导抗战动员与社会运动;加强与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成为抗战中的堡垒;加强群众工作、武装工作;继续党员的审查登记,同时加紧建立强有力的地方领导机关。会后,特委将这次执委会议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报告。

同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它不顾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制订了“溶共”、“反共”、“限共”的反动方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整套反共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强化法西斯统治。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重大转变,由片面抗战转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个转折点。

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代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中共代表、国民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视察胡厥文等开办的合作五金厂,并为该厂题词。

周恩来题：“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董必武题：“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
邓颖超题：“合作奋斗，发扬生产。”鼓励该厂为抗战生产军用品，发展民族工业。

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提案问题致电南方局，指示对下列问题提出提案：（一）明令通缉汪精卫等汉奸。（二）拥护蒋介石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的驳近卫讲演所阐明的国策，尤须强调反共即灭华之真理。（三）实行民权主义，以利抗战。中央并要求在开会之前，《新华日报》对以上问题作系统的阐述，击退顽固分子的造谣诬蔑。

一月二十八日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七周年纪念大会，同时欢迎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派出护送捐助救护物资至桂林的侨胞代表黄克明。办事处全体人员，桂林文化团体、城乡民众以及友军代表参加了会议。李克农、吴奚如等先后致词，号召学习“一二八”先烈，抗战到底，并感谢港九侨胞对我军的支持。黄克明在会上介绍了港九人民为了支持第十八集团军抗战进行募捐的经过。抗战期间，港九人民以及海外侨胞。为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从人力（主要是司机）、物力、财力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援助。

一月下旬 叶剑英应邀给广西学生军第二团演讲《现阶段的游击战和正规战》。本届广西学生军是上年冬广西面临日寇入侵危机情况下，由桂系广西当局组织的。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了大批党员进入里面，并充任了从中队到团部的负责干部。本月下旬，叶剑英从重庆到桂林，正在这里集训的学生军二团通过李克农请叶剑英作演讲。叶剑英在演讲中，介绍了我军的斗争事迹，动员群众抗战的情况，讲述了当前的形势、我党的主张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最后必然胜利的光明前途。并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随后，学生军还请了郭沫若、夏衍、范长江等作报告。在叶剑英的演讲和郭沫若等人报告的教育和鼓舞下，在桂林“八办”和中共广西地下党支持下，广西学生军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广西学生军虽然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被解散了，但其中的二百多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青年仍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民主而工作。

一月 南方局派马子卿到昆明，向云南党组织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南方局关于批准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成立的中共云南省特委(暂名)为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决定。中共云南省工委由书记李群杰，委员费炳、陈方、唐登岷、吴宗遥、刘璧华、赵国徽七人

组成。以后省工委又建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文化支部等直属组织，并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初，南方局加派马子卿、何礼参加云南省工委。并决定由马子卿为工委书记，原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从事秘密情报和统战工作。

同月 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张文彬主持，博古代表南方局出席。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工作，分析了当前形势，确定今后工作方针、任务，决定把工作的中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区，作为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同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遵照南方局的指示，利用机会派党员深入到广西三青团和地方建设干校中，发展进步力量，开展统战工作。这年年初，桂系开始筹办广西三青团，缺乏干部，他们又不让蒋介石派人去，中共广西省工委便派干部进去，先后几批中共党员派入并担任领导职务，这使广西地区的三青团与其他地区的三青团有着明显的不同。同年春，桂系当局为了培养基层干部，兴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缺少办校人才，便邀中共派人帮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推荐党员杨东莼担任该校教育长。接着，又抽调和邀请了三十多

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学校分别担任各项工作。这个学校办到一九四〇年底，共办了三期，培养了一千三百多地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这些党员和干部分配到全省各地，对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都产生了影响。

同月 周恩来应黄炎培、张雪澄之请求，为《国讯》杂志撰写了《今年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长篇论文。

同月 重庆妇女座谈会成立。这是一个由南方局领导的爱国进步妇女组织。主要负责人卢竞如，干事有奇洪、吴全衡、黄薇、郑瑛等。每星期开会一次，研究抗战形势和妇女问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于本年四月进行了扩大改组，卢竞如、奇洪、段超人、黄薇、吕润璧、王枫、郑瑛等七人当选为第二届干事。

二月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参政会议问题致电南方局并林伯渠。电谓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的态度仍不好，对我军和解放区采取进攻方针，增加磨擦对立；前次参政会决议案亦毫未见诸行动，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应采取较冷淡的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

二月八日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联络委员会举行妇女参政问题讨论会。到有各妇女团体、各大

学代表等三十余人。联络委员会主任史良主持了会议。中共参政员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负责人邓颖超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指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而民族解放亦须占有人口半数之妇女获得解放，方能彻底，故妇女参政极为重要。而妇女参政在当今乃为参加民主政治，拥护及推动民主政治的实现。

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礼堂召开。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出席。会议第四天(即十八日)董必武提出《加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的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各党派给以法律上的保障。国民党参政员无端反对，董必武当即退席抗议。次日，董必武又因提案不得圆满解决再次退席抗议。

二月十四日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茶会，招待各党派领袖、各社团及各界代表，到会者四百余人。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出席，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二月十五日 周恩来离渝去江南各地视察工作。周恩来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皖南，促使新四军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促进新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同时以军委会

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第二战区及沿途一些地区军政工作。十六日抵达桂林，应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之邀，出席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大会，并在会上演讲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形势。当晚，周恩来向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桂林文化界的党员二百余人传达了我党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讲了形势和任务。十七日，周恩来对李克农、石磊（曹瑛）谈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问题。十八日，周恩来离开桂林，十九日在江西吉安会见熊式辉，同他谈了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战问题。周恩来在吉安期间，还秘密接见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对江西地下党的工作作了指示。接着去上饶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交谈了团结抗战问题。二十三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周恩来在新四军的二十余天里，向干部们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与叶挺、项英等负责同志研究确定了新四军战略方针，在军部礼堂向部队和地方干部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为解决叶挺、项英间的团结问题作了很多工作，并深入部队基层作调查，了解了该军各个方面的情况。

同日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训练班”）在湖南省南岳开学。该训练班为国共两党共同筹备合

作举办，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止，共办了三期，参加受训军官达三千余人。中国共产党派出叶剑英等三十余人参加训练班的工作。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边章伍、李涛、薛子正、李崇、吴奚如等分任军事、政治教官。

二月下旬 南方局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妇委”）。委员有邓颖超、廖似光、刘群先、卢竞如、陈奇雪、寄洪、徐克立、范元甄，邓颖超负责，卢竞如任秘书。后张晓梅到重庆参加南方局妇委为委员，协助邓颖超主持工作。以后，妇委成员多数调回延安，或调任其他工作。一九四〇年十月，南方局统委之下设立妇女组，由妇委兼。邓颖超兼任组长。南方局妇委和妇女组成立后，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会驻渝代表团的公开名义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并指导各级党委内妇委的工作，对推动大后方妇女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二月 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在八路军驻邵阳办事处召开扩大会议（当时叫党代表会议），到有省工委成员和各地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三十多人。博古代表南方局出席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党的地下工作做了指示。会议产生了湖南省委。正式委员七名：高文华（书记）、

郭光洲(组织部长)、徐特立(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对内指导地下党工作,参加省委负责统战工作)、任祚民(宣传部长)、聂洪钧(军事部长)、蔡书彬(负责青运,不久调湖北鄂西工作)、王涛(湘南特委书记),候补委员帅孟奇(常益中心县委书记)、袁德胜(即袁学之,湘宁中心县委书记)。涂国林为秘书长。扩大会议决定了湖南省委今后的工作中心是: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发展统一战线。

三月五日 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钱瑛向南方局报告了湖北各地工作近况及今后工作安排。十二日,报告了湖北各地党组织在二月份内整理和扩大原有组织,建立新的基础,加紧党员和干部的教育与训练工作的情况。四月七日,又报告了武汉失守五个多月来我党湖北各区工作的全面情况,并从整顿健全党的组织,建立武装力量,发展群众组织,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

三月八日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重庆、成都、桂林、梧州、沅陵、韶关、翁源、始兴等城市,香港及处于沦陷区的上海均举行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共同发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呼声。在重庆,各界妇女四千多人在市商会举行纪念会,主席团有宋美龄、沈慧莲、邓颖超、吴贻芳等。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

妇女救国联合会出席并讲话。她说：只有把妇女的伟大力量组织到民族的抗战中，才能迅速获得抗战胜利与民族解放。会后举行盛大游行。宋庆龄、何香凝在香港出席纪念会并讲演。这次有各地各阶层妇女参加的纪念活动，是由庐山妇女谈话会产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在重庆的各妇女团体共同发起筹备的。邓颖超在筹备会议上的发言被通过作为制订纪念大会工作纲要的基础。这次纪念“三八”节大会的成功举行，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妇女运动的新发展。邓颖超于本月二十五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检讨三八节工作以增进妇女运动更开展》一文中，赞扬了今年“三八”节纪念活动的极大进步，并针对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今后应努力把握着“三八”节的进步，在现有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五点意见。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邓颖超撰写的代论《纪念“三八”节开展妇女运动》。文章指出：今后妇运工作的任务是，切实深入到各阶层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和农村妇女中间去，使妇运工作走出狭窄的范围。同日，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出席重庆各界妇女纪念“三、八”节大会，并发表演讲，强调指出：只有把妇女的伟大力量组织到民族的抗战中去，才能迅速的获得抗战胜利。

三月十九日 周恩来从皖南到达浙江。在金华，周恩来会见了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商谈团结抗战问题；接见了一些抗日进步团体人士；秘密会见了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刘英等，指示他们不要急躁，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照顾将来。周恩来还深入绍兴城乡进行调查，并通过做报告和题词等方式激励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月二十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各局各省委各特委还无统一战线部的应赶紧成立。”统战部的经常工作为：具体调查研究各党派、军队及少数民族的情况；具体研究各党派、各地驻军、政权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提出适当的对策；负责进行和指导对各党派各友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帮助和保护同情分子及非党干部。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经常讨论和领导统战工作，“目前须特别讨论如何争取和帮助友党友军中的进步分子，以及如何自己严守秘密工作及公开工作纪律，并帮助同情分子注意秘密工作及应付方法，以免受顽固分子打击等问题。”

三月 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任委员，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等十三人为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

同月 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召开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曾山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按党中央、南方局的决定调整了江西省委领导成员，郭潜担任省委书记。江西省委归南方局领导，下辖湘鄂赣特委、湘赣特委、赣西北特委、赣西南特委。

春 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蒋南翔，委员何礼、杨述、郑代巩、袁汝镛等。1940年冬南方局统委之下设立青年组，其工作由青委兼任，青委书记即兼青年组组长。蒋南翔回延后，青委和青年组的工作由刘光负责，成员先后亦有变动。

春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上年十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人员到达重庆后，遂着手筹组重庆办事处。经过多方努力，于本年春在重庆机房街七十号正式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副处长周怡。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后，驻重庆联络通讯处即撤销。本年五月，日本飞机大轰炸重庆，机房街七十号房屋被毁，遂迁至红岩嘴十三号。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对外是我军的一个代表机关，对内是南方局的一个办事机构。它既负责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进行军事情况的交换，军需供给的联系，又承担着掩护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为我党我军筹集经费、物资和输送人

员等繁重任务。

四月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指出今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抗日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对此，我党应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为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牺牲；另一方面要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的观点。四月十七日，《新华日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发表了《把精神总动员变成群众运动》的社论。六月五日，周恩来致函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表示同意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会之讲演组。

四月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卖国贼不容逍遥法外》。着重指出，除汪精卫等一批公开的民族叛逆应受惩处外，对于为其奔走之喽罗也应受到制裁。现在抗战营垒内亦还有许多粉饰着的毒虫隐藏着，如若姑息养奸，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社论期望“国民政府立即明令缉汪归案法办，对附汪逆之周佛海、褚民谊、陈公博、陶希圣、李圣五、高宗武等亦应一体通缉，对于隐藏抗战阵营中之附汪分子亦应严加检举。”

四月十日 博古、董必武在重庆会见李济深，就两党军队磨擦问题提出四点要求：（一）鹿钟麟应辞职，河北省主席从朱德、彭德怀中择一兼任。（二）八路军应照三军五师及直属队编制给饷。（三）游击队的饷由国民政府发给。（四）与我军磨擦之部队应调开，如将来反攻增兵时，亦宜调与我军关系较好之部队前往。

四月中旬 周恩来到达湖南南岳视察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周恩来在视察期间，详细了解了训练班各方面的情况，并于十八、十九两日做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听众除训练班全体教官、学员外，还有附近驻军军官。周恩来在南岳还同叶剑英一起广泛会见了各界人士，并为祝圣寺和尚暮笏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月下旬，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举行成立会，叶剑英应邀出席，并做了题为《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

四月中、下旬 中共川康特委组织了“五月革命行动委员会”，由程子健、韩天石、郑伯克、甘棠等组成，程子健任书记，领导川康人民进一步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汪精卫投降、争取民主的斗争。五月一日，成都各界群众三千余人在中山公园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五月四日，成都学生纪念“五四”活动，五

月七日，成都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反汪大会及火炬游行，都是在“五月革命行动委员会”布置下进行的。

四月 南方局为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从当月起先后在重庆机房街七十号和红岩嘴十三号举办党员训练班，集训党的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党的组织建设、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和秘密工作等有关内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邓颖超、蒋南翔、黄文杰等南方局领导同志和部门负责人为学员们讲课。与此同时，南方局所属一些省特委亦分别在各地举办党员训练班。这些党员训练班的开办，为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深入和转入荫蔽打下了基础。

四月间 中共湘鄂西区党委成立，书记钱瑛，组织部长蔡书彬，宣传部长曾一凡（曾杞凡），委员王致中、曾惇，机关设宜昌，直属南方局领导。不久，程时（程全）任青委负责人。九月，何功伟（何彬）增补为委员，任宣传部长。区党委下辖沿江工委、江南工委、恩施工委、江陵中心县委、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等。一九四〇年六月宜昌失守后，区党委机关由宜昌撤至恩施。八、九月间，钱瑛调到南方局工作，何功伟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下辖江陵中心县委（当年

十月以后改由鄂豫边区党委领导)、鄂西特委，湘鄂边特委。

同月 川东特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鉴于国民党加强反共政策和近年来党的组织迅速发展比较暴露的问题，作出《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严格禁止各级组织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停止上下级业务部门之间单独的联系与会议；禁止上级组织越级调下级干部谈话；减少交通和通讯联系等措施，着手从组织上巩固党。

四月底 周恩来返重庆过桂林停留期间，出席了桂林文化界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一百余人举行的欢迎宴会，并接见了杨东莼、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周钢鸣、张铁生、刘季平、林林、姜君辰等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在桂林举办的日语人员训练班全体学员演讲《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向《救亡日报》记者讲述了浙江妇女营深入敌后打游击的事迹。并应该报的要求，讲述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号召青年们继承“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为民族解放运动、为科学和民主而积极斗争。五月初旬，周恩来从桂林回重庆。此次江南之行，历时两个多月。

五月一日 《新华日报》发行纪念“五一”特刊，发表社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南方局董必武、凯

丰、吴克坚等为特刊撰写文章。重庆市万余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和游行。

五月四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员被逼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决定》。决定说：国民党最近在其统治区内强迫各机关公务人员、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及军队中各级军官加入国民党与三青团。为了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利益，党中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内的我秘密党员，凡被迫加入时，除特别情形外，一律加入，并报上级批准。凡加入国民党的党员，一般的应采取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推动其进步的方针。

五月六日 《新华日报》暂时停刊，参加重庆十家大报联合版。因日机连日狂轰滥炸重庆，市区内生产陷于停顿，各报出版发行发生困难，国民党当局下令各报停止单独出版，共同办一联合版。周恩来和潘梓年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各报联合版，必须明确限定时间，否则《新华日报》不参加。当局答应以一月为限。《新华日报》遂从本日起参加《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扫荡报》、《西南日报》十大报纸的联合版。五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对《新华日报》参加各报联合版提出批评，指示南方局向国民党交涉，坚持《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发行，在《新华日报》暂未恢

复出版期内，应充实《群众》周刊的内容，同时尽量翻印和发行《新中华报》。南方局、《新华日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集中报馆的主要力量在重庆磁器口高峰寺，加强《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并编译马列著作，翻印延安及国内外一些进步报刊、书籍，还派人在市区出版油印小报，同时向国民党反复提出交涉，至八月十三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化龙桥新址单独出版发行。

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同意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傖表示的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反汪运动的意见，并指示南方局必须注意：（一）利用反汪运动机会广泛的进行反对一切投降的运动，着重指明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是亲日恐怖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应在反汪斗争中，“更亲密的加强与一切主战爱国的进步分子及国民党群众的联系，与他们一起动员群众共同进行反对一切投降与反共分子的斗争，以达到巩固国共合作和巩固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目的。”（二）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坚决主战的军政人员公开说明，汪在国民党内及政府中还有不少同情分子，日寇及汪逆正用一切力量企图使他们作里应外合的勾当。因此，不仅在政治上必须尽量揭露和孤立他们，而且在实际上必须采取办法防止他们的一

切阴谋。

五月 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与川西地方实力派的国民党将领刘文辉晤谈，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释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

同月 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由上海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同他们仔细研究讨论了江苏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和游击战争等问题。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周恩来着重指出：要注意开展各行各业的社会统战工作，要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租界后更好地开展群众斗争创造条件。在工人运动方面，他强调要巩固已有的工人群众组织，要尽量利用合法形式，包括利用黄色工会，以取得社会合法地位；要大力培养工人领袖，加强工厂党组织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使工会干部成为群众真正有威信的领袖。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方面，他指示要保护和发展已经建立的武装力量，配合新四军开辟新的游击区。

六月七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它准备投降的步

骤。指示要求全党用全力来反对投降反共活动，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打击，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公开的揭穿反共活动即是准备投降的实质；同时，党不应给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者造成借口，这种统一战线无论如何是需要巩固和扩大的。

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人带小股军队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湘鄂赣特委书记、新四军上校参议、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活埋，制造了“平江惨案”。在这前后，国民党顽固派还先后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的反共事件。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连续致电国民党军政当局及社会各界，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并强烈要求迅速合理解决这一事件。七月一日，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致电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严正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平江事件，要求迅予彻查。二日，周恩来致电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的经过及其阴谋。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制造此一事件，显系别有用心，其目的不止于反共，还在破坏抗战，

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先后复电周恩来、叶剑英进行抵赖。二十二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徐永昌并军委会及各部长官，严正驳斥国民党当局歪曲报告惨案经过及对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的诬蔑。要求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雪冤治罪。国民党为敷衍舆论，责成薛岳进行所谓调查。而薛的报告，依旧是把犯法者文饰为有功，无辜者武断为有罪。二十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何应钦等，又一次严正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三十一日，周恩来在延安向《新华日报》记者谈了平江惨案的经过真相，再次重申了我党的严正立场。

六月十八日 周恩来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周恩来回延安后，因手臂负伤，八月，出国治疗。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

六月二十三日 江苏省委书记刘晓致电南方局并党中央，报告上海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改变斗争方式，尽量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一切干部隐藏在群众中去，埋头苦干；改变组织方式，改大支部为小委员会等十条工作要点，请示南方局。

六月 南方局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中共广西省工委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的，书记陈岸、委员黄

彰、黄书光等)，分别成立桂林、玉林、南宁三个特支，仍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领导。桂林特支书记陈岸，玉林特支书记黄彰，南宁特支书记王文(黄书光)、副书记林鹤逸。

七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日寇在现阶段侧重于以政治诱降的阴谋来达到它降伏中国的目的。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中国妥协分子投降分裂的罪恶活动和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此三者的汇合造成了今日抗战形势中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而今日“与日寇谈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宣言响亮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南方局在以后的整个抗战期间，始终坚持《宣言》指出的总方向，团结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为争取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同日 《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行特刊。特刊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同时，刊登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

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撰写的纪念文章。国民党新闻检查当局以《新华日报》违检发行此特刊而给以“严重警告”处分。新华日报社致函国民党当局拒绝接受。

七月二十日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在重庆开学。这是一所注意结合实际，面向社会的新型学校。在南方局的支持和资助下，经陶行知校长和广大教职员及该校党支部的共同努力，育才学校为中华民族培育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

七月下旬 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的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的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进行；党员和党的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党员被捕后，不得轻易承认自己是党员，在万不得已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时，也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和组织情况，绝对不能供出其他同志。

八月四日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目前时局的关键、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个问题作报告。他指出：现在我们遭遇到了新的困难与危机，主要是国民党的中途妥协与内部分

裂。克服这一投降妥协危险的关键，在于全民族的团结，各党派的合作，其中心是国共两党合作，亦即在于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告从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与形式；统一战线的变化与危机；国民党与统一战线；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等四个方面，对统一战线作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八月八日 董必武、沈钧儒、李璜借张澜家宴请邹韬奋、林虎、章伯钧、黄炎培、江恒源等，讨论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提案问题。十五日，董必武、张澜、李璜、邹韬奋、江恒源、曹琦、黄炎培再次会商，决定分别负责起草重要提案，董必武负责起草民众问题提案。

八月十一日 国民党第九战区通令邵阳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该办事处建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立即停止办公”。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逼迫日甚，办事处被迫关闭，工作人员分别撤到桂林、重庆。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留下坚持工作，王凌波(办事处主任)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名义留下协助徐特立工作。次年秋，徐特立奉命回延安，九月王凌波被国民党逮捕押送离湘。至此，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工作全部结束。

八月十三日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重庆举行追悼

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被害烈士大会。到会的有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亦派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追悼会由叶剑英主持，中共代表董必武、《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新四军驻渝代表肖正岗在会上致词。叶剑英说：“平江事件并非简单案件”，“此系在日寇政治别动队托派汪派汉奸破坏团结活动的影响下所进行的事件”。董必武指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请求惩办凶顽，揭破汉奸托匪和汪派在破坏团结中的阴谋活动，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八月二十二日 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就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主要任务，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本次参政会应主要“在于充实抗战国策，巩固内部团结，肃清汪派活动”。

八月二十三日 中共参政员吴玉章，就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必须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加强团结，是极端重要的问题。”而最中心者则是“认真肃清反共的言行，肃清汪派托派和一切公开暗藏的挑拨离间国共关系，制造和扩大磨擦的阴谋诡计。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团结，坚持抗战”。

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要从“思想

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

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汪精卫在沪西秘密召集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发表了以反共卖国为中心内容的所谓《宣言》。

八月 中共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凯丰主持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方局和各省委、特委的青年负责人蒋南翔、郑代巩、何礼、何彬、李锐、荣高棠、袁永熙、袁汝镛等十余人。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中央青委委员胡乔木参加了会议，会上，冯文彬作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胡乔木作关于宣传问题的报告。中央青委委员、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报告了学生运动的情况。会议主要传达了中央关于精干组织，隐蔽力量的方针，研究了在国民党加紧反共活动形势下如何开展党的青年工作问题，强调克服“救亡作风”，利用合法，保存骨干。会后，南方局青委将已经暴露的青运干部一部分撤回延安，一部分调换了工作地区，并要求各所属青委坚决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和决定。云南省的民先组织在九月停止了活动。

九月一日 毛泽东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关于目前国际新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

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我们应当坚决争取前一个前途，采取“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同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会见正在重庆作国事访问的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双方就中国抗战的形势、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情形、苏德协定与对欧洲和远东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四日，尼赫鲁约见王明、博古，双方又就印度民族在北欧战中应采取的态度、中印两大民族共求解放及加强中印两大民族联合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午后，中共代表在红岩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举行茶会欢迎尼赫鲁。

九月八日 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七参政员发表《我们对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就政治、军事、经

济、财政、外交、党派合作六个方面声明了我党立场、态度和意见。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吴玉章出席。由于中共参政员和中间党派参政员们的一致努力，这次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和否认伪组织及通电声讨汪精卫等提案。会上推出了包括董必武在内的十九人组成宪政期成会。

九月十六日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央社刘尊棋、《扫荡报》耿坚白、《新民报》张西洛三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九个问题，明白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说：“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并指出：大敌当前，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做到这个就要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

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九月二十一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建立宪政规模》。社论说：这次参政会，对于抗战建国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实行宪政之决议。指出：“宪政的实质，不在乎条文，而是在乎事实”。“我们拥护国民参政会这一决议，但同时我们更希望政府要切实地执行这一决议，要不然，决议只成为纸上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抗战建国大业，是不能有实际的贡献的。”二十二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召集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的社论。社论说：国民大会，“应当是真正的能够代表全国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而实行宪政，就是要把全国人民的公意和共同要求，用立法的手续把它确定起来”，实行“还政于民”的诺言。所以，召集国民大会与实行宪政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在事实上真正有可能实行其对国家的职权。为达此目的，在召集国民大会和行宪之前必须造成如下一些先决条件：（一）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应一律平等。（二）全国人民除汉奸以外，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政府应在法律上给以保证。（三）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的办事人员，应以才德为标准，而不应受党籍、思想、信仰、职业、地域、性别的限制。（四）从现在起，就应该开

展全国人民需要怎样的国民大会和怎样的宪法问题的公开研究和讨论。社论指出，做到这四点“是召集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的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和起码工作。”

十月一日 参政员褚辅成、江恒源、莫德惠、张澜、章伯钧、胡石青、沈钧儒、李璜、左舜生、张君勱、张申府、王造时等十三人在重庆市银行公会邀请各界关心宪政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到百余人。中共参政员吴玉章、董必武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应邀参加。会议除对如何促进宪政之实施等问题进行座谈外，还一致议决继续经常举行座谈会，并组织一民众团体，协助宪政的实施。在以后举行的第四次座谈会上，推定八十五人为筹备委员，负责进行一切筹备事宜。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这个座谈会共举行了八次，对怎样推进宪政、宪政与抗战建国的关系，对宪草的研究和意见，对国民大会的意见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党驻渝同志积极参加并从各个方面支持了这些活动。

十月二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在广西建设研究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夏衍、林林、邵荃麟、司马文森、周钢鸣、林山、聂绀弩、黄药眠、刘季平、

华嘉、黄新波、田汉、欧阳予倩、胡愈之、孟秋江、陈芦狄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曾先后当选为该会历届理事、候补理事和常务理事。该会在促进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文艺为民主、为抗战服务方面，作出了贡献。

十月七日 新四军军长叶挺在重庆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新四军在江南战斗中不断地壮大着，经常牵制着二万以上的敌军兵力。目前，敌人正在战区加紧政治攻势，汉奸正拼命施展其挑拨离间，企图在政治上分裂国共团结，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当前，我方应更加团结，以防止汉奸阴谋挑拨，“极盼友军及地方行政机构取得更灵活更有效的配合”以发挥更大的作战能力。

十月十四日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褚辅成、沈钧儒、邹韬奋、李中襄、张申府、江恒源及新闻记者三十余人到会。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吴克坚、徐冰、潘梓年出席。座谈会由范长江主持，与会各位对实施宪政、抗战建国纲领之意义、宪政运动中新闻记者之任务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十月十九日 重庆文化界发起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举行，各党派、各文化艺术团体及工人、学生、市民代表千余人与会。中共代表陈

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到会。

十月 中共川东特委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川东特委委员、中心县委书记十余人出席，南方局代理书记博古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南方局的指示，确定川东党应即转入巩固党的工作，并拟定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和工作方法。会议决定：一、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必须严格分开；二、立即着手审查干部；三、切实改变干部中的“救亡作风”。

同月 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为巩固党的组织，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决定按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立即整顿党的组织，从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上都实行向秘密方面转变，并撤退已暴露的干部。

十月 桂林文化供应社成立。该社是胡愈之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以救国会代表的名义，与广西建设研究会合作办起来的，实际上是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出版发行机构。共产党员邵荃麟、曹伯韩、姜君辰等曾任该社编辑部主任、编辑。出版刊物书籍以社会科学、知识性读物和文学作品为主。

十一月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一切国民党区县的组织，必须有步骤的、有深远计划的、既不懈怠又不冒进的利用一

切公开合法形式，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生活改善工作。

十一月十二日 重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慰劳会渝分会、反侵略分会、回教救国协会、天主教妇女服务会、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难民服务团、渝市妇女会、东北救亡总会等二十七七个妇女团体代表百余人举行宪政座谈会。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代表、南方局妇委委员张玉琴、廖似光出席。座谈会由史良主持，史良、刘清扬、曹孟君、廖似光、张玉琴、陈逸云、朱纶、邓季惺、黄佩兰等就妇女宪政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的各界妇女也先后召开宪政座谈会。本月十三日，《新华日报》发表《妇女宪政运动》的社论，赞扬重庆市妇女宪政座谈会。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共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祖涵、吴玉章等为协同全国各界同胞、各党、各派、进步人士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促成国民政府实施宪政，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次年二月二十日，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吴玉章为促进会理事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四十五人为理事，通过了宣言，并通电全国。

十一月三十日 宪政促进会筹备会在重庆巴蜀小

学举行首次会议。到会五十余人。会议推孔庚、张申府、董必武、秦邦宪、刘清扬、章乃器、褚辅成、沈钧儒、左舜生、李中襄、史良、曹孟君、张友渔、许宝驹、许孝炎、黄炎培、莫德惠、章伯钧、沙千里、梅龚彬、康心之、于毅夫、韩幽桐、周钦岳、李璜等二十五人组成常委会，下设秘书处及宣传、联络、研究三个委员会。

十一月 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了第五次执委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精神，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决定以巩固党的组织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密，以及“实行组织的转变、群众工作的转变和严密党组织”等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会议还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定期内完成对干部的审查、教育工作，健全组织生活，巩固基层组织，加强琼崖、东江地区的武装力量等。

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时局正处在一个转变的关头，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尽量利用国民党内各个派别各个集团之间的各种矛盾，支持和帮助国民党内的抗战进步分子，以逐

步组成国民党的左派力量，尽量团结和争取救国会的朋友、各地的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并用各种方式把这一中间力量组织起来。而组织的形式可以因时因地，多种多样，以不致遭受反动力量的破坏为原则。为达此目的，要尽量动员与说服那些与国民党及社会各方面有较多联系，且能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员、同情我党的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去认真亲近国民党干部及党员，使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影响和接近国民党嫡系非嫡系以及非国民党的各个重要党政军领导人，诚意地帮助各种赞成抗战和民主的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在这里，文化人及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南方局遵循党中央这一指示，推动了南部中国统战工作的广泛深入地展开。

同日 中共中央就关于国民大会问题指示南方局。指示说：关于国民大会代表产生的临时折衷办法，我们可表示不拒绝商量，但我党代表至少应占全数的四分之一。

十二月十日 成都国民宪政促进会，召集发起人大会，到会二百余人，推定筹备委员七十人，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同日 重庆青年宪政问题讨论会在中山三路美专校大礼堂举行，到会五百余人。会议讨论了“青年对宪

政应有之认识”等问题，并决议筹组中国青年宪政促进会。邹韬奋在会上讲演了实施宪政的有关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在日本的诱降、英美的劝降之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坚持《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坚持、三反对”的方针，在政治上，坚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军事上，在自卫的原则下，对来犯之顽军予以坚决回击，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进攻。

一九四〇年

一月四日 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重庆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举行会谈。何应钦要求中共取消所谓“违令扩充”的部队及“非法”设立的军区。叶剑英说：这些军队和军区，都是在抗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肩负着严重的抗敌任务，不能取消。要求国民政府允许八路军的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其所辖地区，承认在抗日前线肩负敌后抗敌任务的解放区。谈判未获结果，日后继续举行。

一月六日 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无理扣压《新

华日报》先后两次送审的社论。为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新闻检查制度，揭露它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的谎言，当日的《新华日报》一版上半版开“天窗”（即空白版）。这是《新华日报》第一次使用开“天窗”的办法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新华日报》反新闻检查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开“天窗”是其中常用的一种。

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指示以严正的态度向国民党提出：中共边区应为二十三个县，在这二十三个县内，中共和八路军有全权治理；委任朱德为冀察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八路军扩充至三个军九个师，二十万人；新四军应为三个师五万人。次日，党中央又电南方局，指出：目前可先解决边区与扩军问题。边区坚持要二十三个县，边区主席由林伯渠担任，名称定为“陕甘宁边区”。扩军以及其他问题均照前电办理。南方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由叶剑英、博古等同国民党方面几次进行谈判，因国民党坚持反共立场，谈判未获结果。叶剑英、博古将此情况及时报告党中央后，二十五日，党中央又指示南方局说：在边区、扩军等方面，我党所提的各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正当的、合理的，不能稍有让步。否则，将于抗日不利，抗日阵地将大受破坏。

一月十一日 《新华日报》在化龙桥报馆举行创刊

两周年纪念会，来宾达五百余人。中共代表、南方局委员、《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博古、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到会祝贺，凯丰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战的意义》的报告。叶剑英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民族利益以上，让他们跑到汪精卫那里去罢，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会团结到底的！《新华日报》应该团结更多的进步人民，用大众的力量来回答这些张精卫李精卫的破坏团结、投降妥协的阴谋。

一月十四日 廖承志致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琼崖情况。电报说，琼崖国民党顽固派在接到蒋介石关于撤消冯白驹部番号后，一方面要冯退出根据地；另一方面则实行五县联防，发展武装，准备进攻冯部。而顽军两个独立团实力和我冯白驹部实力差不多，且其中一个团与冯部关系颇好。冯白驹等认为，我们现在的对策应是：（一）绝不让出根据地。（二）展开统一战线活动。（三）准备在顽固派发动进攻前，给他们以坚决的打击。

一月十五日 中央书记处电南方局并西安办事处伍云甫、中共陕西省委，告以中央通过南汉宸写给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的复函。内容要点为：（一）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应成为不分党派

和职业除汉奸以外的东北人民群众团体，我党只在政治上和工作上予以帮助。(二)以东总名义领导东北的抗日部队绝不可能，且影响东总本身的存在。但对旧东北军的工作应尽可能展开，以建立广大的同情。(三)应尽量争取建立东北抗日政权机构，以团结东北上层分子。(四)国民大会应争取凡东北抗日部队、救亡团体都有代表，东北的名流学者抗日分子都有被指定的权利。(五)东总备案名称要有政治意义，东北籍国民党党员可参加东总，但不接纳国民党指定领导人的办法。(六)东总委员可参加抗战建国协会，但不能以此为取消东总条件。电报指示南方局、伍云甫和陕西省委依此六点精神，向高崇民及其他东总负责人作解释。

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书记处电南方局，指示在重庆加强翻印和发行延安出版的党报、党刊，尽量采取过去白色恐怖之下的一切经验和手段进行散发。南方局根据指示精神，立即同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及有关人员进行研究，组织各方面力量，将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共产党人》、《解放》、《军政杂志》等报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印成单页或小册子，通过秘密的发行网点及其他各种方式进行散发。

一月二十七日 在南方局的支持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改善作家们的经济困境，动员广大

文艺作家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发动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新蜀报》副刊《蜀道》积极响应，于当日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老舍、阳翰笙、葛一虹、华林、罗荪、王亚平、方殷、光未然、陈纪莹、胡风、陈白尘、梅林、凤子等二十六人。与会者就提高稿费、保障版权、版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在此会后，都纷纷发表文章表示积极支持这一运动。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又发表了“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

一月 恢复建立中共重庆市委。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成立川东特委时，由特委兼重庆市委；此时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恢复重庆市委，书记王致中。九月，王致中调离，江涛继任书记。“皖南事变”后，领导机构缩小。至一九四二年上年，市委调整领导成员，由王璞任书记，彭咏梧、何文述任委员，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由于环境恶劣，市委领导机构缩小，活动又受到限制，重庆市各条战线主要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

二月三日 中共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拒绝接受国民党利用参政会名义派出的“视察团”到陕甘宁边区。指出：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不仅无一中共参政员，且连提

出组织该视察团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以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之张一麟、黄任之（黄炎培）、江恒源、张表方（张澜）等亦无一参加，在团长团员中，除梁实秋、余家菊两个拥汪主和反共的人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由此等人选所组成之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收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绝无疑义。该团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收集虚假材料，以便作为国民党在下次参政会上提出取消边区与八路军提案的依据，阴谋打击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共拒绝接受这个所谓的视察团。

二月九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说，现在同国民党谈判的重点，已不是边区应为二十三个县，军队扩编为九个师的问题，而是全面停止磨擦的问题。十日，党中央又指示南方局，不同意国民党在谈判中提出的以四个县换我边区四个县。

二月十四日 《新华日报》从即日起辟《青年生活》专页，由南方局青委（后为青年组）主编，每两周出刊一期。

三月八日 重庆各界妇女代表万余人在川东师范广场举行“三八”节纪念大会。大会总主席李德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会驻渝代表团负责人张晓梅在大会上先后发言，日本友人绿川英子、抗属代表、庆

新纱厂女工也先后讲了话。大会通过了宣言、讨汪通电、慰问前方将士电、告世界妇女信，并通过了妇女参加宪政运动、妇女儿童福利问题的决议十三条。会后，举行游行，高呼“全国妇女团结起来！”“清除一切大小汉奸！”“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等口号。同日，在成都、贵阳、桂林、昆明等地，妇女们亦举行纪念“三八”节大会，并声讨汪精卫、陈璧君。

三月上旬 蒋介石召集全国军以上的参谋长会议进行反共，叶剑英当场予以坚决回击。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即将被我军粉碎时，他在重庆召开全国军以上的参谋长会议，以检讨冬季攻势作战行动为名，宣布我十八集团军“罪状”，以便对我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讨伐”。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处长、驻重庆办事处代表肖正岗（代表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出席了这次会议。蒋介石首先在会上说国民革命军冬季攻势之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的。宣布要彻查此事，严整军纪军令。继蒋之后，一些国民党军官尾随发言围攻我军，历数我军犯下的所谓“罪行”。针对这些攻击，叶剑英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我党我军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 and 原则立场，并以大量的事实，确

凿的证据和国内外的公正反映，证明我军在冬季作战行动中是坚决、积极、英勇的，是按照蒋介石统帅部的抗战命令办的；证明我军在各地磨擦中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是合乎自卫原则的，有力地驳斥了蒋介石等人诽谤诬蔑我党我军的烂言，蒋介石的阴谋计划宣告失败。

三月十四日 国民党顽固分子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趁机查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郭秉彝、朱亚凡、洪希宗等十余人。事件发生后，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叶剑英、潘梓年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派潘梓年去成都交涉。与此同时，南方局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发表《成都抢米事件告成都市及全四川同胞书》，揭露了“抢米事件”的全部经过，指出“此系奸人、匪徒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暴行，其目的在破坏团结抗战，为压迫共产党和抗日救亡进步分子，为准备投降分裂制造口实”。经过反复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恢复营业，却拒绝释放逮捕的同志。不久，朱亚凡、洪希宗被无辜枪杀，罗世文、车耀先被秘密押往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长期监禁，至一九四六年八月惨遭杀害。

三月十五日 川康特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抢米事件”后川康党的应付办法。会议决定：立即通知成都各地下党全部戒严，采取措施，保护党的组织和秘密文件；暂停会议，实行个别接头；紧缩各机关，撤销妇委、青委，特委迁移乡下，加紧撤退和转移干部；向所属各组织报警，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接着派人到重庆，向南方局报告事件的详细经过；同时向地方势力说明事件真象和国民党顽固分子企图借此打击地方势力的险恶用心，争取他们在反共逆流中保持中立。

三月二十一日 宪政座谈会及宪政促进会筹备会在重庆银行公会举行茶会，招待宪政期成会会员，交换对宪政问题的意见。到有宪政期成会的张澜、章伯钧、周炳琳、董必武、黄炎培、罗文干、史良、李中襄、罗隆基、左舜生十参政员及宪政座谈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张友渔、潘梓年、张晓梅、曹孟君、刘清扬、韩幽桐等四十余人。

三月二十三日 中央书记处指示南方局，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华中磨擦问题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三月二十五日 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成立。该会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为了加强和扩大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开展中苏妇女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在邓颖超倡议下设立的。主任委员李德全、副主任委员

傅学文、曹孟君，委员有：邓颖超、张晓梅、史良、刘清扬、胡子婴、刘王立明、黄静汶、胡绣枫、劳君展、郑瑛、倪斐君、张启凡、陆慧年、陆晶清、邓季惺、谭惕吾、彭子冈、谭得先、于立群、王枫、浦熙修等。该会除了积极参加妇女界、文化界的各项重要政治活动外，还经常组织召开中苏妇女联谊会，联欢会，各种学术研究会，妇女问题座谈会，形势报告会，苏联妇女儿童照片展览会，电影招待会，介绍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及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中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情况，此外还兴办妇女俄文补习班，儿童之家等。该会的成立，为加强中苏妇女及反法西斯同盟国妇女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为动员重庆各界妇女参加民主、反独裁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是南方局妇委团结各界妇女开展妇女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三月二十六日 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慰劳团团员霹雳侨胞领袖王振相、槟榔屿侨胞领袖陈清虎及陈嘉庚秘书李铁民等一行五人自仰光飞抵重庆。陈嘉庚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此行任务，为代表南洋一千多万华侨，回国慰劳和考察，准备将广大民众和各党派团结抗战等材料，带回南洋，增加侨众的爱国热心，更好的以

财力援助祖国抗战。他表示将亲往延安视察，以明真相，不负侨胞之委托。四月初旬，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至嘉陵宾馆访晤陈嘉庚，就有关国共两党磨擦问题进行了交谈。越日，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驻地举行茶会欢迎陈嘉庚等，林伯渠、陈嘉庚、叶剑英相继在会上致词。陈嘉庚还询问了如何去延安访问毛泽东等许多情况。五月三十一日，陈嘉庚率领慰劳团第一组到达延安，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及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至重庆嘉陵宾馆会见陈嘉庚，交谈了国共两党间的磨擦及其谈判调解情况。二十四日，叶剑英往见陈嘉庚，就国共两党关系和谈判情况再一次进行了交谈。二十五日晚，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之邀，演讲了“西北观感”。二十七日，《新华日报》登出演讲辞全文，国民党对此大为不满。陈嘉庚得悉后说，“事实胜于雄辩，共产党果有良好政治，自能树进势力，外间毁誉何关大局。”

三月三十日 汪精卫等汉奸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为代理主席，发表所谓还都宣言，招降重庆蒋介石政府。

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一日 中共中央两电南方局，指示鉴于成都“抢米事件”的发生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我

八路军、新四军节节进逼与攻击，我党对国民党顽固分子应引起严重警惕，立即采取各种应变措施。南方局遵照指示精神，即向所属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通知”说，国民党顽固派的压迫日甚，反共活动愈演愈烈，时局严重，为巩固我们的组织，保证我党的各级组织经常活动免遭打击，以利抗战建国之顺利进行，必须立即改变我们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因此决定：(1)各地党组织立即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2)公开作统战工作的同志不参加党的秘密组织活动，只与相当的领导机关负责同志个别联系。(3)各地方党的组织不举行党员大会和各级委员会的扩大会议，缩小领导机关。(4)下决心迅速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5)建立完全秘密的接头会和通讯机关。(6)组织工作重心应放在巩固党的组织上面。(7)一切党的组织和每个党员应绝对遵守最近南方局所发的秘密工作条例，违反与破坏者，必须受到处罚。(8)加强党员的训练和秘密工作教育。(9)各级干部应尽可能职业化。(10)党员被捕后，绝对不能暴露任何党的秘密、党的组织，绝对不能供出其他同志，违者应受到严厉处分。各省委、特委遵照南方局的紧急通知，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撤退和隐蔽措施，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式上，都作了积极的转变。

三月 南方局因成都时局严重恶化，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又在“抢米事件”中不幸被捕，决定改组川康特委。指示将比较暴露的邹风平、张曙、甘棠等送回延安，由程子健任书记，与于江震（组织部长）、郑伯克（宣传部长）、孙敬文（青委负责人）等组成川康特委，继续领导川西和西康的地下工作。并要求改组后的川康特委坚决执行中央和南方局新近发出的紧急指示。

三月 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建立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由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李策组成，邓止戈为书记）奉南方局通知到重庆。南方局代理书记博古指示邓止戈，贵州党组织应作紧急疏散，另建荫蔽的新的领导机构，已暴露的干部要撤走。根据南方局决定，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和熊蕴竹离黔赴南方局，后撤回延安。四月，建立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由邓止戈、陈于彤、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组成，邓止戈任书记，肖次瞻任秘书长（肖次瞻七月被捕后，杜守敦任秘书长）。邓止戈离黔回南方局后，贵州省临工委工作即由陈于彤、张述成、杜守敦负责。临工委的任务主要是贯彻党的“精干荫蔽”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转移

到省外活动。这年夏天，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临工委将贵州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全省划分为贵阳、黔北、黔西、黔东四个区进行领导，严格执行单线联系。一九四一年一月，南方局决定调陈于彤回重庆；省临工委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陈于彤在重庆，张述成在桂林，杜守敦在昆明分别负责联系贵州转出来的党员坚持工作。

四月一日 中共中央就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次会议等问题致电凯丰、董必武、叶剑英，指示积极争取民主党派和中间分子。

同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在重庆开幕，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林伯渠、邓颖超先后报到出席。会议历时十天，于十日闭幕。在九日的大会上，中共参政员秦邦宪、董必武被选为驻会委员。

四月七日 李克农致电南方局并党中央，就广西当局和地方绅士等筹组中间集团一事，请南方局和党中央给予指示。电报说：广西当局筹组中间集团是白崇禧去重庆前授意的。他们认为蒋介石已成为过时人物，以他为中心不能支持抗战到底；共产党的威望不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力量与国外华侨；汪精卫政权不可小视；中央财经已毫无办法，因此须组织一中间集团。他们用坚持抗战，实现民主，军队、司法不能

党化为口号，以桂系为中心，向各地方实力联络。在广西当局将此征询桂林办事处意见时，李克农以个人名义作了答复，指出这种作法是对时局悲观，对汪伪政权恐惧，企图保存自己实力的作法。李克农在给南方局和中央的电报中建议：派人进入其内部，争取它成为倾向我党的中间集团。

四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湖南党的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要求湖南党“无论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按照这一方针来一个彻底转变”。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立即对各地党组织作了撤退、转移、荫蔽的部署，强调党员干部职业化，扎根于各行各业中。

四月二十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社论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提出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是：更广泛的坚固的团结起来，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和分裂倒退的思想，反对汪逆精卫等的伪三民主义，反对一切妥协投降的思想准备活动，提高人民对抗战建国的正确认识 and 抗战必胜的信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更加扩大和巩固而斗争；在科学的立场上进行批判地研究，认识抗战建国过程中的社会发展，大量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

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努力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政治上文化上开倒车；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尽可能帮助文化工作者。总之，全国文化界应为创造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而努力，为动员一切力量，加紧团结、抗战、进步，争取最后胜利而努力！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电叶剑英说，我八路军为顾全大局遵令一再撤退，而蒋部则在太岳地区集结七个军，得寸进尺，欲一战而后快。指示立即经过张冲、刘为章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质问，并告诉他们，如逼人太甚，引起武装冲突，责任完全在他们。

五月四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指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方针，应和战争区、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

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党的机关则应极端秘密”，“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南方局在以后的几年工作中，坚定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

五月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国民党通令军政教育机关公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否则不许任职。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共产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已经相当暴露之党员，则应拒绝加入。凡被迫或由我党决定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之党员，必须经常加强阶级教育，同时给以工作方法之教育，“使之能长期埋伏，谨慎策略地进行与群众联系之工作”。

五月九日 周恩来写信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谴责他背信弃义，制造旧军打新军事件，

破坏团结抗战，奉劝他看清形势，以抗战团结计，不要再作此类事情。同时表示自己愿对山西之团结尽力，以挽危局，以利抗战。

五月十日 周恩来离开延安往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工作，并和国民党继续谈判。周恩来是今年三月二十五日由苏联回到延安的。本日，由延安出发，途经成都时，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五月三十一日到达重庆。

五月十六日 《新华日报》从即日起辟《妇女之路》专页，该刊由南方局妇委(后为妇女组)主编，每两星期一刊。

五月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叶挺因与项英的矛盾，暂时离开新四军)，反对蒋介石重新解决新四军问题指示项英和周恩来、叶剑英。指示说：蒋介石在西安向我们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另派他人充任新四军军长之意，又不准新四军在江北的四支队及八团用新四军名义。中央要求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明确确定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并让叶挺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坚决反对蒋介石另任命新四军军长，并抗议不准新四军四支队及八团用新四军名义，要蒋下令纠正。周恩来、叶

剑英及时地对叶挺作了细致的工作，使叶挺愉快地回到了新四军，并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

同月 何应钦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诬指邹韬奋、沙千里、沈钧儒将领导国民党政治部举办的四川綦江县的战干团学生等于七月七日举行暴动，因此，国民党最高当局令军警机关、各地方党部严加防范，并派武装特务严密监视邹韬奋、沙千里、沈钧儒的行动和住所。同时，指使干训团桂永清伙同特务对干训团内一些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严刑拷问，毒打成招。被残暴杀害及致伤的青年达四百余人，制造了血腥的綦江战干团惨案。

六月三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决定指示，今后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工作中心由校外的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南方局青委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根本方针，使南方广大地区的青年工作从组织上、作风上、思想上迅速实现了转变，适应了急剧变化的新形势。

六月四日 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两方代表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自去年三月上旬在香港第一次密谈后，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加紧反共活动，为投降日本作准备；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的催促日方尽

快接受他们的卖国要求，达成妥协，联合反共。本年三月十日，蒋介石政府向日本提出了以反共防共为中心，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八条所谓“和平意见”。四月十一日和五月七日，先后派出宋子良和章友三去港催促日方答应会谈。五月十三日，宋、章二人在九龙旅馆会见日方代表今井武夫、铃木中佐、板垣。章友三说：只要日、华两军实行停战，重庆政府就将同时发表反共声明。希望能在六月上旬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并告诉日方，重庆政府打算派遣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或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参加正式会谈的代表。五月十七日，宋子良在与今井武夫密谈时说，蒋介石内心希望“和平”确实是事实，目前在重庆方面反对达到“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并说蒋介石集团已经制订了反共计划，如果可能，将在七月以前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商完毕；对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已时，考虑利用最后的强硬手段”等等。为此，六月四日，蒋、日双方代表在澳门举行预备性秘密会谈，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意见。后因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举行会谈的场所问题迟迟达不成协议，加之七月十六日日本内阁易人，日本政局变化，所谓的中、日“和平会谈”搁浅，但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之

间的妥协投降活动，一直延续至一九四四年。

六月五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召集干部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和我党应采取的方针、策略等问题作了报告。

六月中旬 董必武奉中共中央指示自重庆回延安。十月中旬奉命到西安主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离开西安至重庆，继续协助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的工作。

六月十六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说：所有新闻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各报对新闻检查机关“务须切实服从”，“对投稿人务取得其真实姓名地址”，“如各报违反该项规定，即严加检扣，倘不遵从，严予论处。”

六月至八月 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在重庆多次进行谈判，并递交了我党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各党派之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停止查禁各地之书报杂志，给《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以法律保障，允许登载中共之文件及领导人之言论文章；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承认陕甘宁边区（二十

三县)隶属行政院，以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准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军械粮饷及医药卫生、交通器材供给应与国民党军同等待遇，并划分国共军队的作战区域。七月二日，国民党将一复案交与周恩来、叶剑英。接着，双方代表围绕两案中所提问题，反复谈判。七月二十日，国民党把它在本月十六日拟定的“提示案”送给我党，以“最后决定”的方式对我“六月提案”及历次谈判所提出的原则要求作答复。“提示案”说，只有在不违反国民党当局法令之范围内，才给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和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以保证；陕甘宁边区只能有十八县并须改为“陕北行政区”，设“陕北行政区公署”，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府指导，区公署主任及其组织“由政府以命令定之”；十八集团军编为三军六师另六个补充团，新四军编为两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对于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问题，“提示案”规定两军在命令到达一月之内，全部开到国民党圈定的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区内，新四军加入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归第二战区指挥，两军的一切行动得绝对服从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不得越出指定地域作战；十八集团军、新四

军开入指定地域后，“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携带国民党的“提示案”及国共两党近期谈判情况回延安。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通报》，向全党简介了国共谈判的具体内容，并且说明目前仍是拖的局面，但国内外局势有利于我们解决某些局部问题。努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争取二百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对剿共消极，仍为推动时局好转之中心一环。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由延抵渝，九月初将我党在八月中拟定的复案提交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转国民党中央。此案要求陕甘宁边区“现在所辖之区域”划为陕北行政区；扩编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个师，新四军为三个师，其编制照甲种军及调整师办理，应供给足够的补给；改组冀察两省政府，其主席由中共保荐；保障“各抗日党派在全国之合法权”，“中国人民之敌后游击权”，“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作战权”，在此情况下，我方原则上同意划分区域。同时，周恩来又向国民党提出三项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

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这时因苏北冲突发生，对此提案、办法的商谈搁置下来。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要我党我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照它的所谓“提示案”办，否则就是违抗“军令”、“政令”，遂有十月的何、白“皓”电发出。

六月 中共广东省委在南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前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决定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和惠(阳)东(莞)宝(安)党组织移交给东江特委领导，尹林平为东江两支人民抗日武装的政委。会议遵照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将中共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组织部长李大林、宣传部长涂振农、副部长李殷丹，青年部长陈能兴，副部长张江明，妇女部长朱瑞瑶。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钧予，宣传部长石辟澜，妇女部长邓戈明。

夏 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嘴接见生活书店的徐伯昕、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新知书店的徐雪寒，指示他们除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做好出版发行工作外，还应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发行工作。三书店遵照周恩来指示，迅速在解放区设立了书店，并在其工作中逐步走向联合。皖南事变后，又

按南方局指示，将中心移至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又转到桂林。

七月七日 《新华日报》举行“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会，并欢迎周恩来、邓颖超回渝。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国内外形势，着重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他说，为了克服这种严重局势，必须努力从外交上采取坚定明确的政策；从内政上力求进步，改善与巩固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着坚持抗战与争得最后胜利。他勉励报社全体同志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继续奋斗。

同日 周恩来、叶剑英两次致函何应钦，抗议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进攻，要求迅速制止石友三集团军对第十八集团军的三路进攻，制止韩德勤部、冷欣部及皖南的五十二师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

七月十四日 国民党军事当局及有关战区司令官连电苏北所部，令其对新四军“严厉制裁”，“限本年底完成消灭苏北中共部队并建立苏北中央军事根据地之计划”，但不得在报端提出“抗日必先剿共之口号”。十六日，国民党军事当局又电苏北国民党各军师长说：“据报中共企图于本年底造成苏北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我等部队缺乏消灭共产党之诚意，士兵训练亦感不足，往往临阵脱逃或其他损失，致影响战斗情绪，

使其指挥不能统一，意志不能集中，此系造成中共扩大主因”，责令整治，加强剿共。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出渝字第13313号通令，命令各军队党部与地方党部密切合作，更坚决地进行反共活动。八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军成都行辕电令川康各地“严密执行”本年五月有川康党政军高级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治安会议”通过的所谓《川康防止奸党活动对策》。

八月二日 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新华日报》社，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德意日、美英法和苏联三个阵线的斗争，但最近《新华日报》还没有把握住这个特点。指示说，我们应把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既不要去鼓励美国的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也不要因英美改变对日华政策（即放弃远东慕尼黑政策）而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指示说，在外交政策问题及内政改革上，你们应与各中间派报纸的某些正确观点取统一战线态度，不采取对立态度，以便有力的打击投降派。

八月三日 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陕西、江苏、广东省委，对共产党员作国民党区的公务人员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我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注意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

层各级行政机构公务员(从保甲长、区长到县科员以至个别县长)之地位,这对于党和革命工作,具有严重的作用和意义。并且要求在国民党工作的公务员的共产党员;必须克服过去那种“左”倾幼稚错误。

八月十二日 邓颖超发表《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澹”的批判》一文。上月六日,《大公报》发表了端木露西的文章《蔚蓝中一点黯澹》后,引起了妇女界的强烈反映,邓颖超遂于《新华日报》“妇女之路”第七期上发表了《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澹”的批判》,对端木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悲观失望、消极倒退、腐朽自私的观点,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尖锐地批判。文章指出,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对抗战悲观失望,无自信心,企图妥协投降的情绪的反映,也是一年来复古倒退逆流在妇女问题上的反映。文章阐述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论问题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任务。

八月十三日 重庆妇女界二十多个团体在求精中学召开纪念“八一三”及检讨三年来妇女工作的大会。邓颖超、曹孟君、史良、韩幽桐等在会上讲话。邓颖超的讲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和今后的妇女工作任务。她说,国际上“已分成了德意日、英美法和苏联三条阵线的斗争”,在国内,我国抗战正处在一个“空

前困难的时候”，“我们希望消灭一切妨碍团结的磨擦，我们希望今天团结更有进步，但希望着中国政治上的进步”。抗战三年来，“妇女运动发展的路线是正确的”。今后妇女工作应注意：（一）掌握住这个方向和民族解放一起向前发展；（二）妇运向前发展是与动员广大的妇女息息相关的；（三）向落后的方面突击，克服妇运中的缺点；（四）大大的展开敌后沦陷区的妇女工作，号召组织更多的战地服务团去；（五）要在实际工作中大批的培养干部，要大公无私的团结和保护干部；（六）要下决心，使全国三百多个妇女团体个个成为坚固的堡垒，要真有群众，真做事情，使中国妇女大众真能团结而不是徒挂空名！她说：“妇女运动的缺点与整个政治上的退潮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要争取政治上的进步，要保卫我们的堡垒！”会后，还举行扩大反汪签名运动和劳军运动。

八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统战部一定要加强，做好交朋友的工作，交友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格责备。

八、九月间 孔原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去到重庆巴县木洞镇建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工委”）。西南工委负责领导川东特委、川康特委、贵州省临工委、云南省工委、湘鄂西区党委的工作。

孔原任工委书记、钱瑛、廖志高、于江震、蔡书彬等先后参加西南工委为委员。同年冬，孔原在木洞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南方局获悉即通知孔原等撤回红岩嘴。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又指定钱瑛为西南工委书记，去成都组织机关，廖志高为副书记。钱瑛去成都后，因环境恶劣，机关未能完全形成，于是年冬又回到红岩嘴。一九四二年春西南工委撤销。

九月三日 周恩来在重庆就时局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欧战扩大对太平洋的影响和日寇军事进攻的情况。

九月五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时局甚为紧急，我党应有保卫重庆、保卫西南和西北的积极主张。在政治上，应继续要求动员民众，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等；在军事上，应提出八路军以三分之一开赴湖北担负保卫重庆的任务，新四军不能北移。此主张不仅是抵制蒋介石对我之压迫，而主要是认真挽救国家之危亡。

九月六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饶漱石，指示作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调查工作。要求每省调查数十人到一百人，由各省党委分别负责。南方局根据这一指示，作了认真研究，具体部署，并依据指示精神，发动党员对国

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特等各个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九月九日 新四军军长叶挺电蒋介石，历数韩德勤部破坏团结抗战、积极反共，进攻我新四军的罪行，要求立即制止对新四军的围攻。

同日 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党部下达取缔中共刊物、捣毁其销售书店密令。密令说：“共产党实施宣传政策，自办新华书店外，复利用各书商推行书籍。今后对付之方法为（1）对以营业为目的之书店，应以威胁方法或劝告方式，使其停止推销。（2）对共产党书店应派人以群众面目大批收买而后焚之，或冲进该店捣毁之。惟事先应布置周密，与当地军警宪主管机关取得联系，接洽妥当，对外绝对秘密，以免对方借口。其进行情形，随时呈报。”

九月十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的作用、意义及如何发展这一运动作了明确的指示。指示说：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区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

在自己的日程上。”应动员与联合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各部门的文化人与青年学生共同投入这一运动。关于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与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南方局遵照这一指示进行研究和部署，并决定由周恩来、凯丰负责文委工作。在南方局文委的组织领导下，党在南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文化统战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一直在斗争中健康发展，对国民党始终占着优势。

九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第一号)。通知说，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敌后城市工作，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周恩来总负责，康生副之，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在中央局、中央分局及临近敌后的区党委，亦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各委员会除了主持人外，须有专门人员负责进行研究工作与搜集培养派遣到敌后工作的干部。根据“通知”精神，南方局立即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兼职主持。

九月中旬 广东东江两支人民抗日武装在宝安县召开干部会议。会议由尹林平主持，传达了党中央南

方局指示，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确定深入敌后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决定改部队名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

九月二十七日 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承认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霸权，德、意承认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相约在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三国军事条约的缔结，对欧洲和东方战场以及蒋介石集团的政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九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应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在重庆巴蜀中学发表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著名演说，到会听众达三千余人。周恩来从“世界往那个方向走”；“中国向那个方面走”；“欧战向那个方向发展”；“日美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苏联保持什么立场”；“中国采取什么立场”；“日本能否结束中国事件”；“中国有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危机”；“中国怎样使抗战进步”等几个方面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正在持久扩大，中国抗战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危险。但只要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勿对美日冲突存幻想，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的演讲使各阶层群众、各民主党派人士

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休会时，周恩来为中华职教社的王席君题词：“笔战是抗战的前驱，也是抗战的后盾。”

九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邓颖超到北碚会见了陶行知、陈望道等，并去育才学校看望了师生们，还给他们讲了当前形势。

九月下旬 周恩来派杨第甫等去鄂西加强农村工作。周恩来在红岩嘴办事处向杨第甫等传达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分析了当前形势和鄂西的情况。指出：鄂西是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是重庆的门户。过去是老苏区，现在也是我们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要求杨等到鄂西后，首先要把建立农村支部作为工作的重点，并强调所有干部都要社会化、职业化，要干什么，就象什么，而且要成为本行的能手。还指出：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这次他到恩施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带了一批特务去，会对我党下毒手的。鄂西党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坚持鄂西工作。后来果然发生鄂西事件，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鄂西农村工作未能开展起来。

九、十月间 南方局将所属一部分省委、特委负责人调回重庆，由周恩来、博古等南方局领导人及组织部同志分别进行谈话，讨论如何进行审干工作及彻

底改变领导方式等问题，并对川康地区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十月一日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内部刊物《共产党人》第十一期上发表《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陈云说，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后一年多来，我们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党组织的巩固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些秘密组织一般说来还极不巩固。今后必须做到：一、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二、首先保证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三、大后方的党员应实行以巩固为主的方针，质量重于数量。四、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如果党的组织严密了，精干了，隐蔽了，党员的质量提高了，党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养成了，每个党员在社会上获得地位而被公认为好人，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才称得上是巩固的，才能完成中央所给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任务。

十月十四日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叶剑英说：苏北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麟、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

取他们在苏北同我们合作，并经过他们争取更多的民族资本家。

同日 周恩来在曾家岩五十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告以我党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希望高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做一件有益的工作，即把西南的民族资本家联系起来，一致与四大家族对抗，至少使民族资本家不致被四大家族吞噬或者被诱迫投入四大家族的怀抱。

十月十六日 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南方局对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湖北、贵州及川康等省市地区的工作布置和人事安排情况。电报说，全局性的方针，依中央的指示不变。各地工作已开始转变，完全转入地下，进行干部审查，其重点在深入社会和肃清内奸两方面，干部在撤退中。并说，刘晓已去上海，铁铮（即孔原）拟去黔，（因孔原十一月接任南方局组织部长未能出去）布置西南工委中心，钱瑛代表南方局去成都指导川康特委工作，方方亦离渝南下。电报向中央建议钱瑛参加西南工作委员会，建议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五人组成南方工作委员会，均得中央批准。

十月十九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文化艺术社、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

国民外交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全国戏剧、电影、美术、木刻、音乐各界“抗敌协会”等十二团体，在重庆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大会。冯玉祥、周恩来、梁寒操、叶剑英、沈钧儒、郭沫若、老舍、王昆仑、胡风、田汉等三百余人与会。当晚，重庆文化艺术界五十余人举行聚餐晚会，周恩来与会并演讲。他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斗士。对鲁迅的一生作出了崇高的评价，号召向鲁迅学习。

同日 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并要我党执行所谓“中央提示案”，开始了抗战期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十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了南方局各部门近期来的分工及整个工作布置情况。报告说南方局机关分别设立组织、宣传、社会三部，统委、文委、国际问题研究室、叶剑英工作组、南洋工作、敌后工作、秘书处共十个部门。组织部管干部，领导交通、发行、党费收支及直属党员，博古任部长，石磊（曹瑛）秘书，工作人员三人；宣传部主管宣传教育，党报、党

刊(《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图书室，负责指导有关刊物，编审国际宣传资料，凯丰为部长，许涤新秘书，有工作人员三人；统委主管统战工作及直属党员与非党干部，董必武书记，叶剑英副书记，王梓木秘书，委员六人，统委下设军政、党派、社会、妇女、青年五个组，妇、青两组由妇、青两委兼，妇委邓颖超书记，委员四人，青委蒋南翔书记，委员三人，文委分管文化及直属党员与非党干部，凯丰书记，周恩来副书记，徐冰秘书，委员五人，下分书店、宣传、文化、文艺、新闻五个组；国际问题研究室，由博古领导，章汉夫具体负责，叶剑英工作组叶剑英负责；南洋工作博古负责；敌后工作周恩来负责，社会部博古部长，吴克坚、李涛为委员，李涛兼秘书、情报工作；秘书处下分机要、报务、文书三组(科)，童小鹏任秘书。报告还就南方局对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贵州、福建、鄂西各地方实力派和上层人士的工作情况及新的布置作了汇报。

十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说，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动态，已证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表明了他们的决心。中间势力一部分已在畏缩，一部分已参加反苏反共。如果国际形势更有利于英美派，局部

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形势将会日益恶化。因此提议：（一）十九日电（皓电），我们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二）军事上有两个方案：一是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便于我军集结应战。二是主力立即分散，一部分秘密移至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不论怎样都须作应战准备。李先念部要防止陈诚去清剿。电报说，重庆已处僵局，我们正在向各方作解释工作，报纸宣传已被封锁，现力争油印散发文件抗议及口头宣传。次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国民党现在发动反共新高潮的目的；一方面在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另一方面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以求交换日本对他的让步。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要准备对付黑暗的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

十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指示加强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和敌后大城市的电台工作。指示说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我们在国民党区域与敌后大城市中的电台工作，将会受到更大的困难，与更严重的压迫，因此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克服在工作中在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准备在最坏的条件下，最秘密的环境中继续保持电台工作，这是我们在国统区与敌后“一切工作的生

命线”。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电台工作一向非常重视，在接到中央这一指示后，立即对南方局领导下的所有电台作了进一步的指示，进行了新的部署。强调进行技术培训，严格机密工作纪律，并抽调技术上较强的同志到一些地方去加强工作，或者另建新台。因此，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以及后来在各地不断发生的反共破坏事件里，南方局领导下的电台都很少遭到破坏。南方局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八年中，先后于十五个地区建立了约六十部电台，而且还联系了一批“朋友台”，在南方整个国统区域和敌后大城市形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十月二十八日 《新华日报》营业部在重庆市民生路二〇八号正式营业，至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国民党指使特务、流氓捣毁（以后改在德兴里二十九号继续营业）。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尤其是皖南事变后的一两年，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和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常到这楼上会见各界人士；一些地下党同志到南方局接关系，也多通过这里。因此，它又是南方局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十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秦邦宪与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邹韬奋、张申府等民主党派人士讨论当前形势，并听取他们对国内团结的意见。

十月 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九月,南方局通知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和中共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回重庆,方、张两人于九、十月间先后到达。南方局领导同志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了当前时局和今后工作,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福建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并决定了有关的重大问题。

十一月 方方、张文彬分别返回原地,着手筹组南委。次年春,南委在广东大埔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并商定了组织分工和今后工作布置。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不久,改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委员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南委下辖三个省委一个工委五个特委,即: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宣传部长骆奇勋、社会部长林民凤(鸣凤)、青年部长唐敬斋、军事部长颜福华;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统战部长饶彰风、组织部长饶卫华、宣传部长黄康、副部长李殷丹、青年部长陈能兴、副部长张江明、妇委朱瑞瑶、秘书长严重(陈志华);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宣传部长石辟澜、妇女部长邓戈

明，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副书记苏曼、组织部长黄彰、宣传部长彭维之、妇女部长罗文坤；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副书记林李明、组织部长王白仑、宣传部长陈健、民运部长欧绍汉、统战部长黄魂；潮梅临时特委（1940年12月建立），书记姚铎（后为李平）、组织部长何浚、宣传部长林美南、妇女部长方朗（1941年9月改特派员制后，林美南任特派员，李平为副特派员）；闽西特委，书记王涛（一九四一年九月牺牲后，魏金水接任）；闽南特委，书记朱曼平；湘南特委负责人周礼。

十一月一日 周恩来两次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告以重庆各方多希望我党取缓和缓转的政策，勿使国共分裂，并陈述南方局对解决目前危局的办法。电报说：现在离“皓电”限期只二十天了，时机紧迫，南方局同志建议中央考虑下列办法：（一）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公开答复何应钦、白崇禧并转蒋介石，要求解决悬案。表示在充分保障扩军、弹饷之下，可将新四军调至江北，使能延缓一、二月时间，便于我作应付事变之布置。（二）一切照旧，准备打了再说。但也须先电何、白，说明不能移动之苦衷。次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主

张争取缓和，准备抵抗。告诉周恩来，复何、白的电报已拟好，十号左右发出。“关于南方局布置及宣传反驳诸项，各同志均同意你及南方局意见，毫无异议。”复电说：此次蒋介石如果投降，必须是四分五裂，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是能打得开局面的。

同日 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国民党为强化法西斯文化专制，借改组军委会政治部之机撤消了政治部第三厅，企图把郭沫若为首的一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排挤出去。周恩来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并表示愿将三厅全部文化人接到延安。后经新任政治部长张治中的转圜，决定于政治部之下，设立一个从组织机构到活动范围，都大大小于三厅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为副主任委员。新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虽受到种种限制，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在南方局和郭沫若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三厅时期的战斗作用。

同日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发出《关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指示》，对健全各级统战组织，加强统战工作的领导，严格管理统战干部的制度以及统战工作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等，作了具体指示。南方局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指示，使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在

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得到广泛的展开，国统区广大人士，特别是广大的中间势力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逐步地向我党靠拢，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

十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指示即刻按南方局的意见“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但在彼方未动兵之前，一切对外均取缓和态度。同日，毛泽东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又指出，蒋介石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投降还在讨价还价，依靠英美取胜，近一、二年内又不大可能；一心要剿灭共产党，又怕内乱，更怕共产党和苏联。因此，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包括中间派及蒋集团中的部分将领）及苏联三方面的压力配合得好，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目前我们答应皖南部队北开，答应和平解决，避免内战，做到仁至义尽。我们的政策是：一方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方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后一方面。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吃亏、上当，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复辙了。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

同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叶挺、项英，告

以中央决定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何、白“皓电”。指示，对国民党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皖南方面决定让步北移。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指示加强反对投降宣传，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舆论，呼吁停止内战，加紧统战工作，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完全有秩序的退却下来。

十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他向何应钦、白崇禧及各方表示，为顾全大局，我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开，我桂林办事处尚须暂时保留，准备撤销。

十一月六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内对外的联络，制止投降分裂。指示说：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着投降分裂的危险。要求全党动员起来，联合一切积极分子，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向政府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

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全中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我们共产党愿与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到底，而对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决不容忍。指示要求积极加紧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指示党在国统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必须“全部的完全的有秩序的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指示说，时局的最后结果究竟如何，“主要依靠我党的政策与工作来决定”。但是，“不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最后战胜这些黑暗的，全世界与全中国的任何黑暗都是暂时的，只有依靠着自己坚决斗争与坚固团结的革命政党与革命人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党内外必然发生的一切悲观动摇情绪必须予以坚决的克服。”南方局根据中央这一指示，及时对所属各地下党组织进行了传达贯彻，并从思想教育上、组织上、行动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同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告以俟“佳电”发出后各项工作的部署情况。同时要求南方局调查汤恩伯部队的移动情况，并向张冲提出，汤部东进引起战事冲突，我方对此不负责。南方局及时弄清了汤部的动向，并向张冲提出了抗议。

十一月九日 中共中央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复何应钦、白崇禧电(即“佳电”),驳斥国民党“皓电”的造谣诬蔑及荒谬命令,同时又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我江南部队将移至长江以北。这一立场,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那些不愿意国共分裂的国民党党政要人)的同情。

十一月十日 蒋介石不顾我党我军的抗议和呼吁,密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新四军不在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北移,“应立即将其解决”。

十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叶剑英与民主党派的张君勱、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在张申府家集会,交谈近来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情况,周恩来告以江南新四军正在北移中。

十一月二十四日 新四军军长叶挺发表关于新四军管文蔚和陈毅两部已遵命北移的声明。

十一月 遵照中央本月三日电示,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博古,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凯丰离渝回延安。

同月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南方局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工作的情况。报告说:自上月八号起,我们即以反对投降、反对内战为中心口号。《新华日报》从十

一月一日起，强调倭寇诱降及国内投降危机。统战、外交、宣传各方面都在动员，党内外我及剑英在做报告讲话，分头奔走。军事方面已向张冲作过提议，尚未对执行“皓电”的办法作具体表示。国民党元老派及各党派都已见过，他们同意反对投降，反对内战，但又都建议我们也要让一步，使分开蒋介石与何应钦，分化何应钦与白崇禧，孤立亲日派，以挽危局。

十一月 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南方局向马子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针，以及关于疏散隐蔽云南地下党干部的决定和布置。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周恩来在重庆向云南省工委委员费炳也作了同样的指示。指示原省工委委员或调回南方局，或就地荫蔽和转移；省工委所属青委、职工委等机构撤销，党员实行单线联系。三月，南方局派涂国林到昆明，接替马子卿的工作。

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告以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二个条件，即：一、我同意将皖南部队北移，但需延期。二、我苏鲁皖部队不能开动。三、我华北八路军因无粮饷、弹药，准备南下。四、国民党应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五、国民党释放罗世

文，我方释放孙启人。六、停止在陇海路、咸榆路捕人扣车。七、张国焘、叶青不应聘为参政员，否则我将退出参政会。八、桂林八办不能撤销。九、国民政府应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欠饷亦应补发。十、停止石友三隔离黄河的行动。十一、保障我在各地办事处之安全。十二、拒绝同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十二月八日 何应钦、白崇禧再次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动员。次日，蒋介石发出手令，要我“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毋得再误”。

十二月十二日 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国统区青年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一是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两者不可偏废，而其统一的中心一环，就是党员必须加强社会活动，取得社会地位。”

十二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与张君勱、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钧、黄炎培、邹韬奋在良庄沈钧儒家会见美国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

她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也就在这前后几天中，周恩来在驻地同斯特朗进行了几次长谈，以大量的确凿材料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投降阴谋，预言更大的反共事变将接踵而至。次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在美国发表了周恩来揭露蒋介石国民党长期媚外反共、酝酿内战的材料。

十二月二十四日 国共两党代表就两党关系问题在重庆举行谈判。近期里，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的代表刘为章和张冲（张淮南）举行过多次谈判，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的限期，要国民党军队停止磨擦活动。在本日的谈判中，周恩来、叶剑英严正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如果国民党再不停止进攻，陕北的封锁仍不解除，那末，发生内战的责任全在国民党。三十日，周恩来再次向国民党方面申明：此次我军北移，只是皖南新四军，其他不动，国民党必须停止在陕北、皖北和苏北的军事行动。在不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还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同时，南方局组织力量，将有关材料（包括半年来国共双方来往文电和国民党的反共文件）汇印成册秘密发出，并通过外国朋友把材料带到香港向国外宣传。

同日 南方局为《新华日报》改革问题致电中央书记处和党报委员会。电报说，《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的严密检查和压迫下，处境日渐困难，不仅扣留文章很多，且国民党中宣部还准备以所谓“群众”力量将《新华日报》打掉。为使该报能合法存在，拟从新年起大加改革，不一定天天有社论，刊登多方面的材料，而且不要每篇都是政治化的面孔，实行烘托宣传。毛泽东批示，表示赞成。

十二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要他直接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

同日 蒋介石邀见周恩来，大谈其什么他不愿意内战，不希望自相残杀，就是过去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他也很“难过”。他说，今天他要中共军队开到黄河以北，是为中共着想，那里地区大，待中共去发展，去实现抱负，如果共军非留在江北不可，冲突决难避免，共军必失败。他要新四军从皖北过江。他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还说，他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提议为“和平与友谊”干杯。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威胁当场予以驳回，申明了中共的立场，并警觉到这是蒋介石要对我发起进攻的一个信号。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蒋在“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

“蒋介石的保证是靠不住的，他的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果然，不出十天，蒋介石就发动了“皖南事变”。

同日 周恩来与张君勱、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在章伯钧家会商当前时局。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海南的军事政治工作问题指示南方局转海南、桂林、香港。在军事上，对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必须给予坚决回击；对地方武装加紧进行联络争取，使顽固派在军事上孤立。在政治上，采取公开发表声明及其他各种方式，在国内各界及侨胞中作深入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使顽固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的一切宣传应站在自卫的及迫不得已起而抵抗顽方进攻的立场。指示要求海南我党组织和部队领导，应及时将各种情况及在战斗中缴获顽军的反共文件内容等电告中央、南方局及香港、桂林，以便指示和在各地宣传事实真象。

十二月三十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指示皖南新四军按周恩来的意见分批走苏南。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向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发出《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及其在

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击”。同时指出，蒋介石集团虽然气势汹汹的派遣部队向我军举行进攻，但他目前“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内战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因此，“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

十二月 中共粤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张文彬到会传达南方局关于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对粤北省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李大林任省委书记。管辖东江、西江、北江和赣南特委。

同月 南方局经济组正式成立，组长许涤新。周恩来指示经济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财经政策，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 and 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济组正式成立之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钱之光负责。

年冬 南方局派张子斋回云南，在新闻、文化和地方实力派中开展统战工作，也继续对早同我党有联系的滇军二路指挥官张冲做工作。

一 九 四 一 年

一月三日 蒋介石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令新四

军就近结集，而后沿所指定的路线渡江，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并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

一月五日 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共九千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起程北移，次日行至茂林地区，即遭国民党七个师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被迫还击，激战至十三日。面临全军覆没之际，叶挺执行组织的意见，前往国民党顽军上官云相处交涉。上官云相将叶挺扣留，并加紧对新四军的攻击，至十四日夜新四军除一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月八日 美洲洪门致公党总监司徒美堂等致电国共两党领导人。电谓，最近读朱、彭、叶、项致何、白佳电，列举国共磨擦事，不敢轻信，迨中外电讯播传其事，始悉军事当局确曾下令新四军移防，并以二十五万国军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证实佳电所述系事实。国共分裂形势严重，海外闻之，万分惊骇。今大敌当前，自毁长城，自促亡国，谁不痛心。电请两党领袖，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

一月十一日 《新华日报》和办事处的同志在报馆举行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叶剑英莅临致

词。会间，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和苏北新四军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遵命北移，途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的急电，即在会上强烈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并激励大家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周恩来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如象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四军最近在向北移中，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但相信那些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因为他们有必胜的信心和艰苦卓绝的毅力！”会后，他立即写信给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向他提出抗议，要求急电制止。同时，指示《新华日报》将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阴谋透露出去。当晚，周恩来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了事变后的形势和斗争的方针，以及将采用的种种措施。随即他分电谴责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并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军队撤围让路。南方局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遵照紧急会议的决定，一面广泛地向国民党抗战派、元老派、各民主党派以及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士揭露何应钦等顽固派的反共罪行；一面积极准备各种应变措施。

同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重庆市党部及《中央日报》、《扫荡报》的有关人员在重庆市党部 共同商定限制《新华日报》的发行的办法六项：(1)由重庆市党部及三青团渝支部负责训练各报贩；(2)由中央、扫荡两报制发报贩号衣；(3)中央、扫荡两报改善对报贩态度，以联络感情；(4)中央、扫荡两报每日各提出一千份尽先交派报工会发售；(5)限定《新华日报》售价，每份售价为一角五分(因中央、扫荡两报批发价每份一角，零售一角五分)，而《新华日报》批发价每份四分，零售一角)；(6)由中央、扫荡两报给派报工会补助五百元。

一月十二日 国民党元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委、中监委，谴责蒋介石集团破坏团结抗战，积极实行剿共分裂政策。电报说：最近讨伐共军之声甚嚣尘上，这是违背了孙中山制定的联共政策，违背了抗战建国纲领及广大人民的意愿。今构成剿共之事实，不仅是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而且实足以使抗战建国之基础隳于一旦。今年是抗战最艰辛最重要的一年，希望蒋介石国民党慎守孙中山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平等地位。宋庆龄等此通电的发表，获得国内外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的一致支持，蒋介石集团剿杀“抗战之干城”的行径受

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在政治上十分孤立。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告以新四军在茂林已被国民党重兵包围达六天，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说明国民党有意破裂。次日，周恩来、叶剑英复电党中央，报告了同国民党刘为章交涉的情况。电报说，已告诉刘为章，我华北、华中将士得新四军在茂林被围攻恶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围攻，才能免除危机。并已提出要蒋介石、何应钦立令顾祝同解除茂林包围，让出新四军经苏南渡江的道路。刘答复说，蒋的意见是：（一）茂林方面不要继续打，已不成问题，昨夜（十二日）已要贺耀组下了命令。（二）新四军今后可走苏北，但须执行两点：第一、部队过江后不得打韩德勤。第二、须遵命继续到河北去，不得盘据。（三）新四军渡江后可发弹十万并军饷。（四）希望周恩来、叶剑英转告前方，勿将事件扩大。电报还说：“我现直函蒋抗议，并坚持非经过苏南过江不可。请中央询问叶（挺）、项（英），究竟他们采取那条道路折进苏南，以便作更具体的交涉。”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周恩来、叶剑英说，“现在已不是走何路线问题，是致死问题，应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

英名义发出通电，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七万余部队包围聚歼新四军的滔天罪行。同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在全国进行大逮捕，袭击我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北正加强对我边区的封锁；在华中则派遣二十余师正规军对我大举进攻。强烈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皖南新四军之军队，让开北上之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队，平毁西北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

同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集团袭击。周恩来接电后立即在南方局机关进行传达贯彻，研究布置应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措施，动员大家散发党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的通电，揭露国民党围攻新四军的罪行。

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我应采取之对策。指示说：中央决定在政治上进行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攻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的坚决的全面反攻，才能打倒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佳电”的中和态度应予终结。

同日 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会议，讨论对新四军的处置办法，通过撤消新四军番号等分裂国共合作，破坏抗战的反动决定。十七日，蒋

介石国民党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命令和谈话，诬陷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向张冲提出抗议，并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恩来在红岩嘴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向大家讲述了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况，以及应该怎样正确的进行斗争等问题。他指出，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还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的斗争之后，两党还继续维持合作抗日的关系。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他对国统区的应变对策作了全面的部署，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表示他将和同志们一道斗争到底。周恩来在他接到关于国民党当局扣留我《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稿件的报告后，以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指示刊登在被扣去稿件的地方，赶在重庆各大报纸之前发出。新华日报馆遵照周恩来指示，一方面巧妙的避开新闻检查加紧排印；一方面组织好发送报纸的队伍。次日凌晨，载

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送到了重庆人民群众及国内外人士手中。面对周恩来题词，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又无可奈何，只能以《新华日报》违检为由，给予一个“最后警告”的处分。这一天，一些中间的报纸虽然未能刊登周恩来题词，但也拒绝了刊载国民党军委下达的反动命令。十九日，南方局军事组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并在他们的亲自主持下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事实，编印成《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象》的传单，向国内外秘密散发，还巧妙地把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手中。

一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共行径。为揭露和反击国民党的进攻，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提高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情绪，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

同日 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说，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的环境日险，应即离渝返延。渝办和《新华日报》干部尽量减少，减下的同志设法分批回延。党外同情分子也应立即通知他们分

批转移到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费。二十日，中央又指示南方局和周恩来说，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要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将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资料、文件、密码、电稿作积极处理，对留在办事处人员应给以气节教育，作好最坏准备。二月一日，中央再电周恩来说，李先念部队有绝大的战略意义。要南方局将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疏散的党与非党干部尽可能的送到那里去。并指示派同志去川东、川北、川陕边、湘西、云南等五地秘密准备武装根据地，每处设一秘密电台，以备将来使用。南方局及时地分别向所属各级组织及有关人员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坚决贯彻执行，对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党与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荫蔽作了周密安排，还责成有关部门和同志制订了具体实施计划（二月二日叶剑英携此计划回延呈报了中央组织部）并负责执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鉴于南方国统区工作需要，仍留在重庆坚持工作。南方局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国统区实际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安全转移撤退荫蔽了一大批党与非党的干部，保存了党的骨干，同时也保存了红

岩这个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域里的指挥中心，有利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有利于党在蒋管区里各方面工作的继续深入进行。

同日 董必武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共进午餐，交谈对皖南事变的态度问题。

一月 皖南事变后，李克农向南方局建议，党在桂林的同志，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大明显者，也可以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待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

一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分布在华中、华东的九万余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的敌后抗战。

同日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工作人员在处长李克农率领下到重庆，除留下部分同志在南方局外，其余同志回延安。二十一日，贵阳警备司令部派军警包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捕走工作人员，封闭交通站。经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至八月被捕人员始得获释。二十三日国民党西安当局又非法搜查八路军

驻陕(西安)办事处之仓库、汽车队、兵站,捕去人员,收缴了武器装备。在这之前,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也被迫撤销。

一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整个阴谋计划及其反动实质,指出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是注定要失败的,并提出了要国民党“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解决皖南事变问题的办法十二条。南方局收到毛泽东这个谈话和二十日我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后,均立即翻印,广为散发。

一月二十四日 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管文蔚、叶飞、谭震林、罗炳辉、周骏鸣、戴季英、李先念、彭雪枫、张爱萍等新四军将领通电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呼吁全国人民必须速起注意,监视真正的叛变者。并指出:“夺去一叶挺,必有千百叶挺以继其后,覆灭一万新四军战士,必有数百万数千万忠于民族国家之新战士以继其后,而一切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之徒,虽逞志一时,

也难逃于覆没”。

同日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动向。报告说：皖南惨案发生后，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由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他们已与我们交换意见，我等深表赞同。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提出联苏联共为中心，主张与我党更密切合作，还派出章伯钧、邱哲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

一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交付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转蒋介石。

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就关于对付蒋介石的方针问题致电周恩来说，你们关于蒋介石不实行我党所提出的十二条，就不恢复谈判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在我党从政治上展开全面攻势，特别是提出十二条后，蒋介石集团深感被动，于是通过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并以允许我在江南部队集中展期北移，新四军归入八路军扩大其编制等等为条件。周恩来等当即答复说，不实行我党所提十二条决无谈

判的可能。)我党的方针是捉住皖南事变和“一、一七”命令不放，除非蒋取消这个命令，并实行我提的十二条，否则，不能与他们谈判。电报表示同意南方局关于办事处人员逐步撤离的办法，在蒋未公开宣布取消八路军番号，未公开宣布共产党叛变以前，办事处人员不能全部撤走，留下的少数人员要作最坏打算，准备他们捉去杀头。南方局留在重庆的同志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个个都作了最坏的打算，最充分的准备，但又人人都保持着镇静的情绪，以加倍的努力去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

一月三十日 毛泽东就关于皖南事变后时局的发展及我们的对策问题电周恩来。电报说，目前还是破裂的开始，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的长短，得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但必须坚持十二条，不再谈北移、扩军、边区等问题。蒋介石在二十七日的演讲，说明国民党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电报指示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谈话在重庆发表。周恩来接电后立即组织南方局、办事处同志把党中央和军委发表的谈话，印成油印铅印两种传单秘密散发。

一月 南方局指示川东特委抓紧巩固党组织，迅速疏散暴露的党员。川东特委采取紧急措施，进一步对组织进行清理，对党员进行审查，分别情况采取或继续联系，或保留关系，或割断关系等处理办法。各级组织的干部大都转移地区活动，只留少数干部进行单线联系。党的组织更加精干，党的活动更加隐蔽。

同月 周恩来指示各抗敌演剧队地下党，演剧队要保存团体，争取工作，要坚持原则，不演反共戏，要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嘱咐演剧队要到远离国民党指挥机关的地方去演出，并通过办戏剧训练班、教唱歌曲等办法，组织教育群众坚持抗战。

同月 南方局派朱家璧去云南滇军开展统战工作，由南方局直接联系。朱家璧回云南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利用社会关系进入滇军步兵第一旅（后编为十八师）开展滇军的上层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

二月一日 《新华日报》因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删扣稿件过多，从即日起改为日出二版一中张，至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恢复出报四版一大张。

二月二日 中央书记处关于八路军停止给蒋介石一切呈报问题电彭德怀、左权、周恩来、叶剑英。电报说：“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答复

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同日 叶剑英离渝回延，并带回周恩来写给陈云和党中央的信及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党与非党干部部分人员撤留安排名单。

二月五日 周恩来派人前往慰问自杀未遂的著名戏剧家洪深并资助其全家治疗休养。洪深在服毒自杀前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控诉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

二月六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被扣亲往曾家岩宪兵队交涉。本月国民党中央特种会报对《新华日报》有“只准印，不准卖”的规定。皖南事变以后《新华日报》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仅二月四日至十六日的十三天中，被国民党军警宪特拘捕殴打的报丁报重就有三十五人次，被无理没收的报纸达数千份，其中以二月六日最为严重。这一天，国民党宪兵不仅将一板车《新华日报》全部没收，还扣留了拉车的工人。周恩来得悉后，即向张冲提出强烈抗议，并亲向国民党宪兵当局交涉，要他们发还了被没收的报纸，放出了被扣人员，还在宪兵队门前，当着张冲的面从收回的报纸中取出

部分发给了周围的群众。在这前后几天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先后五次致函国民党当局，对迫害《新华日报》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至二十日，国民党中宣部才复函说：“已批复对《新华日报》予以保护”。事实上，国民党对该报之压迫并未由此而有所减轻。

二月七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说，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他的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终结。指示南方局周恩来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毛泽东说，依我看，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他们计划破产，参政会又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对他们不利。并向周恩来此种估计是否适当？周恩来复电表示赞同，并汇报了重庆各方面的情况。

二月十日 周恩来与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勱等在重庆玉皇观商谈出席二届参政会问题。周恩来说明了我党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方针，沈钧儒等对我党不出席本次参政会表示谅解，并且建议我们以十二条作为出席的条件，还提出准备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会后，周恩来立即将会商情况报告党中央。十四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以我党七参政员的名义将我党所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提到国民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

国共团结，重整阵容，坚持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二月十四日 周恩来在重庆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居里会晤。周恩来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若干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美国政府得居里报告后，立即要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各次报告均悉。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蒋介石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于蒋不利，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之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介石的攻势。我们在军事上守势，政治上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不会破裂国共关系，只会拉拢国共合作，不会妨蒋抗日，只会逼蒋抗日。我们提出十二条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其中的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此攻势打退他的攻势，用我们的政治进攻之手来缝好由于蒋介石进攻撕破的裂口。

二月十五日 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参

政会秘书处，提出关于皖南事变之善后处理办法十二条，“请政府采纳”。十九日，周恩来将我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并抄送各党派有正义感之参政员二十多人。我七参政员公函送出以后，王世杰立即找张冲谈话，一些中间党派的代表也往访王世杰，亦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张冲要求周恩来收回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十二条，以免蒋介石翻脸，并说蒋介石要约周谈话。周恩来均严词拒绝。周恩来说，翻脸已半翻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然不能得结果。随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电报中央，并说：我想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必会毫无结果，要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如果能由各党派委员会在会外从政治上讨论党派纠纷及十二条，则不直接将十二条提交参政会也是可以的。如此可拉住各中间党派，争取民主，以为难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承认二届参政会延期开会，则我们的问题也可以稍缓提出。周恩来在电报中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即捕杀讨扣毫无所惧。

二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他在二十日给中央电报中对于国共关系的根本立场。并指示说，不应拒绝谈判，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不能撤回，还须广为散发。如国民党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当可暂时不讨论，由两党在会外谈判自可。然在未获满意之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

同日 蒋介石宴请参政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且“允诺”增加委员的人数。还找来张群、宋美龄对中间党派做工作，企图利用中间党派想联合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心情，以让步的姿态为钓饵，达到孤立我党，各个击破的目的。

二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会见张冲，张冲再三要求周恩来将我党七参政员公函收回，以便蒋介石能见周恩来。周恩来说，在新四军事变后，国民党对我继续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的可能。七参政员的公函不能撤回，目前见蒋无意义，不会有结果。于是，张冲又提出了三点具体解决意见，即：（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的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游击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另外还我一军，补新四军缺，归还叶挺及其干部。边区及晋察冀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另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讨论党派问题，以蒋介石为主席，周恩来

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已停止，政治压迫总要解决，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请周恩来将此三点意见报告延安。周恩来答复说，不拒绝谈判，具体条件可以电告延安请示，但致参政会公函绝对不能撤回，见蒋更无必要。张冲最后要求我党参政员考虑出席本次参政会，并请于次日早晨答复他。当晚，周恩来将全部交谈情况电报党中央。

同日 邹韬奋因国民党政府近期来加紧迫害生活书店，封闭设在各地的分店以及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愤怒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走香港。

二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约见张冲将我党中央本日的答复和叶剑英二十三日的电报给张冲看，并与张冲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谈。我党中央的答复共三点：“(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意见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周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叶剑英致张冲电报中说，“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圆满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

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无补于实际。”张冲看后说，电中所提等于破裂。周恩来当即指出：“责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故提出十二条。”随即周恩来与张冲围绕我党所作的答复意见进行商谈，张冲最后要求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务必出席本届参政会，如两人同时出席不行，一人也好。周恩来坚决表示：“出席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同张冲谈话以后，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报告说：“综观张之谈话，目的要我们捧场。居里在此犹未走，闻系专等观光参政会开会的（我早已面告居里，我们决不出席）。英美派很急，连胡秋原都动员了，找吴克坚，劝中共出席参政会。而白崇禧等人，则仍在大骂说，非打不可，亲日派分子则仍在压迫。这仍然是哄、吓、压三策并进。我以为只有决不撤回公函，坚决拒绝出席，才可以揭破流氓骗局（骗外骗内）。”

二月二十七日 蒋介石会见各中间党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勱、褚辅成、左舜生六人。张澜等六人提出四点意见：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决议之实行；四、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以上各项之执行。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

同日 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等到曾家岩五十号会见周恩来、董必武，希望中共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他们表示，只要中共出席，蒋介石若再失信哄骗，我们大家共进退。周恩来、董必武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了蒋介石的政策和共产党的立场态度，表示中共不能出席参政会，并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

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我党可以加入各党派委员会，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中共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应以讨论各党派关系（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该委员会不隶属于参政会。我党参加该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向张冲口头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中共出席参政会的先决条件。这十二条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十八

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其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中共中央电报说，如彼方表示同意这十二项，即可由周恩来偕张冲至延安谈判，参政会延后两星期召开。周恩来及时向张冲口头提出了这第二个十二条，被国民党拒绝。

同日 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同到曾家岩五十号访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仍希望中共代表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周恩来等再次明确答复说，只要国民党不接受我提出的十二条，就决不出席。次日清晨，张冲又奉蒋介石之命赶来敦请董必武、邓颖超参政员赴会，均被拒绝。

三月一日 周恩来两电毛泽东、中央书记处，报告近日来有关参政会的情况，请示处置办法。报告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关心着我们代表是否出席参政会，重庆各方面都在盼望我们出席，“昨夜今朝有两批‘特使’来迎董(必武)、邓(颖超)”，但谈判无结果，我拒绝出席。现在的办法有二个：一是直接见蒋介石将我党所提条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

决，其他问题约张冲到延商谈，一是坚持硬到底（我们也准备了）。一切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而僵局又需打开，故“待中央立即指示”。党中央接报，当即复电指出：在我提出的临时办法十二条“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但仍可告诉国民党及中间党派，只要同意我之临时解决办法，并有明令保证时，我党参政员当可报到出席。“此项谈判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必须放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出外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接着，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此问题，于次日将讨论结果电告周恩来说，书记处同志一致认为：我们不出席，完全是理直气壮的，而蒋介石国民党亦无可奈何。因为：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们不出席表示抗议，并未错；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四、国际形势已到与彼不利之时；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因此，尽管在当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的情况下，有中间党派人士一时有些动摇，但这只是一时的，过一会就会起变化。三月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冲转蒋介石，书面提出我党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并谓“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董必

武、邓颖超亦同时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正式向参政会提出第二个十二条。张冲表示时间过急，等于哀的美顿书，将信函及十二条退回。周恩来又复送去，并且申明，如果退回原信就等于表示破裂。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写信给黄炎培、张澜、江恒源、冷遹、张君勱、罗隆基、梁漱溟、周士观、左舜生、李璜、章伯钧、沈钧儒、褚辅成、张申府、邹韬奋等各党派代表，告以我党为顾全大局起见，“改定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具见于与参政会公函中”。并申明，此等办法，我党“实已委曲求全”，倘能接受，并有明确保证，董必武、邓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如仍被拒绝，局势恶化，也“问心无愧”。

三月一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复兴关举行。中共参政员未予出席。会间，蒋介石、何应钦借答复中共参政员致参政会函电和报告军事问题，对中共和八路军进行诬蔑、攻击，并通过了关于军事报告和统一军令政令等反共决议案。但是，蒋介石在他的讲话中又不能不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希望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内共聚一堂。在董必武拒绝与会的情况下，参政会仍将他推为驻会委员。

三月七日 《新华日报》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发表《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被国民党

新闻检查当局扣压，《新华日报》坚持发表了本文的标题。十日，《新华日报》出版增刊，发表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布了我们不出席本届参政会的事实经过。

三月九日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的演说和在我党七参政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本届参政会强令通过的反共提案，《新华日报》未予登。周恩来说，蒋的演说全文“是带防御性的”，今日《中央日报》的社论也称“即使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剿共事实亦不至发展”。

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做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布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蒋的演说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参政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指示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

三月十三日 董必武与李璜、章伯钧、张申府、

张澜、沈钧儒、罗隆基、周士观、梁漱溟、冷遹、江恒源、曾琦、张君勱、左舜生、黄炎培、杨赓陶在重庆一心餐馆共议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三月十四日 毛泽东电复旅美华侨洪门致公党总监司徒美堂，对他关怀祖国，呼吁团结的精神表示敬佩。并谓：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一月十七日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将该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重重危机。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战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的滔天罪行”，不得不谋制裁之道，业已提出“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

同日 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表示现在情形缓和了，可以谈谈。要周恩来打电报给延安，问我党中央最近的意见。周恩来提出新四军事件和二月份各种压迫事件，要求按我党所提十二条解决。蒋对新四军事件，未予回答，对压迫事件，则把责任推给下边，表示解决对《新华日报》的压迫、放李涛、发护照等，都可能做到。周恩来又提到防地、扩军问题时，蒋对防地不答，但也未再提开往河北一事，仅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周恩

来提出要见叶挺，蒋答尚未到重庆，如到可以见。周恩来又提出战地党政委员会改组中，可取消他的名字。最后蒋介石约周恩来下星期再见，在座的宋美龄还说要请吃饭。周恩来将这次会见全部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并且说：“现在的问题是在我攻势下，蒋为敷衍门面，想谋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三月十五日 周恩来电毛泽东说，蒋介石六号在参政会的讲话，在不明内情的人，多少会受一点骗，尤其是在国外。而国民党的八中全会，只是讨论党内的事，现在已经酝酿着党内斗争（党政之争，CC与政学系、朱陈之争、元老与少壮之争）。故我们的意见，致电八中全会无甚必要，还不如写一篇文章回答蒋六日的讲话。即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三月十七日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宴请各界人士，说明我党对于国共关系及本次参政会的立场和态度，并同到会诸人士讨论了时局问题。

三月十九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南方局的推动下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由国共两党以

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并订立了信约十二条。在中共的积极帮助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面教育下,该会成员张澜、黄炎培、张君勱、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李璜等十七人于本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特生公馆)召开会议,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推定了常委和各方面负责人,主席黄炎培(是年冬改由张澜继任)。九月,在香港出版发行机关报《光明报》,十月向国内外公开发表政纲和宣言,提出了贯彻抗日,加强团结,争取国家独立,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政治主张。

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 周恩来、董必武分别同黄炎培、张澜、张君勱、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等民主政团同盟各党派负责人士商谈国是,着重讨论了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问题。

三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邓颖超应邀出席宋美龄举行的宴会,蒋介石、贺耀祖、张冲到会。周恩来与

蒋介石交谈了组织各党派委员会、停止军事进攻、制止政治压迫和释放叶挺、解决新四军皖南事变问题。宴会后周恩来报告党中央说：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的轻微缓和，还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关于各党派委员会，我们拟提出成立各党派平等的联合委员会，并且不属于任何政府机关来与蒋所拟成立的委员会对立，迫蒋让步。

三月三十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寿联祝贺被监禁在国民党狱中的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银行顾问、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六十寿辰。

三月 南方局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同刘文辉联系，做川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同月 周恩来在重庆南方局住地接待罗马尼亚援华医疗队成员、罗马尼亚共产党员杨固大夫等。一九三八年八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达维德·杨固大夫和布库尔，带着罗马尼亚人民的委托，随国际援华医疗纵队来到中国。皖南事变发生后，杨固和另外两个国际友人冲破国民党特务阻挠，从贵阳到达重庆，向周恩来报告工作，并要求到解放区去参加战斗。周恩来三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今天的工作能够影响国民党的士兵抗日，希望继续留下来在国民

党军队中进行救护医疗工作。周恩来说，我现在不就在这里工作吗？这是党派遣我在这里工作的，是革命的需要。杨固等未能接受周恩来的意见，遂向罗共中央请示。不久，杨固等得到罗共中央的指示，要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去做。杨固等愉快地返回了岗位，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春 晓南事变后，南方局为保护文化界进步力量，有计划、有组织的将聚集在重庆、桂林等地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分别送往延安、新四军、香港、东南亚地区。大批撤至香港、东南亚的文化界人士，在南方局和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宣传和革命文化艺术工作，使香港成为我党宣传抗日民主、团结进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

四月十日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致函国民党中宣部，要求当局制止殴打拘捕该报人员、没收撕毁报纸、逮捕迫害读者的事件，切实执行二月十日“严加保护”的命令。

四月十七日 周恩来、董必武与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商讨苏日签订中立协定问题。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疑问，当日周恩来、董必武会见他们，向他们作了说明。周恩来说：苏联签订此约乃本其一贯之政策，与它的对

华政策毫无关系，至于我党的态度决不因此而变更。

四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指示与蒋介石谈判时应提出的问题。因近来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加剧，国际上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时局变化于蒋不利，蒋又表示要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为此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本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示同意见蒋，见时可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但国民党必须改变对内政策，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给八路军发饷。

五月八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总结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批评了存在于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进一步强调了我党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中间阶级的正确政策。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为了保证大后方党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必须坚决执行以下办法：

(一)对已暴露了的干部应坚决地勇敢地撤退，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二)坚决地勇敢地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即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一般不开支部会，仅个别接头；党员转地不转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一般不设书记、组织、宣传，只设个别特派员、工作员，切实掌握短小精干的原则；党员或党的机关与上级失掉联系，须独立工作，不准到处乱找党，也不得与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三)在职业中的党员，可与其个别联系，但不得随便利用，他们应安心巩固自己的职业，绝对不准随便暴露。(四)对自首分子，又不甘心作特务的，可经过适当办法劝导他，使其中立。(五)对于过去中央作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可以加入某党某组织的决定，应彻底地无保留地执行，即只要有可能和必要，就应毫不犹豫的加入某党或其小组织。

五月十、十一日 周恩来两电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他先后同国民党张冲、刘为章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党中央将在华北如何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问题。电报说，刘为章、蒋介石诬蔑八路军在西北集结重兵，面对日军向中条山的攻击不予打击，不配合友军行动。我当即指出：我军在华北及各地配合友军打击敌人，从未停止过，所获战绩，妇孺皆知，并

为国际人士所称颂，何能叫不打击敌人？至于与日妥协、移兵西北、打通国际等等，纯系谣言。反之，半年来，尤其近四个月来，反共成为高潮。辱我党为“奸党”，我军为“匪军”，到处打人、骂人、杀人，西北事更是彰明较著。蒋介石说：能配合行动就很好，只要有成绩，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一再要求我请示延安，答复配合中条山作战问题。在十一日的谈话中，周恩来还向蒋介石讲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对外交政策提出了意见。十四日，毛泽东复周恩来电，同意配合作战，并说已迭电前线，采取主动的有计划的配合行动，但决不为激将法冲动。

五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写信给《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辩论是非，批驳谣言。同月，日本在中条山地带对蒋介石发动了一次逼降攻势，蒋军望风披靡，丧失了五万多人的兵力。蒋介石为了掩饰他的可耻失败，造谣诬蔑八路军坐视敌军进攻，不配合友军作战。《大公报》于二十一日发表了一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重复蒋介石的谣言，为蒋帮腔。当晚，周恩来写信给张季鸾、王芸生指出，《大公报》所引各节“并非事实”。周恩来说，在《大公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

止通车，其它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这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不得按时报导。于是惯于造谣者之流，曾公开指责第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周恩来在信中声明，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竟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蔑为虚报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周恩来说：“贵报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二十三日，《大公报》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信，但又发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用“国家中心论”来抗拒周恩来的批评。毛泽东在六月十七日打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你的信和《大公报》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你那封信写得很好。

五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指出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未认真彻底地执行中央关于隐蔽和撤退党的干部的指示，有的干部仍处在暴露或半暴露状态，这有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危险。中共中央要求南方局、东南局、中原局严重注意这一问题，采取必要

的办法，严格督促所属各地党组织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坚决执行党关于隐蔽、撤退干部的一系列指示，认真的敏捷的把党的骨干力量撤退和隐蔽起来。

五月二十九日 茅盾、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九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是的态度和主张》，痛斥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倾向及其对文化事业的残酷迫害。

五月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会见国民党元老、文化界人士朱蕴山，告以蒋介石国民党还在加紧进行反共投降活动，国内时局仍然是严重的，希望他能为挽救国内危机，推动抗日出力。朱蕴山得此启示，立即离渝去桂林等地推动广西及西南各界人士团结抗日，防止蒋介石反共投降。

同年夏 南方局召集会议，研讨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孔原、钱瑛、廖志高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进一步强调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的政策以及新近发出的关于巩固大后方党，隐蔽撤退干部的一系列指示，讨论部署了所属各地党的工作。要求各级党从组织领导形式到工作方式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

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还研究了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巩固党隐蔽党的办法。会议还决定划小川康党的工作区域，从川康特委中划出两部分地区，新成立川南、川北两工委。川东、川康两特委和川南、川北两工委直属南方局领导。对干部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川康特委负责人荣高棠（皖南事变后，特委书记程子健撤走，荣接程的工作）调回南方局组织部，川康特委组织部长于江震调川南工委任书记，川康特委宣传部长郑伯克调云南任省工委书记，秘书长李维调川北工委任书记，川东特委的王致中调川康特委任书记。不久，于江震调回南方局组织部，川南工委撤销。

同日 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领事巷十号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王昆仑、王炳南、邓初民、刘仲容、许宝驹、许宝驎、阳翰笙、闵刚候、吴茂荪、侯外庐、屈武、阎宝航，高崇民、郭春涛、梁藻然、赖亚力、曹孟君、谭惕吾（邓初民和郭春涛后来退出）。会议推举王昆仑、许宝驹为主要负责人。一年以后，中国民族大众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一九四九年六月以后，为与李济深、何香凝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区别，又简称“小民

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筹划酝酿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宣布结束，前后八九年里，从政治见解到斗争行动上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并在具体政策和作法上处处密切配合，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上层人士中一切可以争取的分子，孤立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及瓦解其反动统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月一日 周恩来发表负责声明说：五月三十日中央社发表了关于十八集团军行动问题中有“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一节，这“与事实不符”。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有战果！十八集团军敢于接受敌人挑战！同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答记者问全文，并同时登出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关于十八集团军战报、战果的六则报道。

六月八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日寇两面政策》。周恩来说：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要击破敌人这种两面政策，我们尤其要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敌寇的两面政策，不论在侵华或南进上，不遭到最后的失败，

他是会一直发展下去的。我们应该一方面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协同我们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另一方面坚持我们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加紧我们全国的团结，以粉碎敌人的诱降、分化和远东慕尼黑阴谋，只有这针锋相对的政策，才能彻底的粉碎他的两面政策，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六月十五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分上下两部分先后在十五日和二十二日发表。周恩来指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在抗战四年中，已为全中国人民所接受，所实行了。但其真正的含义却常被人曲解和误解，作为攻击别人或批评别人的口头禅。周恩来说：什么是“民族至上”？在中国其含义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这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关于“国家至上”，周恩来说，按马克思的学说，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关。在今天战争与当前的时代，殖民地以及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在这些国家中，民族解放的利益，是各

阶级共有的。“保卫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也就适用，而“国家至上”也就有他严重的历史意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为着“国家至上”，必须抗战到底，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一个抗日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国家。他说：“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在中国，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是革命的，而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反革命的。我们共产党人拥护前者而反对后者。只有糊涂的人或者故意不去辨别差异的人，才会说“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类口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放诸万世而不变的。

六月十八日 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留俄同学会等十余个单位在重庆中山一路一七〇号中苏文协会会址举行晚会，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到会有各党派、文化团体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梁寒操、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张西曼、老舍、王昆仑、曹靖华等。

六月二十二日 希特勒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

条约》，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任务是：（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即以此援助苏联。（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反动分子的反苏反共活动，必须坚决地反抗之。（三）在外交上与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士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

六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董必武同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张申府、沈钧儒、林可玘、周士观在左舜生家商讨目前国际国内局势。

同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文章指出：世界惊人巨变，因纳粹德国毫无信义的突向苏联进攻而爆发了，这将成为全世界空前的一战。苏德战争的爆发，完全由于希特勒背弃国际信义，撕毁德苏条约的一手所造成。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已屹然不动的坚持了四年，现在更不应受这个风浪波动。因为苏德战争及日本有北进的可能而引起一种过份的乐观心理，这在我们四年抗战中已屡次证明是有害的心理。我们更不应该过份乐观，致使放松对外，转向对内。我们应该乘机努力，加紧国内团结，改善政治上的设施，克服经

济上的困难，尤其是要加强军事的力量，国防的生产，以便一方面能有力的抗击敌人的进攻，以收复一些据点；另一方面，在敌人果然北进时，我们也可以配合友邦，实行反攻，击败敌人。

六月 南方局派郑伯克到云南，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涂国林撤回南方局。十月，派侯方岳到云南参加省工委为委员；次年七月，又派刘清到云南为省工委委员。根据南方局的指示，郑伯克全面负责并分管昆明、滇西及统战工作，侯方岳分管滇东工作，刘清分管滇东北及滇南工作。新的省工委不设部委，不建立固定的机关，其工作任务主要是执行隐蔽待机方针，开展“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和统战工作。

同月 南方局为了加强对桂林地区的抗战工作，派李亚群、徐鸣、刘隆华、孙士祥等到桂林建立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委员会，李亚群任书记，直属南方局领导。李亚群等去广西前，周恩来、邓颖超在红岩嘴对他们作了具体指示。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南方局又派张友渔到桂林协助工作。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活动：（一）搞好与李济深以及桂系中民主派的团结合作，并通过他们做桂系的工作；（二）安置因香港沦陷回到桂林的进

步文化人士(本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南方局给予的任务);(三)重新组建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四)联系和领导柳州四战区党的工作;(五)开展对华侨的工作。一九四四年春,南方局通知李亚群暂回重庆。夏天,南方局鉴于广西战局紧急又派他到广西,安排党员和文化人士的疏散撤退工作,并在柳州向张兆汉等传达了南方局关于日寇占领后,可就地组织打游击的指示。李完成任务后,即回重庆,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活动到此结束。

七月三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分析了目前太平洋的局势和国内近况,提出了关于我党对策的建议。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我党应提高接受新式武器的准备条件;在大后方,党更应该是严密的地下党组织;在海外,要加强党的领导,以开展对英美人士、华侨、各党派、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与扩大民主运动,并请党中央派人加强香港领导。电报还说,蒋介石已两次要张冲前来约见。本月十五日,毛泽东复周恩来电说:党中央讨论了你的来电,关于军事准备,照你提议做。关于军事行动,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英苏协定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并将影响中国,促进国共转圜。复电同意周恩来会见

蒋介石。

七月七日 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就内政外交提出十点基本方针：一、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果断的新的步骤。二、加强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肃清汪逆余党，巩固抗日阵营。三、加紧全部国军的整理训练，加强前线各军的配合作战，接济敌后各抗日部队的军饷弹药，积极反攻敌人。四、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由政府予以援助，俾能长期坚持于敌后。五、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调整国共关系，解决新四军问题，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活动，停止逮捕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消弭内部磨擦，培养抗战实力。六、给一切爱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发扬民智、民力、反抗敌寇。七、改革政治机构，罢免贪官污吏、引用开明人员，从政府机关中淘汰暗藏的亲日分子，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八、禁止贪官污吏、奸商劣绅囤积居奇，操纵国民经济，实行调剂粮食，平抑物价，以苏民困。九、改革兵役动员制度，禁止敲诈、购买、强迫、虐待，代以鼓励人民上前线的政治动员，以利抗战。十、

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任用本地人才，团结少数民族，以固后方。

七月十一日 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夏衍等二百六十四人致书苏联科学院，热烈响应他们向全世界文化界发出的“反对文化与科学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强盗”的号召，坚决表示中国文化工作者将“更其奋发，更坚决的加强我们的斗争，更紧密的同苏联全体人民携起手来，扑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七月二十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团结起来打敌人》。文章说，不管日寇内阁现作何变动，也不管其侵略计划是先北进后南进，还是南北并进，“但其灭华之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而且有可能先实行西进。我们应该从敌人先西进做准备，才是万全之策，那种专门希望日寇打别人，是一种最没出息的想头。

七月二十二日 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在《新华日报》发表《关于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谈话，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我军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况，并对国民党中央社连日来多次发布关于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的消息，加以严正驳斥。

七月 中共江西省委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由于叛徒李铁拐、李照贤的出卖，前往江西省委接任书记

的谢育才和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骆被捕后即叛变，出卖了省委其他成员，社会部长林民凤、代理省委书记颜福华先后被捕。颜被捕不久就叛变投降，并死心踏地为国民党特务卖命。因为这些叛徒的叛卖，致使江西省委机关完全遭到破坏，后来又使南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均遭破坏。

八月一日 《新华日报》发表董必武撰写的代论《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蒂》。文章指出：“法西斯主义就是黑暗野蛮的统治阶级向民主自由和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法西斯主义就是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就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文章说，当前苏联是反法西斯德国的主力军，美国是反法西斯的军需部，英国为反法西斯的游动哨，我国为反日本法西斯的前卫，我们只要协同动作，就一定能扑灭法西斯蒂这个恶魔的。

八月二日 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周礼向南方局作书面汇报。报告说：特委去年九月由湖南省委转属南委领导，不久，失去联系，今复归湖南省委。根据目前形势，特委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作为投降日本的步骤”的口号，动员全体党员在群众中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团结小资产阶级，争取中间阶层的同情与支持，力争工作条件好转。特委已经过整

顿。现有党员一百一十九人，分为十二个支部。

九月八日 毛泽东电复周恩来，赞成南方局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并同意加强香港工作，但目前中央派不出人来，仍由廖承志、潘汉年继续负责。

九月十九日 为巩固隐蔽党的组织，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对所辖各省委、特委发出指示，指出：“为适应长期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组织工作仍以巩固发展，稳扎稳打为主。对已被破坏及暴露的地区，应坚持执行周恩来指示，抛弃一切已暴露的关系和组织，坚决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甚至平行特委，组织彼此绝对不发生横的联系。”

九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电报中央，由董必武兼南方局宣传部长。二十八日得中央复电同意。

是年秋至次年春 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戏剧运动掀起第一个高潮（因这段时间重庆多雾，故又有“雾季戏剧节”之称）。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重庆人民不仅加紧进行政治压迫，而且还加强了文化统制，重庆成了一座“死城”。这年的夏秋间，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而留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也静极思动。又指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

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并因此和徐冰、阳翰笙等进行了仔细研究，决定从话剧方面发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文委和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道，团结文艺界朋友，在重庆发动了一个雾季戏剧演出运动。首先筹办了一个民办的专业话剧团中华剧艺社，并于十月起先后演出了《大地回春》和《天国春秋》，接着推动中国万岁剧团演出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其他一些剧团在此影响下，也相继上演了一些进步戏剧。这些抗战进步戏剧的演出，在重庆人民中引起了很好的反映，盛况空前。沉寂的戏剧舞台活跃起来，文艺创作随之发展，许多好的作品争相问世。就在这个时候，南方局文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曾家岩五十号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招待文艺界的作家、编导和演员，计到百余人。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同志到会招待，并勉励大家，给与会人士很大鼓舞。这是一次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对进步文艺队伍的大检阅。会后，文艺工作者们以更加坚强的战斗精神投入了新的创作和演出，至次年春，先后创作并演出的剧目达到了近百出。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由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的公演，轰动了山城，震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将雾季戏剧演出推向高潮。南方局领

导下的抗战文艺运动，以话剧为先锋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禁锢，使国民党欲压无能，欲止无策，取得了第一个雾季大演出的胜利。在以后的三个雾季中，重庆的戏剧工作者亦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一次又一次地把国统区的戏剧运动推向前进。在这几个雾季演出中，所上演的剧目达二百余出。其中绝大多数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是进步的、战斗的。如《屈原》、《北京人》、《天国春秋》、《升官图》、《雾重庆》、《国家至上》、《风雪夜归人》等等都是有名的佳作。许多著名的作家、编导为之辛勤创作和导演，一大批优秀演员积极参加表演，而且在这些创作演出中还培育出了许多新秀。我党直接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在演出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还影响团结了一些国民党控制下的剧团逐步走向进步。这个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进步戏剧大演出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桂林、昆明、贵阳以至闽赣地区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

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立即组织高级干部学习组。在此之前，南方局的高级干部学习组业已组成，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十月十九日 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太

平洋战争的新危机》，预言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文章指出，日本东条上台即是太平洋危机之到来，这个新危机的范围，决不止于北进，日寇必然是以占领西伯利亚，囊括南太平洋，解决“中国事变”为其连贯的方针，现在日寇又要在太平洋作新的冒险。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

十一月九日 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追悼大会在重庆夫子池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加追悼。周恩来在会上致词，备述张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努力团结之真诚，表示深切的悼念。《新华日报》出版纪念专页，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一文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的挽词。

十一月十四日 《新华日报》出版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专页，发表了中共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代表人士的祝词，周恩来的文章《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文章写道：焕章先生坚持御侮，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亦正是先生成功处。先生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肯作诤言，这更是人所难能的。国家今日，尚需

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不负天下之望。

十一月十六日 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会在重庆举行。早在十月间，周恩来就指示文化界要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他说：为郭沫若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文委和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同志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还通知其他一些城市同时举行纪念活动。重庆的纪念会于当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会场上高悬“以清妖孽”四个大字。冯玉祥致开会词，周恩来、老舍、黄炎培、沈钧儒及苏联的朱克拉夫斯基等先后在会上致词。周恩来说：郭沫若无愧于“五四”运动中长大的一代，“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周恩来勉励大家学习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他的精神与战斗的生活。《新华日报》出版“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头，并撰写代论《我

要说的话》。周恩来在文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和创作生活作了高度的评价，并号召大家学习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大会筹备组举办了郭沫若生平及作品展览，还决定本月二十日起演出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同期，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亦先后举行纪念活动。

十一月十七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计到参政员一百一十七人，我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大会于二十六日闭幕，董必武继续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

十一月十九日 桂林文化界召开座谈会，检讨一年来的文艺运动。田汉、邵荃麟、艾芜、孟超、吕复、杜宣、司马文森等出席。大家认为，文艺运动“在朝低潮走”，但在“低潮中也有发展”。与会同志还对今后如何克服主客观困难、如何继续开展民族形式讨论、如何建立文艺理论和批评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十二月八日 日本军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并进攻太平洋上英、美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日机轰炸九龙，陆军从新界进攻，二十五日，英国港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撤退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

同日 周恩来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工作之布置两次急电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的朋友可去马来亚。少部分能留港者尽量留，但必须符合秘密条件。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次日，周恩来又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央书记处，再次对撤退在港朋友和党的工作同志作具体布置。同时，分电南委、桂林统战委员会，指示他们作好接应及转送工作。以后，周恩来又对撤出人员的去向、工作、家属的安排、交通生活费用的支付，留港人员的工作等等，作了详尽指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组织在港同志投入工作，及时同南委、粤南省委、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桂林统战委员会等取得了联系，并由廖承志、张文彬在香港、惠阳召集有关领导人尹林平、梁广、梁鸿钧、

连贯、曾生、王作尧、杨康华、黄宇、刘少文、乔冠华等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从日寇的严密封锁中撤退出了包括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柳亚子、陈汝棠等在内的各方面人士共约八百多人，还有一大批国际友人，分别安全地送到了内地及海外，还接应了二千多名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爱国青年，完成了党中央和南方局交给的任务。

十二月九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之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指示要求“必须大大的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而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活动。”

十二月十三日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一文。文章全面论述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之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战局的规律，指出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六个特点，即长期性、不平衡性、全面性、一致性、阶段性、主从性。希望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消灭法西斯。

十二月中旬 周恩来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救亡室作了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报告，传达了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接着，南方局派人到各省特委传达党中央这个指示及南方局的具体部署。

十二月十七日 周恩来、董必武、张澜、张君勱、左舜生、黄炎培、李璜、王造时等出席王世杰、张群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举行的午宴，面交意见书，并商谈参政会决议案四条实施办法。十九日，王世杰、张群再次邀集上述人士继续商谈参政会四条实施办法。

十二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与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章伯钧、张澜在特园商谈关于国民党政府设国事协议机关的意见。

同日 中国女科学家、小麦育种专家沈骊英女士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举行，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会联合会驻渝代表邓颖超、张晓梅等出席。同日，《新华日报》出版特刊追悼沈骊英逝世，发表了董必武、张晓梅及各界人士的挽词和悼念文章，邓颖超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中国妇女光辉的旗帜——沈骊英女士》。

十二月二十九日 重庆各界人士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时局座谈会，董必武、黄炎培、左舜生、吴耀宗、邓初民在会上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

十二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活动的决定》。提出党的组织应尽量短小精干，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必须“杂乱无章”，扩大党外活动，加强在中上层分子中的工作，与群众建立广泛深入的联系，真正做到“党内小党外大”等十二项基本方针。

同月 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嘴召集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研究今后的任务。参加会议的有孔原、钱瑛、荣高棠、廖志高、高文华等地方党的领导干部。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把党组织建设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从本月至次年一月，大家进行了充分地讨论，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周恩来集中同志们的正确意见，在会议最后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七个条件，即是：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的领

导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中体现出来。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周恩来指出，这七点做到了，我们西南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在这以后不久，周恩来还提出了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周恩来提出的这七条基本原则和“三勤”、“三化”，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周

恩来对党的白区工作的创造性发展。

同年冬 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十一月下旬自美国到达香港，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他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司徒美堂拒绝了敌人的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的帮助下化装逃出，进入东江游击区，经曲江、桂林到达重庆。司徒美堂安抵重庆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就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交谈。蒋介石为利用司徒美堂的影响，企图以给个国府委员的名义，拉他参加国民党，为司徒美堂断然拒绝。次年，他经印度返回美国。在整个抗战期间，司徒美堂从物力、财力上给予我们以很大的援助。

一九四二年

一月六日 云南昆明掀起声讨孔祥熙的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香港、澳门，在港的国民党元老、左派人士，大批进步文化人和民主党派领袖因缺少交通工具，不能及时撤退，陷入敌占区。而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仪却占用飞机仓位把自己的洋狗由香港运至重庆。这种恶劣的行为激起了

广大人民的愤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西南联合大学、中法大学、同济大学、云南大学、昆华中学等大中学校约三千多人当日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孔祥熙，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昆明学生的行动，得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的支持，一些大学，如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在四川的武汉大学等都举行了声援响应活动。人们把这个运动称之为“讨孔运动”。

一月十四日 周恩来和冯玉祥等视察渝鑫钢铁厂，并题词鼓励。周恩来的题词是：“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一月二十九日 重庆文化界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钱亦石逝世四周年大会。周恩来、董必武、潘梓年、吴克坚、章汉夫及各方面人士孔庚、沈钧儒、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张西曼、侯外庐、翦伯赞、阳翰笙、潘念之、刘百闵、王亚平、石凌鹤等百余人出席。刘百闵、沈钧儒、郭沫若、董必武、邓初民、石凌鹤先后在会上致词。是日，《新华日报》发表董必武撰写的《反侵略声中纪念钱亦石》。

同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宝安召开干部会议，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主持会议。会议总结了三年来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成绩，并根据党中央、南

方局的指示，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党、政、军工作，以尹林平为书记，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林锵云、罗范群为委员。还决定成立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委，下辖五个大队，为后来正式建立东江纵队奠定了基础。

二月八日 南方局妇委编辑的《妇女之路》在停刊一年之后于今日复刊。复刊词中提出该刊的任务是：（一）提供中国妇女大众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应走的解放之路的意见；（二）研究探讨妇女工作理论，介绍妇女工作的经验与方法；（三）反映妇女大众的生活与呼声，报导中国各地妇运动态；（四）介绍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妇女运动的动态；（五）为国际国内妇女的团结而努力。

二月十六日 为击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苏反共阴谋，南方局指示《新华日报》发起签名慰问战斗在反法西斯前线的苏联红军。从即日起到二十三日苏联红军建军纪念日，平均每日签名者在三千人左右。二十三日，《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代论《庆祝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和周恩来的纪念文章《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苏联红军胜利前进》。

二月中旬 周恩来致电中央办公厅，要求中央电台对重庆和南方党作专门的党务广播，以加强对党员

的教育。

二月 毛泽东在延安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南方局收到这些报告后，首先在南方局高级干部学习组中进行学习，并在《新华日报》上陆续发表，同时把这些文件印成小册子。周恩来以身作则，带头认真学习。

同月 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住宅会见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周恩来向刘文辉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必须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道理。并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在现阶段，就是要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经过周恩来及各方面同志的工作，刘文辉加强了同我党的联系。在刘文辉的要求下，南方局于这年六月派王少春夫妇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并在刘的总部设立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一直坚持工作到一九四九年刘文辉起义。

春 中共南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召开会议，总结工作。到会的有方方、涂振农、郭潜、姚铎。会议决

定将各方面工作分别写出总结，报告南方局。

三月五日 鼓吹特务哲学、宣扬“曲线救国”的话剧《野玫瑰》在重庆公演，受到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抵制和批判。该剧由“战国策”派文人陈铨编写，一九四〇年在昆明出世时，中共云南地下党就团结文化、新闻界进步人士进行过批判。今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支持下，于国民政府战时陪都演出，更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和强烈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陈立夫、张道藩、潘公展等公开出面为其辩护。南方局领导重庆文化、新闻界的进步力量，进行坚决抵制和严厉批驳，给国民党的法西斯反动文艺以沉重的打击。

三月八日 邓颖超为《新华日报》撰写纪念“三八”妇女节代论《动员太平洋上各国妇女积极参加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文章说：今年国际妇女节的政治任务，是全世界妇女积极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为着建立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为着消灭世界法西斯主义而斗争。

三月十四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党报应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呼声。这年一月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张申府《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三月九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阅后致电周恩

来说：张申府文章“表示对我党满腔热情”、“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毛泽东说：改进党报，“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解放日报》已有讨论，“《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决定说：“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一切善意的批评，不论是采用任何方式，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绝对不可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党报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并可吸收参加编辑委员会。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周恩来遵照这一指示，立即对《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工作作了布置。

三月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由重庆回到湖南，传达南方局会议精神。省委确定：没有暴露的党员，要切实做到职业化，隐蔽到中小学校、工业、商业等部门里去，勤学习、勤业务、勤交友、扎根基层，取信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压迫人民的活动，通过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共产党员不要轻易出面。

春 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关于重庆一年来

文化运动工作的情况。报告说，去年一至五月疏散时期，文委的主要工作是，“以全力说服文化文艺界友人离渝，为其筹划路费，安排去处”。经文委疏散的计百余人，分别去到延安、苏北、香港、新加坡、仰光及内地各县。五至九月，因敌机轰炸，工作受阻，与部分文艺界人士只保持一些联系，出版界亦无法出版新的书报杂志，加之国民党反动当局压迫加剧，我们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如庆祝郭沫若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参加张冲之追悼会等等。我们还着重抓了当局尚未注意的演剧运动，对导演、演员作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作风，加强了他们的团结和学习，演出了一些优秀剧目。出版工作由于环境恶劣及资金短缺，困难很大。文艺界党的组织活动，已改为个人接头联系，除已疏散者外，现在重庆有组织关系的尚有六十余人。

春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关于南方局统
委经济组一年来工作情况。报告说，一年来，经过经济组的工作，已恢复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十余处的旧关系，发展了重庆电力厂、邮汇局等十余处的新关系。并重新审查了党与非党的干部。在收到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后，加强了银行小组，并组织了一个有工程师、技师与银行职员参加的七人调查会，又

组织了一个以外勤记者为核心的调研组，还参加经济座谈会，已编辑出版一种《经济问题研究资料》。这一年中，收集了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一百余种，成绩之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四月三日 由郭沫若创作、中国剧艺社演出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该剧从创作到排练公演，一直得到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的指导和支持。南方局、《新华日报》又为《屈原》的演出召集座谈会，组织撰写评介文章，《新华日报》辟专栏刊载。周恩来等南方局负责人亲自参加座谈会，并修改评介文章。历史剧《屈原》的演出，给广大群众以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鼓舞了他们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而斗争。

四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指示重庆、陕西、福建、上海等地区党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说，有各种材料表明，蒋介石国民党“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前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要求作好应付准备。南方局及时向干部们进行传达，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以《提高警觉克服困难》为题的社论，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透露给全党和广大群众。

四月十八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对国内当前形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国民党的反

共活动又加紧，并举出了一〇九条事实说明时局的危机，蒋介石国民党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可能。二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示作好准备，对付国民党行将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四月二十日 南方局为了有利于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和必要时在云南建立新的据点，决定由张文澄、方文彬、杨才等组成调查研究小组到云南开展工作。调研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搜集有关资料；（二）联系滇军二路军指挥部里的中共党员；（三）在滇军建立电台。负责电台的杨才于一九四四年二月进入滇黔绥靖公署无线电总台第三机班，负责龙云与我党中央和南方局电讯联络，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龙云被蒋介石逼迫到重庆为止。整个调研组工作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张文澄回到重庆才告结束。

五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致电中央青委，报告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电报说，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的青年）已建立“据点”四个。这种“据点”系三五人组成之不定形的小组，以学习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作调查与通讯工作。今后工作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关系，同时利用学生暑假开展调查，对留校同学进

行启发教育。

五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通知郭沫若说：国民党政府近拟屠杀中共党员，逮捕左翼文化人士，请关照同志们注意防范。郭沫若得悉后，即召集在渝左翼文化人士开会，决定：（1）在渝左翼文化人应常在报章杂志露名，使社会皆知其在渝。（2）如有人被捕即发消息，并尽量营救。（3）在文坛地位稍低或过于暴露者，应立即离渝。（4）以私人友谊通知英美在华使馆，说明国民党屠杀进步人士。（5）分别通知各地左翼文人注意防范。

五月底至六月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因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上年七月，江西省委被破坏后，南委与江西省委的联系中断。本年四月，南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到曲江交通站，向江西省委和粤北省委传达南委总结工作的情况，并检查江西工作。五月二十六日，郭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晚叛变。次日，郭潜带领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破坏了粤北省委。此间，周恩来急电南委，指示即告正在曲江的廖承志，要他即到重庆，如走不了应和他母亲何香凝住在一起。南委还未与廖承志联系上，郭潜就在五月三十日领着特务逮捕了廖承志。接着，郭潜和国民党特务直扑南委机关驻地广东大埔，六月六日在大埔

高陂镇先后逮捕了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六月八日，周恩来得悉廖承志等在曲江被捕的消息后又电方方，指示六点：一、南委与江西、粤北断绝一切往来，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二、南委与廖承志和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他们的关系南方局另设法联络。三、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以免波及。四、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五、南委直接管辖的下级党部暂作静止，不动声息，不做任何活动。六、立即停止与江西电台联络。并要求此电立即执行，切勿犹豫，还须将执行情况电告南方局。因南委电台受到袭击，方方未接到此电。但他根据急剿恶化的形势和南方局的其他指示精神采取了一定的疏散隐蔽措施，使部分同志未遭逮捕。七月九日，郭潜带着国民党特务前往桂林，破坏了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逮捕了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三十余人，书记钱兴得房东掩护脱险。八月，周恩来致电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指示南委地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一律转移，其余干部应利用职业隐蔽下来，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并要尹林平迅速传达到他所知道的党组织。在此同时，潮梅特委派委员张克到重庆汇报请示，周恩来、孔原

又向张克作了同样的指示，强调南委、潮梅特委应坚决执行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切以安全第一，防止事件的继续扩大；方方在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应坚决撤退到重庆。九月，张克回到广东揭阳向方方作了传达。方方根据这一指示，作了一些布置。十二月，南方局作出“方一定离开南方”，“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等八项决定，并再次派人前去传达解释，“指令方方必须坚决执行”。至此，南方工作委员会结束。次年五月，方方回到重庆南方局，六月底随同周恩来返延安。

六月六日 周恩来关于南方工作委员会拟重行划分所属组织问题致电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并方方。电报说，南方党的组织重行划分必须有以下条件：（一）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员均须区分开。（二）游击区直接由南委电台指挥，并与中央保持最好联络；南委与游击区的交通联系另行设立，指定专人管理，并与地方党隔断。（三）如有叛徒混入，或有危险地区应暂与隔离，江西应即切断联系，闽南、闽西不宜与潮梅合组边省委。（四）省以下组织参照西南党紧急处置办法，建立平行组织。这些先决条件解决后，再定划分区域。并提议：（1）香港和琼崖、东江游击区由南委直接管理，但须与秘密机关隔离，交通、驻地均应分

开。(2)粤东及广东两省委均不包括游击区。(3)闽粤边省须成立时，不接受闽西南原来关系，而建立新的组织。(4)闽西南关系指定专人管理。(5)江西应完全隔离，全部解散。其他问题及具体组织和管理人，由南方局决定后电报中央。

六月八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一个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立即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由周恩来、董必武负责，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六月十三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为被国民党杀害的鄂西特委书记何彬等人开追悼会，抗议逮捕刘英、廖承志等。并且指出，今明两年的斗争极紧张残酷，将可能付出极大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可以开辟很多新支部，其任务是勤学勤业勤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七月，中央书记处又指示说：“鉴于浙江、江西、广东三个省委破坏的教训，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的组织，只保留县委，如

某些县委也不能保留者，则只保留支部”。“县委及支部须长期的独立工作。支部及每个党员的任务就是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南方局所属的省、市地区认真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并根据所辖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各级组织分别进行了调整。

六月十四日 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表示愿为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六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就关于南方局领导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报告说，皖南事变前，“香港文化活动只限很小的下层活动，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开”。这时成立了党领导文化运动的内部组织文委，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分文艺、学术、新闻三组。文艺组夏衍负责，学术组胡绳负责，新闻组张友渔负责。小组之外还有文艺、戏剧两个座谈会。

六月 三届川康特委在成都建立。本年四、五月间，王致中从成都回到南方局汇报并请示工作，南方局决定新的川康特委应立即成立。周恩来向王致中强调了党的精干隐蔽方针，同时指出：川康特委的任务是做秘密工作，一定要做好。党员要有公开的职业作

掩护，并要做到勤学、勤业、勤交友。他说，首先是站稳脚根，埋伏下来，看形势的发展，开展活动，切忌轻举妄动。六月，王致中返回成都传达了南方局的决定，随即成立了新的川康特委。委员王致中、马子卿、王栋，王致中任书记。一九四三年又从万县调去蒲华辅作特委委员。本屆特委一直坚持到一九四六年春中共四川省委成立。

夏 南方局先后派李震(李振铨)、赖卫民(赖映棠)到贵州开展重建贵州党组织的工作。李震、赖卫民到贵州后，利用社会关系和职业掩护，重点在遵义和湄潭的浙江大学及其分校开展工作，联系并发展了部分党员，实行单线联系，未能建立党的组织。

七月五日 董必武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请示可否出席三届国民参政会及我党参政员名额等问题。次日，毛泽东电复董必武说：为争取国共关系的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参政员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

七月二十七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三届参政员名单，我党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继续被遴选为参政员。二届参政员本届未被遴选者有中共的吴玉章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梁

漱溟、罗隆基、杨庚陶、陈嘉庚、王卓然等四十三人。

八月十四日 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提出他希望同毛泽东谈谈问题。周恩来随即电告毛泽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与蒋介石见面不会有好结果，建议以林彪代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见。九月十四日，林彪偕伍云甫离开延安，十月七日到达重庆。

八月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对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要他们坚决采取隐蔽的作法，学会做统战工作，以便在艰难的环境下，把革命的出版事业坚持下去。

九月十四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主，地方实力与中间党派为辅，是我党历来统战工作的方针。重庆时期，在你提出的斗争三原则和革命两面政策指导下，统战工作有新的发展。我们在对国共关系充分注意的情况下，同时也应努力开展对各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文化界和外交方面的统战工作，具体做法是：（一）对国民党争取谈判机会，但有步骤。（二）如国民党压迫我们，就与之说理，请求解除，压迫太过，也要从正面批评，不能默然而息。（三）对其他方面统战的中心在要求其与国民党比进

步，非比落后。

九月十九日 《新华日报》根据南方局指示出版《团结》副刊，每周一期。周恩来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词《团结的旨趣》，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创办《团结》副刊，是为了推动南方局各级党组织的整风学习和帮助《新华日报》搞好改版工作。

九月 周恩来致电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并转中央文委，报告大后方最近文化活动情况。电报说：政治部文委会近被监视甚严，会内外之特务活动加紧，对外活动甚少。全国文协活动全部停顿，文艺界的活动极少，戏剧界因环境及剧场限制难于发展。出版界因印刷和检查之限制，日益萧条。桂林政治环境恶劣，文化统治加紧，文化人被监视，出版新书亦减少。

十月五日 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六日，周恩来、邓颖超应邀出席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欢迎威尔基举行的宴会。

十月十三日 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提出我党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寇，要求扩编军队，发给药品等。蒋“答应”叫何应钦发给药品。当林提及新四军问题时，蒋则说：“你以后不要提新四军了，你是我的学生，我才告诉你。”

十月二十二日 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

重庆召开。到会参政员二百人，中共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十一日会议闭幕，董必武仍被推选为驻会委员。

十一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在红岩嘴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整风学习中的若干问题。林彪在本日上午的会上报告了有关华北战场的情况。

十二月二日 周恩来、董必武、林彪在办事处会见新西兰友好人士艾黎，并共进晚餐。

十二月三日 南方局在红岩嘴召开大会，由董必武报告参政会的情况。

十二月十四日 周恩来在南方局办事处党费大会上报告了国共关系问题。周恩来着重讲明了现阶段的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的政策，以及我党的方针。他指出：国民党与我党的关系有好转，好转不等于解决，它对我仍是采取控制和局部压迫的方针，且遗留问题还很多，局部压迫还很厉害。我们的方针是三个坚持，三个反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个争取，三个勿忘（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强调作好“三勤”。周恩来指出，两党关系处在两可之间，或者是相机解决，或者继续拖下去。

十二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林彪与国民党代表张

洽中进行谈判，提出四点：（一）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以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二）八路军扩编为四军十二个师。（三）陕甘宁边区依现有区域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政府；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四）中共军队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如情况许可时（比如反攻），可磋商移动。并声明，如此四项可以谈，林即留此继续谈，倘相距太远，就请蒋介石提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答应将四点报蒋，其本人认为第四条最困难。三十日，张治中在电话上告诉周恩来说，他们已开过会，认为条件相距甚远，未作决定。

十二月 南方局又电广东军政委员会，指示成立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亦称临委），以林平为书记，连贯、梁广为委员。林平负责全面兼军事工作；梁广负责城市工作，主要管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的工作；连贯负责国统区党组织联络和华侨统战工作。临委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开展广东全省城乡抗日斗争以及各项工作。

同年冬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将省委的领导成员、各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以及基层的一些骨干，包括刘晓、刘长胜、王尧山、沙文

汉、刘宁一、陈修良、张承宗等陆续撤往华中根据地，集中学习整风，总结经验。省委撤到淮南后，成立了华中城市工作部，由刘晓、刘长胜任正副部长。上海地下党留下张祺、陆志仁等负责。

同年 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高文华因患病回到南方局，随后省委另外两名负责人袁德胜、文士桢又回延安，湖南省委改成湖南省工委，由周礼代理书记。

同年 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林平致电中共中央并周恩来，报告了东江和珠江三角洲两区近两年里在粉碎日伪扫荡、击退顽军进攻、反对政治压迫、克服经济封锁、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发展人民武装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以及今后的工作部署。报告说：两地区今后仍然是坚决执行“长期打算，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基本方针”和“精干隐蔽，分散活动”，“精兵简政”的政策。主要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改进领导方法；加强党务工作，组织“三风”（即党风、学风、文风）学习；加强主力部队建设，发展民众武装；克服“左”的指导思想，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多交朋友；加强对敌伪顽方面的工作布置，粉碎他们的阴谋进攻；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经济上的困难。

一九四三年

一月一日 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红岩嘴办事处招待沈钧儒、张申府、刘清扬等，并为沈钧儒祝寿。林彪、邓颖超和南方局、《新华日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各部门负责人出席。周恩来、沈钧儒、张申府、刘清扬先后致词。

一月九日 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谈判。张说，国民党干部会议意见认为，中共所提四项与国民党中央及何、白“皓电”相距甚远，解决问题须根据“皓电”提示精神，正式谈判须由何、白主持。承认中共合法和边区政府问题，十八集团军太多不行，并且必须遵照“皓电”限期开动。周恩来、林彪说，以“皓电”作谈判基础及何、白主持谈判问题须请示延安。十日，周恩来、林彪致电毛泽东、中央书记处说，国民党方面因内部矛盾意见分歧，改为以“皓电”为基础，由何、白主持谈判。现在的问题关键在军队与驻地。而驻地之移动则又为关键中之关键。我们意见：可以“皓电”为基础，同意何、白主持，给点面子，具体问题可让步到李先念部与山东于学忠部队对调。如不行，由林回延安报告。

一月十四日 张治中约见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放弃军队，为周恩来拒绝。

同日 董必武于午后在南方局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关于前阶段学风学习的总结报告。当晚，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下阶段党风学习的意见，作进一步动员。

一月十五日 周恩来致电中央报告了昨日与张治中谈判的情况，并分析了英美宣布废除与中国的平等条约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形势的影响。

一月十六日 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致周恩来、林彪电说，现在彼方提出以“皓电”为基础，何、白为主持人，是否有拖延之目的？你们向张提改组华北地方政府，实行中央法令，是何内容？我军驻地问题，似宜暂不移动。解决问题的时机是否成熟，可否再等一下更有利？周恩来立刻回电说，估计此次谈判仍在两可间，或拖或相机解决，目前趋向是政治解决，但局部压迫决不会放弃。我们答应以“皓电”为基础，在于使我站在更有理地位，逼彼拿出具体条件，林彪带回延安，并非认为目前即可解决。何、白主持谈判是事实，就是张出面，何仍是幕后人，蒋总是让别人做坏人，他做好人。李先念与于学忠对调事，上次谈判时，林彪原则上说可以对调，张治中则讲以后再谈。华北政府问题只讲了一般原则，未谈具体内容。两方

条件相距太远，目前不会接近。周恩来在电报中提出结束此次谈判的两种办法：（一）说明我提四条与何、白“皓电”精神基本相合，只是数目时间之差。如国方不同意，要他们提出对策，由林带回报告；（二）向他们直接要方案，或由林向蒋介石要求提示后递延。

二月一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林彪在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谈判时，提出释放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毛泽民等一百四十余人。指示说，即便现在不能获释，也可作一次备案，以作为将来交涉之根据。

二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员会在九龙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尹林平再次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不能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以积极行动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在全中国还处于困难之中，蒋、日、伪相互勾结，实行军事上的围剿，政治上的造谣和经济上的封锁。我们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粉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以争取胜利。会议认真研究了这一指示，决定在全军开展政治教育，干部进行整风学习，肃清对国民党存在幻想的思想；对国民党的进攻坚持针锋相对方针；精兵简政，以精干小分队为战斗单位；军政委员会成员分别到各部队加强领导。会议还决定成立珠江地区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珠江

三角洲地区的武装斗争，以林锵云为指挥员，罗范群为政委。

同月 中共广东临委作出决定：东、西、北江等地区党组织仍停止活动，坚持个别联系；广州外围与珠江三角洲、前东江地区及广州、香港、澳门、广州湾四大城市采取单线形式继续工作；市区、南路在与各地负责人商讨后再定；潮梅方面拟设法与石辟澜取得联络，了解情况后决定整顿办法。三月，临委又指示东江、珠江地区一切工作布置须从长远打算，各级党组织力求隐蔽精干，准备在最艰苦环境下继续坚持独立工作。临委以下各县市地方党组织设特派员，采取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要完成严格的审查工作，干部要职业化，勤交朋友，积蓄力量，渡过难关。同时，要加强对外围武装的统战工作。

三月三日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全书以反对共产主义、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内容，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中国共产党。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上的准备。

三月十五日 《新华日报》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为题，首次在国民党统治区报导了毛泽东去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消息。报导说，

毛泽东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是此次会议的指针，也是党的整个文艺运动的总方向。次年元旦，《新华日报》在“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的通栏标题下，用“提要”形式介绍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

三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为柯棣华大夫逝世，致信柯棣华大夫家属，向她致以最诚挚的哀悼。

三月二十五日 南方局青年组致电中央青委，报告一九四二年全年的工作。报告说：“一年来，本组工作以巩固据点联系为中心目标，以勤学勤业勤交友为主要方针”，取得了如下一些成绩：（1）巩固和建立了一些据点。（2）发展关系二五二人，重庆一八六人；外地（成都、昆明、嘉定、贵州、广西等地）六六人，直接联系者一一三人，由各据点联系者一三九人。（3）加强了调查研究，搜集材料三十九件，学校二十四件，本组研究者十二项。（4）在宣传教育方面，抓住办好《青年生活》（新华日报专页），坚持民主团结的方针，指导和教育青年进行学习、生活、工作。《青年生活》已出二十三期共发表了九十三篇文章。出版了青年刊物四辑。（5）抓住一些临时事件组织活动和出版特刊。报告还就联系工作、调研业务学习、宣传教育三个方面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报告最后汇报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分工情

况：组长刘光负责计划研究全组工作，联系与研究社团、三青团、公务员、自由职业方面；朱语今编《青年生活》，并负责联系与研究学校方面；何启君保管资料，编辑青年刊物，并联系与研究职业、文化青年；黄若敦负责对青工的联系与研究；龚澎负责对青年会的联系及研究；卢瑾参加青年组的部分联系与研究。五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就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情形致电中央青委。电报说，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青年关系一百余人，并在此关系中建立了“据点”。这种青年“据点”，“系三五人组成的不定形小组，以本身学习、职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作调查研究与通讯工作”。今后青年组的主要工作是巩固现有的青年“据点”，加强同青年联系，开展调查研究和对学生的教育工作。

三月二十七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祝文协成立五周年》。社论说：“‘文协’的健在与健斗表征了我们抗战文艺的发皇与战时文艺力量的发展和扩大。”指出：“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准，改造全民族性格习俗，这是比疆场上的战争更艰巨、更需要长期努力的斗争。”强调指出，今天，除了用我们的笔来动员全民族打击敌人之外，解放文化上的缠足，戒绝精神上的鸦片，从千百年的封建压迫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下恢复

我们民族健全自由的体魄和精神，已经是责无旁贷地加在我们肩上了。号召“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站得更紧，战斗，战斗到自由解放的明天。”

三月二十九日 黄炎培、冷遹到曾家岩五十号访周恩来、董必武、林彪，共同讨论了有关世界局势的若干问题。

春 周恩来、董必武往访国民党将领鹿钟麟，为他祝寿，并送给书籍。

四月一日 董必武在南方局整风学习会议上报告学习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待人接物、交朋友等问题。

四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在南方局干部会议上作了《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

四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检查局，查禁《新华日报》登载《援救张天翼先生》一稿和“陕甘宁边区”字样。

四月 周恩来在南方局青年组写的《一九四二年度工作》书面报告上批示：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据点不能超过五人，多则亦须分开，应建立模范据点，分散据点，平行据点。应加紧职业青年工作，向中层发展。要有计划的提高现有青年朋友的觉悟，经过较长时间联系的青年要求入党，可将其申请书与履历书收下登记，并报延安中央青委，但加入则不必。要创

造新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对青年的教育，要有各方面的知识。《青年生活》要联系青年现实问题表示态度，也要有思想斗争文章。周恩来还批评了工作中的某些关门现象，指示今后的青年工作，应“从巩固中发展并深入”。

五月十六日 为悼念国民党军张自忠(荅忱)上将殉国三周年，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追念张荅忱上将》。代论说，张荅忱上将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在襄樊战役中殉国，至今整整三年。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不仅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宝贵精神。我们在抗日战争最后的一段行程中，要有伟大的爱和憎，爱我们抗日的同志，恨那般杀死我们抗日同志的敌人，不调和，不妥协，一直打到最后胜利。

五月二十二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说：“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继续存在更加有利。”“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这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马列主义真理。今天共产国际的解散，

必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的来到，亦必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党的战斗力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英勇地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并将和全国人民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完成民族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大业。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南方局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这个决定，并向同志们讲解了有关一些问题。

五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董必武在曾家岩五十号会见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同吴热情交谈国内外形势。指出，蒋介石已和日寇及汪伪汉奸政权达成默契，调兵遣将，包围解放区，积极准备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废除法西斯统治，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并再一次认真细致地向吴讲明了我党的宗教政策。临别时，董必武给吴开了一张学习书单，并赠给《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传》等书籍。

六月二日 周恩来、钱之光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招待离延回国途经重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员巴思。

六月四日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南方局对于共产国际解散后的国内形势的估计，并提出我们的

对策的意见。南方局估计，国民党将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加强政治攻势，同时施以军事压迫，强迫我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到他的所谓政治解决之目的。而我们的对策主要应是：向各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多谈边区及有关问题，分化顽固分子，争取广泛同情；在民主运动方面，着重研究民主合作的道路及实施政策，以教育民主分子；宣传方面，用各种方式宣传我党的抗战和建设成绩，宣传我党坚持团结与民主的主张和事实，宣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辅之以揭发敌伪的某些阴谋与当局政策的矛盾，且宣传特别注意民族化；加紧我们的外事活动，与美英自由主义者加强实际联系；在我党内部，一方面提高政治警觉性，一方面加强工作的责任心和创造性；并动员党内外干部讨论目前遇到的问题，发动他们提出今后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意见。

六月下旬 周恩来离渝返延前夕，在郭沫若寓所召集出版界、戏剧界同志会议，就抗议国民党查禁书刊、剧作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作了指示。

六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离渝回延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同时回延的有邓颖超、林彪、孔原等共一百余人，七月十六日到达延安。周恩来回

延后，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同月 南方局派周新民、李文宜到昆明进行统战工作。五月，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成立，六月南方局派周新民、李文宜到昆明。周、李离渝前，董必武指示要广交朋友，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周、李到昆后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以后又有赵讽、张光年、唐登岷、张子斋等一些共产党员参加进去，密切了我党同民盟的统战关系，在以后的民主运动中携手战斗。

七月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留。七日，国民党当局又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的“七七”宣言，并派军警封锁报馆。毛泽东电示董必武，将这些文件印成传单散发，并指示作好防止突然袭击的准备。

七月四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说，蒋介石正增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请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同时，对张治中、刘为章及各国驻重庆使馆说明，我们正在研讨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以赢得同情和制止内战的时间。

七月六日 蒋介石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唆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冒“群

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并发给中国共产党电报，胡说“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七月六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布上述消息。六月以来，蒋介石先后调集四、五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于七、八月间作了几十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七月九日 朱德等连续致电国民党蒋介石及各军事要员，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同日，延安三万多民众举行大会，要求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为保卫边区而奋斗，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团结、制止内战的通电。同日，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速将“七·七”宣言，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的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秘密印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又电董必武说，为彻底揭穿蒋介石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的阴谋，除已发之通电和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为驳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世界舆论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介石的封建的

买办的法西斯体系。指示南方局：（一）收到此文后，立即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二）搜集各方面的反响，报告党中央；（三）“新华”、“群众”用其他迂回方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董必武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动员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及地下党同志秘密印发了上述各种文件和材料。董必武等有公开身份的同志，还利用各种场合，向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揭露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阴谋，说明我党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二十二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怎么办》的短评。接着，《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连续发表了《法西斯丧钟响了》、《彻底扑灭法西斯毒害》、《彻底消灭法西斯》等一系列反法西斯的社论和资料。由于我党在政治上的充分揭露，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及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下，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停止其大规模的公开反共行动。

同年夏秋，南方局电广东临委，指示把广东惠东宝地区的游击总队改为东江纵队。十二月二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辖属七个大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林平致电周恩来报告了东江纵队成立等情况。

八月十一日 毛泽东、周恩来电董必武，告以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正在步步加强，应动员大后方民主进步力量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反对中国法西斯化宣传运动，组织文化界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但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

九月六日至十三日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全会一方面污蔑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叫嚣“打下延安”，“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又说，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因此，全会对共产党制定了“暂时拖，将来打”的方针。

九月十六日 中央书记处致电董必武，指示他出席国民参政会。指示说：对国民党反共决议，中央决定发表一文件回答之。本次参政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及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席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具体情况行之。”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会前，中共参政员董必武获悉大会将通过反共决议，拟不出席，国民党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前往敦劝，声明决无利用会议反共之意，董必武遂报到出席。二十一日，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攻击污蔑十八集团军及中国共产党。何应钦报告完毕，董

必武提出质问，并据实驳斥何对中共和十八集团军之造谣污蔑。国民党CC分子王普涵、王开明等即叫嚣捣乱。董必武当即向会议主席声明退席，并表示不再出席本次大会，以示抗议。董必武离会后，国民党参政员间互相指责，会场一片混乱。二十六日，黄炎培、冷遯、江问渔访董必武，希望董继续参加会议，董必武表示不再出席本次会议，如组织协议机关，或可出席。最后国民党一方面封锁董必武退席及抗议的消息，另一方面在参政会中以圈定的多数于二十七日强行通过《关于十八集团军之决议》，污蔑共产党破坏“政令军令统一”。董必武虽未继续参加，仍被选为驻会委员。

九月二十五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蒋介石今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演内容及其实质。电报说，蒋今日在参政会讲演中，表示愿实行民主政治、组织宪政促进会与党派协进会。还竭力拉拢张君勱、左舜生、李璜，允派杨杰赴美研究军事，等等。董必武说，蒋的目的是对中间党派采取组织拉拢，分化我党与中间党派的关系。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董必武说，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是欺骗，告诉各中间党派不要上当。电报说，要告诉各中间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

当。”并指示董必武不要出席本届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示对该会通过之反共决议的抗议。

九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被他们允许公开设立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电台。董必武致函蒋介石，要求恢复改为中共代表设置使用，并在谈判中多次提出，当局坚持不答应启封。

九月 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回南方局工作，川东特委撤销，分别成立上川东地委和下川东地委，由南方局直接领导。上川东地委书记孙敬文，下川东地委书记曾惇，均驻重庆。

九月 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请周恩来来到昆明面晤，中共云南省工委派耿根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南方局即派华岗为代表到云南，与龙云建立直接联系，对龙云进行帮助。随后，并在龙云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与南方局、党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初。

十月五日 邵力子约见董必武说：“国共关系应当用政治方法解决，而且是可以解决的。”希望董必武能出席在十月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董必武表示：“我党的基本态度，是希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民主，两党关系是可以好转的。”提出了改善两党关系的两条具体办法。六日，董必武电毛泽东，请

示是否出席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十五日的会议问题。董必武说：“我不出席第一次会，在政治上的作用不大，因我党已宣布欢迎政治解决，对王、邵的私人关系，恐引起不融洽之感，特别是对邵会影响以后谈话的桥梁。”十日，毛泽东电复董必武，“可以出席常驻会及参加宪政会。”十五日，董必武出席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同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说，延安对国民党已取缓和态度，并表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介石时除申述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国民党对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并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见王世杰或邵力子时，除申述上述意旨外，还应指明：内战必投降，这是死路，愿彼方善处。我党准备对付任何险恶局面，但首先愿意继续合作。着重指出国民党胡宗南令率董钊率部开赴榆林对我威胁甚大，刺激最深，延安不能不准备自卫。十一日，董必武会见王世杰、邵力子，申述了我党上述意见。王、邵除对此解释说，“中央决无对边区用兵之意”，希望两党问题通过商谈作政治解决外，还提出了派人“到边区看一下”。

十月二十日 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由五十四名会员组成，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被指定为会员，董必武并为常务委员。

十月二十三日 南方局学委会致电延安周恩来，并中央学委，报告了南方局整顿文风学习的总结情况。

十一月七日 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指示，通过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发动组织广大群众，于当日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电董必武。电报说，《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下，能采取各种方法开展斗争，是有成绩的。但在七、八、九月反击反共高潮中却刊登了几篇宣传宋子文、苏州反省院长等国民党官僚和两年实行宪政等文章。在平时，对蒋介石国民党亦常头条大题，安排不当。指示编辑部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以严肃的态度继续同大资产阶级反动派展开斗争。坚持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战绩，解放区的进步，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坚持《新华》的群众性，并要求作详细检查与具体改革计划。十二月二十六日，董必武致电周恩来

和中央宣传部说，在接到指示前我们已对《新华日报》和《群众》、《中原》两杂志近期内发表的几篇有错误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并开展了理论讨论。报馆编辑部负责同志和有关同志都同意中宣部的批评，并据以改进工作。

十一月二十八日 日军为支援太平洋战争，在打通广九铁路后，派出日伪军八千余人对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分三路连夜突围，日、伪扑空。日军又转回宝安，于二十二和十二月四日，又增派五百余人，两次向宝安阳台山根据地进犯，我军先后在坂田、石坳山等地截击敌人，重创大量日军，粉碎了日军发动的“万人扫荡”，保卫了东宝抗日根据地。这是在南侨属领导下取得的敌后游击战的一次重大胜利。

十二月一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开罗会议结束，发表了开罗宣言。

十二月二十一日 重庆文化界、妇女界、律师、上海法学院、育才学校师生及各党派人士四百余人举行茶会，庆祝沈钧儒七十寿辰。董必武、郭沫若、陶行知、左舜生等出席并讲话。董必武热情赞扬沈钧儒认真学习，研究新事物，并勇于实践的精神。他强调说，沈先生所主张的抗战、团结、民主，目前犹尚待

努力。

十二月二十八日 宪政实施协进会举行第三次常务会议。董必武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提高国民参政会权限的三条建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图书杂志审查等提案。

一九四四年

一月十六日 毛泽东约见国民党军事当局驻延安之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渝见蒋介石，并同国民党举行谈判。二月二日，国民党复电表示同意。十七日，毛泽东告诉郭仲容，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赴渝。二月中旬至三月期间，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制定林伯渠来渝后的对策。“对策”有：林到渝后，“借招待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往来，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控制其与外人接近”等等。蒋介石还明令指出：此次谈判首要的是军事方面，“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必须贯彻

国民党政府所颁行之一切法令规章。

一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审查剧本目录，不准上演者一百六十种，须修改后始准上演者七种。禁演剧本中有《草莽英雄》、《风雪夜归人》、《秋》、《原野》、《石达开》等，须修改者有《屈原》、《重庆二十四小时》等。

二月十五日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在广西桂林开幕。这次戏剧展览会，是在南方局的秘密领导下，以欧阳予倩、田汉为首的著名戏剧家，广泛地团结文化界和社会各界进步力量，冲破阻力，坚持举行的。“剧展会”筹委会主任委员欧阳予倩，主任秘书瞿白音，委员有田汉、熊佛西等三十五人。为使“剧展会”能公开合法，争取到由广西省立艺术馆出面主办，黄旭初担任会长，并请李济深、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十六人为大会名誉会长。参加这次“剧展”会的有广东、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江西、湖北、云南等三十三个戏剧团队近千人。“剧展会”内容包括演出展览、资料展览，举行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通过戏剧工作者公约三个部份。整个“剧展会”历时九十余天，至五月二十五日结束。重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简称“剧协”）召开大会，祝贺“剧展会”的胜利举行。《新华

日报》作了题为《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西南剧展开幕》的报道，并发表社论祝贺和勉励。这次“剧展会”不仅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而且影响深远，是继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重庆“雾季戏剧节”之后，南方局领导戏剧运动的又一重大胜利。

三月十二日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周恩来说：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欲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做基础，必须首先实行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真愿用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就应该承认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并给予接济，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周恩来所提出的这五点关于国共关系的意见，即是后来林伯渠赴重庆同王世杰、张治中谈判时的基本条件。

三月十九日 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发表，被中共中央列为整风学习材料之一。

三月二十一日 宪政促进会小组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讨论政治结社自由问题。吴铁城、张君勱、左舜生、董必武、莫德惠、黄炎培、孙科、李中襄、洪

兰友、邵力子、雷震等出席。

三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自一九四二年南委和粤南省委遭受破坏，南路特委与广东党失去联系以来的全部工作情况。董必武和王若飞先后对南路工作做了指示，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宣传群众，团结人民，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决定南路特委暂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六月，周楠回到南路，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南方局的指示，决定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扩大部队，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秘密游击小组，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作准备；加强统战工作，派出代表和抗日将领张炎联系。至十一月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三个大队共六、七百人，并多次击退日伪顽军的进攻。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委，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的希望。并告为与国民党举行谈判，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拟于艳日(二十九日)起程。

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偕王若飞、伍云甫等离开延安去西安。

四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打通从中国的东北直到

越南大陆的交通线，从本月起对国民党战场的豫湘桂地区发动了新的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分三路向河南进攻，二十二日攻下郑州，五月九日会师驻马店，二十五日拿下洛阳。接着，日军南进湖南，六月十九日，国民党军弃守长沙。八月七日，日军攻克衡阳，截断了国民党军东南与西南的联系。十一月十日打下桂林，二十日进占南宁。至此，日军完成了它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为巩固和扩大战果，日军以一部分部队追击败退入贵州的国民党军队，直到占领独山，威胁贵阳、重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暴露了国民党军已腐败到不堪一击，再加上财政上的困难，内部矛盾的加剧，以及国内舆论的批评，迫使蒋介石国民党同我党继续举行谈判。

五月四日 董必武与王云五、左舜生、王正廷、杭立武、董显光、端木恺、蒋经国、莫德惠、邵力子、张君勱、黄炎培等在重庆会议，谈论商民怨苦，物价狂涨，前途莫大危机等。

五月四日至十一日 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西安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谈。最后根据双方所提出的或同意的记录拟成四项十七条，商定由双方代表各自报告自己中央，再根据国共两党中央之意见在重庆继续谈判。

五月十一日 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指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条件。指示说，在同国民党谈判时，可以周恩来今年三月十二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会上演讲中提出的五条，加上此次你从延安带去的六条作为基本条件，并要求恢复西安、重庆办事处的电台和重庆、西安、延安间的自由往来。

五月十七日 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由西安飞抵重庆。随同林伯渠、王若飞到重庆的还有何其芳刘白羽。党中央派何、刘到重庆，是为了向文化界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文艺界的整风情况。

五月十九日 林伯渠会见蒋介石。

五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将拟定的谈判方案电告林伯渠，提出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等二十条要求。二十二日，林伯渠将二十条要求交付张治中、王世杰。张、王阅后认为所提太多，“足以使人生气”，不肯接受，希望修改。

五月二十三日 左舜生、章伯钧、张君勱、沈钧儒在重庆半山新村章伯钧家宴请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及翦伯赞，大家就目前战局及两党的谈判问题等

进行了交谈。

六月一日 王若飞在南方局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

六月三日 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同意他们对时局的估计与谈判方针，同时将修改后的提案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一并电告，指示据此同王世杰、张治中谈判，并望全部告诉即将来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各民主党派人士。

六月五日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报告了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动态。电报说：同国民党的谈判，我们全遵照党中央指示进行。蒋介石目前虽极困难，但绝无解决问题诚意，今天只是作出谈判姿态给中外看。此点苏美英人士、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及孙科、许宝驹、王昆仑都同我们看法一致。我们也不急于去催张治中、王世杰，也不拒绝谈判和冷落他们，我们态度是“不闭谈判之门，也不存急切解决之想”，而把精力主要用在宣传我实行民主抗战的成绩及力量上，用在推动国民党内一切不满现状的人积极起来争取民主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互相配合上。我们已同美国武官详谈两次，他目前最关心的是华北、华中敌军的行动。同苏联武官也已谈过，本周内还将与英国武官会谈。中间党派及地方实力派曾有

恐我党与国民党单独解决的心理，现在他们已清楚了我们的态度，都说蒋无诚意解决问题，我们力量强大，不怕拖，也不怕打，增加了他们争取民主运动的信心。近来了解到川、康、滇、粤、桂西南各地方实力派，有拥护李济深为中心，对重庆采取马蹄形包围，希望西北来一个军事发动，并拟西南在双十节将有一个大发动的想法。我们劝他们“不要妄为，要在法令中抓住有利于实行地方自治的东西，放手去做，要使自己比中央更民主进步。”对左翼文化界、妇女界、均开过座谈会，并个别和一些教授、学生、工业家谈过，他们都不满现状，要求民主。在国民党内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我们可以推动他们起来争取民主。电报说，有些英美人士和中间人士，希望中共改变名称，以减少外人疑虑，得到外国援助。而陈铭枢、孙科等人从自身需要出发，也有此主张。在这方面还需要多作解释。

同日 林伯渠会见张治中、王世杰，递交了写给张、王的信。信中说：为了利于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我党中央复电指示，将原提二十条改为十二条，而把一些小问题改为备忘录。十二条的要点为：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编中共军队为十六军四十七个师，目前至少给五

军十六师的番号，驻防地维持现状，承认陕甘宁边区及一切敌后抗日根据地，撤消对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停止对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的进攻，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两党均可以在对方地区内出版发行党报等。同日，国民党代表将国民党关于《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面交林伯渠。该“提示案”坚持只给中共四个军十个师的编制，对中共的合法地位仍不予承认，至于各党派之地位，人民之集会、结社、人身自由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更是只字不提。六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国民党的“提示案”与我党《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相距甚远。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也要求国民党代表将我党十二条转报其国民党中央，并且再次声明，西安谈话记录，是“为最后共同作成的初步意见”。六月八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说，六月五日所提的十二条，因与前面所提“出入太大，不能转呈”。西安谈话记录，既经过你修改、签字，应作为你的意见，且已将此件上报，政府“提示案”已尽量容纳了你的意见。六月十一日，林伯渠又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张、王拒绝我党正式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我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六月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

渠，称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六月七日 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会见流亡在重庆的韩国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韩军正副司令李青天、金植奎等十余人。

六月九日 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由团长谢葆樵、副团长邓友德率领抵达延安。参观团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十八集团军总部、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接见了参观团全体记者，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并就国内外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重申了我党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及国内问题中的立场和政策。参观团在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访问之后，于七月二十六日从延安回到重庆。参加这次参观团的外国记者六人，他们是：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纽约时报》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同盟劳工新闻》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福尔曼，《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夏南汗神甫，塔斯社普金科。中国记者九人，他们是：《大公报》孔昭恺，《中央日报》张文伯，《扫荡报》谢爽秋，《国民公报》周本渊，《时事新报》赵炳焱，《新民报》赵超构，

《商务日报》金东平，中央社徐兆鏞、杨嘉勇，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崑四人。

同日 林伯渠在曾家岩五十号举行茶话会，招待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妇，国际红十字会管理人员柏郎德，美国援华会爱德生等人。

六月十二日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张晓梅、张申府、刘清扬等在曾家岩五十号讨论国际形势及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情况等问题。

同日 广西发起保卫东南半壁河山的运动，重庆各界纷起响应，并力主用民主的方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

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电林伯渠说：张治中、王世杰既不愿考虑我党中央所提意见，而又片面地提出所谓“提示案”，我党坚决不能接受。指示立刻将国民党的所谓“提示案”退还张治中、王世杰。

六月三十日 林伯渠、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电报说，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已收下我党十二条提案，请示是否还要退还他们的提案，是否还要求张、王到延安谈判。并说，已将双方提案的要点密告美国使馆和史迪威司令部。同日，毛泽东复电林伯渠、董必武说：国民党提

示案“如未退回，即不必再退回，而另用伯渠、周恩来名义分别在渝、延两地发表公开谈话”。我方十二条及国府“提示案”可经美国友人密交华莱士（华是本月二十日抵重庆访问的），并在中间人士中传观，暂不公布。仍可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中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商谈“提示案”，如张、王均拒绝，则林单独回延讨论，以便作具体回答。七月一日，周恩来在延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两党谈判由西安谈到重庆，已历时两月，尽管政府提案与我党提出的书面意见内容相距尚远，商谈仍在继续。我党中央现正研讨政府提案，期谋合理解决。只要在有利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的条件下，我党无不乐于商讨。七月二日，林伯渠在重庆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谈话。

七月四日 林伯渠、董必武致电毛泽东。电报说，在目前时局下，谈判绝无解决希望，启封电台及放人等小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蒋介石要谈判，不敢公开和我破裂，是在故作姿态欺骗舆论，即令谈判破裂，好把责任尽量推在我方。真正具体解决问题的时机，还有待于时局更大的发展。我们对谈判仍是不抱任何幻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向各方宣传和推进大后方争取民主运动及调查研究上。我们已将双方条件的主要内容及蒋无诚意谈判的事实告知了关心这一问题的中外

人士。我们也认为根据今天的情况，不能采取退回“提示案”，拒绝商谈的形式。

七月六日 林伯渠与王世杰会谈。林询问对中共中央提案的答复，再请张治中、王世杰到延，并就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上月二十八日在《大美晚报》的造谣提出质问。王世杰表示：我方所提出的民主自由问题，他们是在想办法解决，中共军队扩编四军十师，请重考虑。关于启封电台和放人等小问题，待大问题解决后都可解决。他们二人去延事，要待在重庆谈出一点结果来后，才能去。同日，林伯渠、董必武两次致电毛泽东，报告了本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情况，并说：“目前谈判绝无望具体解决问题，但他们总要故意做出谈判姿态，不完全拒绝去延安，也不让我离渝。”现在我们的原则是，一方面要求张治中、王世杰对我提案逐条提出具体意见；另一方面访问国民党的一些中央常委，如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邹鲁、居正等。同日，毛泽东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示他们约张治中、王世杰见面，声明已将他们提案转告我党中央，我党中央认为双方意见相距尚远，为求进一步商谈，仍请张、王偕林来延一行。如为张、王拒绝，则提林单独回延报告，并讨论对国方提案之复案。若又不让林离开，继续商谈无法进行，谈判拖延之责任

就全在彼方。

七月二十三日 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举行会谈。林问国方对我提十二条之具体意见，张、王答复说，“提示案”即是具体的答复意见。

八月五、十七日 董必武两电毛泽东、周恩来，请示对付国民党扩大参政员名额的办法。十八、十九日，毛泽东两电董必武、林伯渠说，林伯渠如未离渝，可出席本次参政会，方针方法同去年一样。对增补名额，应持积极态度，但这是第二位的。现在首要的是与民主党派商谈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问题。

八月七日 由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派出的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一行十八人由重庆飞抵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会见了观察组全体人员，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同包瑞德和团员谢伟思作过多次重要的谈话。这些谈话和观察组在延期间的所见所闻，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共中央在本月十八日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把这次接待美军观察组和六月的中外记者参观团等，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展开，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美军观察组一直留在延安，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才宣布撤

走。

同日 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南方局关于广西沦为敌后以后，党组织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作出了组织全省各地抗日武装的决定，并先后建立了融县抗日挺进队、柳州日报社警卫队、灵川抗日政工队、临阳联队以及贵县、横县、武宣等地的抗日自卫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八月十日 王世杰、张治中写信给林伯渠说，中共今所提之十二条，未表示将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之政令军令。中共及一切党派之合法平等地位，将在抗战结束后行宪时给与，允中共军队扩编至四军十个师。至于解除对中共陕边的封锁及释放政治犯等，得在本次商谈获果后，才能考虑。要求林伯渠转告中共中央接受“提示案”，并迅速答复。

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给蒋介石，提出派赫尔利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到蒋介石处，以调整蒋与史迪威的关系，派纳尔逊借赫尔利到中国，以处理租借与其他经济事务。二十三日，罗斯福又通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统率美在中国的一切军队。九月六日，赫尔利、纳尔逊在史迪威的陪同下，由印度飞抵重庆。

八月十二日 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记者问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固执一

党统治与拖延实行民主主义”。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周恩来的谈话揭穿了梁寒操对记者们说的国共谈判已使若干问题获得解决，国共关系有改进的谎言，说明了阻碍谈判进行的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国民党。

八月十三日 毛泽东电林伯渠、董必武，指示将周恩来在十二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国共谈判迄无结果》的谈话，在重庆及各地广为散发，并要设法送往国外。指示说，衡阳失守，我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应要求我军扩编为四十七万人。

八月二十六日 黄炎培访晤董必武、林伯渠，就国内外形势及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八月三十日 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转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指出张、王十日来信中，对我之指责完全不合事实，是错误的，并对国民党在“提示案”和十日来信中的不合理要求，及无端的批评，逐一进行了驳斥。希望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的方针，认真推进谈判，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以争取全民族抗战之最后胜利。再次邀请王、张赴延安继续谈判，以便看看我党是怎样忠实实行四项诺言与彻底实

行三民主义的。九月十日，张治中、王世杰函复林伯渠说，林的来信“为夸张抹煞之词”和“不实之言”，且“要求与时俱增”。仍要求中共切实拥护国民党政权的统一，服从国民党的军事指挥，坚持一党专制。同时希望延安再派代表至重庆。

八月三十一日 王若飞在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整风阶段学习总结。

八月 中共广东临委与东江纵队举行联席会议。会后，报告党中央和南方局说，根据形势，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人民武装斗争，凡是共产党员都要参加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中来，要从现在的几支抗日武装扩展到全省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要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党中央和南方局复电，完全同意这一报告，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是符合中央最近指示精神的。指示积极恢复党组织的活动，推动全省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动员全省党员为实现八月会议决议而努力工作。同时还指示要协助广西方面的工作。

九月四日 中共中央就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问题电示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示说：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

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关于扩大参政员名额问题，可提出重新增加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史良等，文化人中可提郭沫若、茅盾等，如增加中共参政员，可先商定数目而后再议人选。

同日，重庆教育、文化、工商、金融、法律各界代表人士黄炎培、张志让、杨卫玉、褚辅成、冷通、江恒源、王云五、薛明剑、吴蕴初、卢作孚、潘仰山、胡西园、张肖梅、章乃器、潘序伦、吴羹梅、张雪澄、孙起孟、祝公健、陈北鸥、张澍霖、尹致中、向乃祺、刘伯昌、傅彬然、陈乃昌、王印佛、徐子为、贾瑰仁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九项建议，迫切主张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

九月六日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提出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之主张的办法。次日，党中央复电说：同意用我党中央的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在参政会报告机会，提出我党关于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并联系说明这是我原来提案中三条政治主张的具体解决方案。

九月十二日 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王若

飞说，在与纳尔逊、赫尔利面谈时，应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国共平分”。

九月十四日 林伯渠、董必武就各民主党派不赞成用中共名义正式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报说，我们曾与各民主党派商量我党将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他们不赞成我用党的名义正式向参政会提出，因为这样会引起大争论，他们不便表态。他们赞成我在大会报告中顺便提出。次日，毛泽东电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说，各民主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改组政府事，即请作罢。至于林在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斟酌情形决定；可提则提之。但在再复国方代表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九月十五日 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时提出了改组政府的问题。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于本月五日在国民政府军委会礼堂开幕，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出席。本日，林伯渠在大会上报告国共谈判四个月来的经过，以及迄今还无结果的原因。林伯渠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声明：中国共产党很盼望问题解决，我们所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希望国民党政府从抗战民主团结出发，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并且指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

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是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因此希望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立即召集有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我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的一致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高涨。九月十七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林伯渠这个报告，重庆各大报纸亦全文登载。十六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作报告，他在谈及中共问题时，仍然强调中共必须服从他的军令、政令和法纪，说是只有在“军令统一”、“政令统一”、“法纪一致”之下中共问题才获得解决。但他又说林伯渠十五日的发言“态度很好”，表示继续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可以考虑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十二个师，俟依法核编完成，就照国民党军一样发给饷械及医药用品。本次参政会还推出了冷遯、王云五、胡霖、傅斯年、陶孟和等五人组成考察团，赴陕北考察。

九月十六日，林伯渠、董必武致电党中央，报告张治中、王世杰本月十日给林的复信的用意及林、董准备回答的信函内容。十八、二十七日，毛泽东先后两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张、王十日信函是无理取闹，应严肃批评，非如此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仍可

请五参政员及张治中、王世杰来延，但不必再催，来与不来，或迟或早来，听其自然。同时将修改后的张治中、王世杰的复信电告林、董。十月三日，林伯渠致函张治中、王世杰说：目前国内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造成这些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一党独裁制度。因此，克服时局危机，挽救国家民族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新政策。要求国民党政府按我党所提方案，承认打日寇有功之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及一切抗日的军队，承认他们收复的国土。指出：目前国内还有一部分人在继续准备打内战，而且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愈益加紧。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对日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的目的。对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表示将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表示欣慰，对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表示欢迎，仍请张、王到延安一行。至于延安是否派负责代表到重庆事，林伯渠答复说：这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九月十九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将原来以党派团体为基础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以个人为基础的中国民主

同盟(简称“民盟”)。发表了对抗战现阶段的政治主张，呼吁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九月二十、二十一日 延安权威人士和观察家先后发表评论，表示欢迎国民参政会派观察团到延安，赞成蒋所表示的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同时强调指出：目前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败，反映出国民党政治、军事上的腐败无能。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必须立即改组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驱逐卖国贼投降派与法西斯分子，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九月二十四日 宪政座谈会第七次会议在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钟天心、司徒德、王昆仑、屈武、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李璜、黄炎培、董必武、刘清扬、张申府、胡子婴、邓初民等五百余人到会。张澜、冯玉祥、覃振、邵力子、李璜、董必武、黄炎培、邓初民、刘清扬等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好些人士在演讲中要求废除一党专制，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他们指出，民国已经二十三年了，“还是有名无实”，“再不民主，惟有亡国”。董必武继几位青年发言之后说：政府要求人民的，人民都做到了，而人民所要求于政府的则一项也未做到。如果不实行民主自由，中国就将

亡国。要真正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就只有实现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会议通过了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提议，并推王昆仑、屈武、钟天心、司徒德等作筹备人。

九月下旬 参政员张澜、邵从恩、李璜、常乃惠在成都对记者发表谈话。一致认为，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需要看，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必需”。

九月 南方局王若飞指示前来汇报工作的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说，云南要准备搞武装斗争，但要依条件成熟与否而定，切勿过早暴露目标。如日军占领广西南宁，进攻贵州独山，云南省工委即布置滇东南、滇南等地区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滇军中的地下党也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作了开辟敌后武装斗争的准备。

秋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琼崖独立纵队成立，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副司令员庄田，参谋长李振亚，政治部主任王伯伦。

十月一日 重庆各界举行追悼邹韬奋逝世大会，宋庆龄、董必武及各界人士八百余人出席，郭沫若、林伯渠等先后在会上致词，强烈呼吁为消灭法西斯，

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十月四日 成都四川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五个大学的七个学术团体发起在华西坝体育馆举行国是座谈会，到会者二千余人。在蓉参政员张澜、邵从恩、吴贻芳、常燕生、李璜、黄健中出席。张澜在会上高呼“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是一九四〇年以来成都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大型集会。成都《华西日报》在这前后接连发表社论、短评，主张把“国家大权交给人民”。

十月八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过的述评，批驳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言人张平群本月四日在招待外国记者时，发表的所谓有关组织联合政府一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的谬论。述评说，这是对一切爱国同胞（包括许多国民党员在内）和盟邦友人一致呼声的蔑视。强调指出，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除寡头政治，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

十月十日 延安各界集会庆祝双十节。周恩来说，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重要讲话。周恩来说，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错误的失败主义和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政策，致使国民党战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区域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周恩来指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到的唯一正确方案。”他要求国民党承认敌后全部抗日部队和各级民选政府。并且指出我党所提出十二条与委托林伯渠口头提出的八条，“仍应成为今后国共谈判的根据”。希望张治中、王世杰能到延安“视察和谈判”。他说：“我们认为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但必须在不违背抗战、民主、团结的大原则之下来解决”。

同日 昆明各界六千多人举行保卫大西南的群众大会，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大会是在我党的秘密领导下，由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社团、昆明文化界、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以及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联合发起的，约有六千人到会。大会发表了宣言，揭露和抨击了蒋介石政府实行消极抗日和独裁、内战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政权，成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保卫大西南的要求。

同日 重庆复旦大学举行国庆纪念晚会，千余师生出席，检讨当前时局。该校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在会上

分析日寇的新战略以后说，唯有刷新政治、团结全国，抗战危局方才可救。周谷城教授说，在这空前危机的时候，应该团结各种力量，才能渡过困难，但这就必须首先实行民主。许多学生发言对当前正面战场的溃败局面及黑暗统治，愤慨异常，激昂的喊出：“要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行动！”在这前后，重庆其他大学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

十月十三日 董必武电中共中央，报告当前美蒋关系。报告说：从六日蒋介石约孙科等谈话透露，中美商谈濒于破裂。蒋说史迪威袒共，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还说美国压迫已超过限度。

十月十五日 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说：已会过五参政员，促他们早去延安，并向他们揭穿国民党企图将拖延去延的责任推给他们，说他们不愿去。五参政员同意早去。

十月十七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首次会谈。次日，双方继续商谈。赫尔利说，在同国共两方代表会谈有初步结果即向蒋介石谈。蒋如同意，他便去延安与毛泽东商谈。本月二十三日，林伯渠、董必武与赫尔利第三次会谈，赫告林、董，他已为中国

解决了中美邦交中很困难的问题，现正试图解决国共关系，还说在二十一日蒋介石送给他一个方案；他考虑中共不能接受，已当场退回。蒋现正起草新方案，待他看后带去延安。

十月十八日 成都各大专学校中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帮助联系下联合起来，成立了“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它是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是党在成都学生工作中的得力助手，是成都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

十月二十一日 美国政府任命赫尔利代替高思为驻华大使；任命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同盟国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

十月二十三日 广东省临委致电周恩来及中央，报告临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的任务。电报说：广东地下党基本上执行了中央关于保存组织撤退暴露党员干部的指示。干部多数已分布到工农商学各界任职，广泛交结朋友，与各阶层联系较秘密，能荫蔽，对社会情况的认识与工作能力都提高了。除西江外，干部党员经初步审查，一般政治面目较清楚。有部份干部不善于新的领导方法，对组织策略不了解，不善于克服生活环境的困难。为着武装斗争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除国民党统治区及澳门仍坚持原来的隐

蔽的方针外，其他新旧沦陷区，广州、香港均恢复组织活动。但发展应慎重，并须根据战争形势分别规定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确定具体任务。游击区以东江纵队活动范围建立一特委，以中区部队活动范围建立一特委，保持若干秘密干部，公开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民主政权。西江及粤北新沦陷区，各设特派员，内已审查的部分恢复活动，其余加强联系及教育，加紧争取中间力量，团结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及民主政权。广州、香港保持特派员，实行单线领导。设法派人与南路、海南岛及潮梅闽西南取得联系，并联系散处各地的干部，吸收大批青年学生加以训练培养。临委及前省委各干部决定在年底集中分工，加强领导，进行整风学习，研究政策。为加强部队工作，将各地干部抽调一批到部队工作，加以军事训练，放手发动游击战争。

十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就关于湘粤桂三省工作布置指示董必武：（一）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秘密回湘南布置敌后各县人民武装斗争，但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国统区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方针。（二）李应吉如由衡阳撤回，仍宜深入商业，不参加秘密工作。（三）孙仁如能由川东调出，最好派回湖南。（四）东江部队沿粤汉路向北谋发展。（五）设

法通知广州湾以北地区同志，一方面谋武装发展，另一方面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六)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挺、廖承志、柳亚子三家宜多接济。如桂林危急，文化人宜走不宜留。

十一月四日 董必武电中共中央建议：(一)在西南加强同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促使他们向蒋介石要求民主，但不公开反蒋。(二)组织联合政府问题，也要在川、康、滇酝酿起来。(三)请党中央速与昆明龙云通电，并要龙转告刘文辉。电报说：我在渝正向各党派进行工作。龙云要华岗去成都与龙云、刘文辉、李济深代表及民盟等开五方会议。

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董必武回延安期间由王若飞主持重庆工作的决定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报说：如董必武能同林伯渠一道回延，仍望王若飞留渝主持工作，以待董必武返渝。在王若飞主持下，可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张明)、徐冰、钱之光、熊瑾玠、潘梓年、童小鹏七人为委员，王为书记。在讨论有关工作时，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等可列席。

同日 林伯渠偕赫尔利由渝飞延。

十一月九日 董必武与黄炎培、左舜生、张申府在重庆信义街三十九号举行座谈会，由董必武主持讨

论国是问题。董必武提出：各党派应进一步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以建立民主自由之中国。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赫尔利在延安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协定(草案)”。本月七日，赫尔利带着他同蒋介石商定的作为协定基础的五条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等与他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建立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建立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联合政府应成为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提倡进步、民主与自由；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应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公平合理分配军援装备；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五项建议。赫尔利对此建议表示赞成，十日同毛泽东主席一起签署了五点协议草案。同日，周恩来偕赫尔利等由延飞渝，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即把五项协定草案转交蒋介石。国民党声称此项方案不能接受，于十七日提出三条反建议案。即为：（一）国民政府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愿将中共武力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中共在竭诚拥护政府，并把军队交由政府统一指挥后，政府在中共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委会”。（三）政府

愿遵守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依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其他公民自由予以保障。但各该自由权利，应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

十一月十一日 成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的暴行，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继十月四日二千余人的国是座谈会之后，成都各大中学校的民主空气日趋活跃，学校里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迅速尖锐化。十月三十一日，成都市立中学举行反对特务统治的大罢课，成都市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方超亲率警察近千人包围并冲进成都市立中学，打伤学生三十余人，捕去四十余人。这一暴行引起各校学生、各界民众的义愤。在我地下党及外围组织“民协”的发动与领导下，十一月十一日，由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光华大学、中央医学院等八个大学和市中、华西协中、成都中学等二十九个中学的学生共七千多人举行示威大游行，强烈要求民主，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惩凶、恤伤、保障人身自由等要求。国民党迫于压力，由张群出面“允诺”了四项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成都的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周恩来和南方局肯定了这次斗争，认为“是国民党统治区群

众运动新高涨的一个信号”。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说，成都这次学生游行示威“为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

同日 林平致电周恩来并转中央，报告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召开联席会议作出的决议。为加强各地武装斗争的领导和建设，派梁鸿钧到中区，周伯鸣到珠江三角洲，两个营级军政干部到南路，迅速开展西江和南路的武装斗争。报告还就成立珠江三角洲指挥部，中区成立军分委和扩大东江军委的组织人选情况和琼崖的工作任务等问题作了汇报。

十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董必武等应美籍驻渝广播记者福尔门、劳工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杂志记者白修德、国际宣传处顾问夫聪的邀请出席宴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 赫尔利约见周恩来，递交国民政府提出的三条反建议案。周恩来认为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直接拒绝了五项协定草案，他继续留在重庆毫无意义，要求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提供飞机送他返延。

十一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在南方局工作人员会上作形势报告，指出目前的民主运动有五个特点：一、强调联合政府；二、具有广泛性；三、全国要求的一

致性；四、有盟国赞成；五、两种力量极大变化之时。

十一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指示将十一月十日在延安签署的协定草案及蒋介石拒绝本协定的情况，透露给各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

十一月 王若飞在重庆会见刘文辉派来的代表杨家桢说，蒋介石集团是外强中干，应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办法同他们作斗争。次年夏天，刘又派杨至渝会见王若飞，请求指点，王若飞告诉杨，必须坚决顶住蒋之压迫，坚持反蒋斗争，但又须注意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

十二月四日 周恩来同赫尔利、魏德迈、麦克卢尔、包瑞德进行会谈，赫尔利等几位美国人尽力想说服周恩来接受蒋介石政府的三项建议，均被周拒绝。

十二月五日 日军占领贵州独山。

十二月七日 周恩来、董必武等乘飞机回到延安。周恩来返延后，即写信给赫尔利，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我们最低限度五项建议之拒绝，即明白表示不同意我们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建议，同时又提出他的三点反建议案，这样就阻止了我回到重庆从事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我们发觉在这些新建议里面，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我们认为，为了告知民

众，并使政府改变其态度，现有公布我们五点建议案的必要。”赫尔利复电周恩来说，他将双方的建议都看成谈判中的步骤，他不相信谈判已经终结。希望不要公布我党的五点建议，并望周恩来能再次来渝谈判。

十二月八日 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二次参政会上报告《大后方的近况》。他用大量的例子说明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腐败，经济破产，文化、教育、出版事业横遭摧残的情况，并陈述了民主运动正在兴起，各界人士迫切要求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情况。

十二月九日 周恩来在边区参政会上报告当前时局及国共谈判的经过。

同日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九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指出“今天在大后方青年方面，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今天的情况，比之“一二九”时代更加严重，“到处布满特务和军警，使青年们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促成民主运动高涨。他说：国民党搞“青年从军运动”（蒋介石在豫湘桂战斗中，看到他的军队已不堪一击，而群众又对他的独裁统治极为不满，为加强其法西斯独裁统治，他利用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于十月号召动员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是要欺骗青年参加他组织的党卫军，但已被青年学生识破，使之遭到很大的失败。

最后，周恩来号召大后方三十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根据周恩来的报告精神，重庆南方局工作委员会，立即发动蒋管区广大知识青年抵制蒋介石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敌后解放区、到农村去。

十二月上旬 日寇侵占独山后，贵州面临全境沦陷的危险，为打击日寇，重庆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派曾由贵州转移到四川的张立、田伯萍组织带领原贵州地下党员三十余人回到贵阳，筹建黔东、黔南游击队，开展武装抗敌斗争。不久，日军撤出贵州，这批党员干部留下进行隐蔽活动。

十二月十一日 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了赫尔利、包瑞德等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意见。次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复王若飞指示三点：（一）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议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我们想发表的仅是我们向蒋建议的五条。（二）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三）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等“七大”开会后再说。要王若飞将此意见转告包瑞德和戴维斯。

十二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

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要求大家用种种办法促成联合政府。他说：“中国内部的情况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在目前，“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

同日 王若飞在重庆会见孙科。孙科认为我党关于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实行须有步骤。孙科提议国防最高会议如有委员三十人，可考虑国民党十五人，军队十人，各党派五人。他说蒋曾表示可以考虑此种方案。孙科认为蒋无良策解决中国问题，可能愿意接受此种方案。

十二月十六日 周恩来复信赫尔利说：国民党对我党的五点建议出乎意外和直截了当的拒绝，使谈判完全陷于停顿，我回到重庆已无所裨益。可以暂不公布我党的五点建议，但将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公布。周恩来明确指出，谈判的基本困难就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十二月二十一日 赫尔利再电周恩来希望周能到重庆谈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电赫尔利说，周恩来正从事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难以离开延安，并且国民

党政府并未表示充分诚意，以保证在五点建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他提议在延安举行一次会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 重庆市商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等六工业团体联合发表对时局主张，希望政府实施宪政，厉行民治，呼吁全国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十二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我党不愿在关于“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讨论。因此提出四点要求：（1）释放一切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及袭击新四军之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部队。（3）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之压迫性法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请赫转告国民党当局，“看他们是否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次年一月七日，赫尔利复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十二月二十八日信中提出的附加四点，与他们原来设想的谈判程序有距离。但他相信国民党可能作一种解决问题的让步。表示他将同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一同到延安会谈。

十二月 南方局确定青年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先在《新华日报》纪念“一二九”的特刊上提出了青年下乡的问题；继在本月二十四日出刊的《青年生活》上引用了刘少奇关于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论述；一

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更进一步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一月下旬，周恩来在红岩嘴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指出了实行这个方针的重大意义。从这以后，南方局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为止，仅由青年组直接动员组织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计有一百三十六人，分布在四川二十七个县区里。

同年冬，南方局派张友渔到成都工作，并向四川地方实力派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同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研究在日本继续进攻下如何保卫大西南问题。

一九四五年

一月一日 粤中人民根据广东省临委和广东省军政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梁鸿钧，政委罗范群，副司令员谢立全，政治部主任刘田夫，下辖四个团。同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正式成立，司令员林麟云、政委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参谋长周伯明、政治部主任刘向东。

一月四日 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书记周楠致电董必武、王若飞，报告南路地区的工作情况。报告说：香

港、广州的武装工作、整风运动、巩固组织、隐蔽工作、审查干部等已照你们指示进行，目前在这地区的中心工作是发展武装。我们的游击队已由去年八月的一个大队发展到三个大队，第四个大队正在建立中，预计旧历年各大队人数可达一千人，游击小组约一千五百人，拟改名为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极为严重，国民党与敌伪勾结配合向我进攻，加紧特务活动，而最为利害者则是最近成立的所谓“南路游击总队部”。他们用此名义按县区乡，强迫适龄壮丁编入该队，勒索民间枪支，以使我们无人可用，无枪可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一部分继续荫蔽，大部分武装斗争，努力扩大武装队伍。以前的两个通讯处已取消，拟设立电台与你们联系，是否可行，请由东江电台转知我们。本月中旬，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下辖两个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周楠，参谋长李筱锋，政治部主任温焯华。接着，南路发动了全面武装起义，在国民党顽军的打击下，遭受严重损失。三月，南路特委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了这次全面拔根起义的教训，决定未起义的地区即行停止起义，已起义的进行整顿，而后组成小型武工队返回原地开展活动。此后，南路人民武装得到发展，于六月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扩

充为五个团三千多人。

一月六日 蒋介石与赫尔利商谈同中共继续谈判的方针。决定由赫尔利偕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到延安进行两党商谈，以表“诚意”。次日，赫尔利即函复周恩来，说明他将陪同国民党的代表宋、张、王三人到延谈判。

一月十日 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昆明大中学校的进步社团在滇池举行会议，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其宗旨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同时，又在进步公教人员、企业职工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随后，还在进步工人中建立了民主工人同盟（简称“工盟”）。民青、新联、工盟都是云南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函复赫尔利，提出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信中说，我党所提五条要求为国民政府拒绝，而政府提出的三项意见我们也万难同意。今提出来延安开两党会议，盛意可感，只恐仍得不到何种结果，徒劳往返。八年来，一切秘密会议，均证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为此，建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的筹备会，国共两党，民盟代表三方参加，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行动的自由。此议如获国方

接受，周恩来将前往重庆磋商。二十日，赫尔利在得蒋介石的同意后致函毛泽东，说明了在国民党政府计划中的某些变更，并估计这些都不可能得到我党的同意，但希望我党不要马上予以拒绝，建议派周恩来或其他代表到重庆“作一短期访问”。

同日 王若飞、许涤新、潘梓年在重庆招待重庆产业界人士。到有吴蕴初、章乃器、胡子婴、吴味经、张蔚霖、罗秉源、罗叔章、马冠雄、田一鸣、马寅初、张肖梅、胡厥文等。胡厥文、罗秉源先后在宴会上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这是南方局负责人同产业界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座谈会。

一月十五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产生举国一致政府；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等自由；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十项主张。一月二十六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个宣言。国民党当局下令禁止出售这天的《新华日报》，并派出军警四处搜查，一经发现即没收或撕毁。《新华日报》同志遂将报纸抱至街头发给群众。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写信给《解放日报》社长博古说，民主同盟宣言，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时，国民党当局

动员军、警搜缴、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都发出去了，最后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他指示《解放日报》发表并在电台广播民盟宣言。

一月十八日 周恩来、董必武电王若飞，提出《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指示，文化人整风只限于南方局文委及《新华日报》社两部门的同志，对党外文化人主要是引导他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民主自由，同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即使是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也得根据大后方的具体情况，引导大家加强团结，更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

一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派会与推动孙科参加民主运动问题指示王若飞：党派会议只能是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会上应讨论国是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之组织及其实际步骤，应通过共同纲领，保证放人、撤兵、自由、废特四条之实现。望与民盟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交换意见，征求他们的主张。各党派会议我们是采纳孙科的意见精神提出的。从孙科所提建议的立场看尚不太坏，但必须告诉他：民主运动应不怕与蒋介石对立。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实行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繁荣的中国，是各党派联合的基本原则。从民主的立场看，拥蒋只能是有条件的。国民党能否保持其第一党的地位，要看其党内民主派的努力，而不能要他党保证。军队国家化是将来民主实现以后的问题，目前在中国提倡取消军队中的党派组织只会削弱抗战力量，增强独裁者的控制权，于民主运动是不利的。

一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电赫尔利：周恩来将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周恩来离延时，在机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去渝，是在向国民党、民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抵达重庆时，又重申延安机场谈话的精神。当晚，应邀出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举行的宴会，赫尔利出席，王世杰、张治中作陪。

一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邀集各方面民主人士代表黄炎培、冷遯、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邓初民、郭沫若、范朴斋等至曾家岩五十号商谈召集党派会议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当前形势和我党对党派会议的意见。

同日 周恩来在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会见郭沫

若、柳亚子等交谈目前时局与国共谈判问题。

一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往访孙科，双方就当前国家重大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接着出席赫尔利、王世杰的午宴。午后又出席郭沫若举行的招待茶会，同文化界人士进行交谈。

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两党谈判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指示，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到达重庆后，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连续举行谈判。周恩来反复提出召开各党派国是会议及改组政府问题，均为国民党方面拒绝。国民党代表在坚持他们原提出的三项条件之外又提出三点，即：（一）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下，附设一机构，邀请中共及其他党派参加。（二）由蒋介石委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名中共将领）、美军官一人，负责中共军队的改编等。（三）由蒋介石委派一“美国军官充任中共军队之直接司令长官”。同时，赫尔利亦提出两个补充办法，企图将我党军队完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周恩来拒绝国民党和赫尔利这些无理主张和办法，两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全部谈判的情况。同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我们不赞成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还不可能。对国民党、赫尔利的错误主张和无理要求应进

一步驳斥，并应将其意见转告民主党派，以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企图“将我们的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拒绝了“是很对的”。

同日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出指示。指示说，南方局在目前时期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层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只有这样，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川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才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详细布置，要求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去到基层和农村，加强群众工作。在这之后，南方局为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提高农村工作干部水平，在红岩嘴办事处和一些“据点”直接主持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一些省、市党组织也相继举办这样的训练班。

同日 孙科在嘉陵新村二十号原庐宴请周恩来、

王若飞、李璜、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王昆仑等，商讨国内团结问题。周恩来重申，中共主张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由此再进一步建立宪法基础上的政府，表示中共愿意以互信互让之精神解决一切。

一月底 周恩来在曾家岩五十号会见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

二月一日 邵力子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孙科、王昆仑、左舜生、李璜、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雷震等商讨国内团结问题。

二月二日 周恩来与王世杰谈判。周恩来提出关于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一）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负责召集，出席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起草的施政纲领草案，应在将来的国是会议上通过后，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此案未被国民党接受。遂由周恩来、王世杰共同主持草拟了一建议案。建议案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其

任务是商定：“（一）从事结束训政时期，以建立宪政之步骤。（二）将来共同遵行之政治决策及军队之一元化。（三）国民党外各党各派参加政府之方式”。并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期间，各党派必须停止一切责难。当晚及次日，周恩来、王世杰分别将此建议案报告两党中央，并通知赫尔利。

二月三日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我党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是：废除一党专政，承认一切党派合法，取缔一切特务机构及特务活动，真正开放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封锁，承认解放区，组织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可将此条件直告赫尔利、朱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及其他党派人士。当前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正在克里米亚开会，美蒋都急于与我党妥协，故应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合，一定要坚持我党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国方如不同意实行此先决条件就是骗局，我党就不参加政府。并望周恩来返回延安，但须“做到仁至义尽而回”。

二月六日 杨耿光、谭平山、郭春涛、邓初民、祝世康在棉花街五十八号李绍涵家，宴请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陈真如、杨虎、郭沫若、柳亚子、沈钧儒、左舜生、李璜、章伯钧、张申府、马寅初等，谈论时局问题。

二月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孙科、王世杰、左舜生、李璜、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章伯钧、王昆仑在参政会商讨国内团结问题。后周恩来与王世杰进行商谈。

同日 《新华日报》用两个半版刊登了马寅初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重庆星五聚餐会上的演讲：《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文章说，中共今日在西北所做的工作，就是国民党自己应做的事，也就是最接近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民主制度。今日唯有从速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开放言论，确立各党派合法地位，建立地方自治，并且必须在和平会议以前实行，中国的工业化才有可能。

二月十一日 重庆妇女界举行春节联谊会，欢迎曾去黔桂前线慰问士兵后返渝的李德全，同时招待从湘桂流亡来渝的文化界人士。刘清扬、史良、曹孟君、罗叔章、胡子婴、张晓梅、于立群等百余人出席。会议由刘王立明主持，李德全在会上报告了湘桂前线和沿途见闻，并且指出：当前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政治民主。与会者一致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挽救危局。

同日 美、英、苏三国领袖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会议，签定了雅尔塔协定。

二月十二日 毛泽东电周恩来说，你断然拒绝赫尔利企图控制我军的打算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先决条件，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重庆载有民盟纲领的《新华日报》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意所在。今日美国新闻广播说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我们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不要怕他们生气和大骂。

二月十三日 周恩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周直告蒋我党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及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蒋答：“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拒绝接受我党所提先决条件，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次日，周恩来在重庆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李璜、章伯钧、屈武、陶行知、杨耿光、陈真如、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特生、黄炎培，报告最近国共谈判经过及昨日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

同日 在南方局妇女组的推动下，重庆妇女界一百零四人联合署名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这一正义行动，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们对签名妇女中的一部分或进行警告，或解

靡辞退。三月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边区妇女团体致重庆妇女界的慰问电，表示赞同《对时局进言》中提出的主张，并对国民党迫害进步妇女的行为表示义愤。

二月十四日 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

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就国共谈判问题发表声明，驳斥昨日王世杰在招待外国记者时发表的歪曲事实的谈话。王世杰对外国记者们声称，在半月来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政府曾作了若干重要的让步，譬如：（一）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二）在军事委员会中容纳共产党高级人员；（三）在行政院中附设一机构，吸收中共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四）组织一个有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派人组成而由美国人当主席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改编中共军队。但这些都已被中共拒绝了。周恩来在声明中指出，王世杰十四日的说法“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他只讲了国民党在谈判中作的“让步”，而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国民党愿作这点儿让步的先决条件是：（一）共产党首先把全部军队交给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二）国民党在政府中之一党统治地位不能动摇。周恩来指出，在此前提下的“一切让步，不是

落空，便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日力量。”另外，国民党还拒绝接受我们关于召集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政策的建议和首先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等要求。声明说，这就是数月来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情况。十六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二月十七日 周恩来就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问题致电赫尔利。周恩来指出，四月二十五日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不能由国民党一方派代表参加。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国民党只能占三分之一代表名额，其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三分之二应是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否则不能代表中国，不能解决问题。

二月十九日 赫尔利离开重庆返国。赫尔利回到美国以后，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反对美国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赫尔利说，美国确定不移的立场应是：在中国事实上没有统一的军队，统一的政府以前，“一切武装军阀、武装党徒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都必须没有例外地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四月一日，赫

尔利又在美国发表演讲攻击中共，他说“国民党并无法西斯野心，中国统一之阻碍在有武装之政党。”

二月二十日 国民党特务枪杀重庆电业工人胡世合，发生“胡世合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因势利导开展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伸张正义的斗争，赢得了重庆市和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十天内，参加吊唁的各界群众达二十余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于二十六日枪毙了特务田凯，并抚恤胡世合家属，斗争取得了胜利。

二月二十一日 王若飞、郭沫若在郭沫若家邀集沈钧儒、何公敢、潘怀素、张申府、陈铭枢、陶行知、郭春涛、屈经文、高崇民、章伯钧、邓初民、王昆仑、许宝驹、谭平山、李璜、左舜生、杨耿光、黄炎培等讨论克里米亚会议及国共两党团结问题。黄炎培提出以公意请周恩来尽早返渝。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样的集会，以后每隔十天左右举行一次。

二月二十二日 重庆文化界三百余人联名发表由郭沫若起草的《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

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之法令；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对英、美、苏采取平行外交等六项具体意见。

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就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域民主运动问题指示王若飞。指示说，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有利于国内民主，我们应抓住机会争取，但是蒋介石在这时不一定让步。因为，国际条件尚未成熟，国内大后方的民主阵线尚未形成，群众基础还薄弱，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没有组成，他可能拖。谈判也不能速成，只能用公开谈判的形式来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目前国内各方面均拥护我党的主张，由国、共、民（盟）三方组成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望以我党之主张发动各方面，说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国民公意。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我党一向全力支持，并拟在大后方成立民主运动统一委员会，你在渝即以共产党的代表资格参加该委员会，以大力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

三月一日 蒋介石在宪政实施促进会发表演说，仍坚持他在一月下旬提出的意见，要我交出军权、政

权，以统一于国民党之下；反对废止一党专政，而以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来对抗各党派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

三月二日 中共中央致电王若飞，指出蒋介石三月一日在宪政实施促进会发表的演说的实质，仍是坚持一党独裁，反对党派会议，反对建立联合政府。他拟在十一月召开的“国大”只是他的御用国会。要告诉民盟等各方人士，王世杰的诺言（即赞成召开政协会议等）是不可靠的。要一致起来坚决反对蒋记“国大”，坚持主张先召集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

三月五日 周恩来、董必武致电在云南作统战工作的华岗，对大后方民主运动问题作出指示。指示说，你去年下半年在成都与各方面民主力量协商，使他们了解我党政策的作法甚好。我们支持成立一个民主委员会，希望能在云南与龙云、民盟及各方密商酝酿。

三月七日 周恩来致电王世杰说，蒋介石在三月一日演说中，已提出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则国内团结已再无转圜余地。同时指出，旧金山会议英国、美国均有各方面代表参加，我国亦应由国、共、民（盟）三方派代表参加，我党已指定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为代表。

三月八日 中共中央致电王若飞，指示坚决坚持

召开党派会议，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公开揭露与批判蒋介石的阴谋，说服民盟在渝、蓉、昆与我配合。本届参政会，我不争名额，听其委派，看情形再说，并告沈钧儒、陶行知他们，听之为好。

同日 重庆各界进步妇女第一次单独举行纪念“三八”节活动。在这以前，每年的“三八”节纪念活动，都是以妇女指导委员会名义出面，各妇女团体联合举行的。今年开始筹备工作时，进步妇女所提出的口号没被采纳，推举李德全在大会演讲也被否定，筹备会完全为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把持。于是，各界进步妇女在南方局妇女组的推动下，决定在二月对时局宣言的基础上，单独举行纪念活动。这次进步妇女们单独举行的“三八”纪念会，分别以重庆市政府妇女工作队，银行界女职工，中苏文协妇女委员会三个名义，由李德全、倪斐君、胡子婴三人分别主持，在三个不同地方同时举行。

三月九日 周恩来写信给赫尔利和王世杰，声明：（一）因蒋介石三月一日公开谈话，反对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坚持召开一党控制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我党已无需再起草关于召开政协会议之建议。（二）国民党独占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我党已派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中国代表

困，若此建议国民党不接受，我党将反对国民党这种分裂行为，并保留表示一切意见之权利。几天后，赫尔利从美国复电周恩来，要求切勿作最后决定，待他后来商谈。

三月十一日 昆明文化界三百余人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三月十三日 中国民主同盟扩大谈话会在重庆“特园”举行，传观周恩来致王世杰、赫尔利的信，并谈论有关问题。

三月十七日 王若飞约黄炎培、冷通会谈，谈论国共关系问题。

三月十八日 周恩来、董必武出席延安文化界人士会议。会上周恩来报告《大后方民主运动及文化运动情况》，董必武报告《大后方的一般情况》。

三月二十三日 王若飞在重庆良庄沈钧儒寓所会见民主党派人士，把赫尔利给周恩来的复电告诉大家。

三月二十七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团人选名单：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成员有王宠惠、李璜、吴贻芳、魏道明、胡适、顾维钧、张君勱、董必武、胡霖，顾问施肇基。

三月 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礼、谷子元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取得联系，成立了湘中工作委员会，周礼为书记，刘亚球任副书记。八月，日本投降后，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奉命北撤，湘中工委同志一度离开湖南。九月，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支持湖南地下斗争的指示，周礼等回到湖南。十月，在长沙召开会议，恢复了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由周礼、刘亚球、张春林、刘鼎组成，周礼任书记。会议研究了恢复党组织和发展工作的问题，确定近期的工作重点是：重新进入城市，领导城市民主运动，到工人、学生中去建立城市工作基础，并全省范围内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站稳脚根。会后调整了全省的领导骨干，以适应新的工作形势。

同月 《新华日报》派彭少彭到昆明，建立《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销处，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支持和龙云的允许下，于五月正式开业。

三月三十日 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街七号召集会议，宣布该会工作到此结束。出席会议的有沈钧儒、翦伯赞、夏衍、徐冰等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百余人。与会人士对郭沫若和“文工会”的战斗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国民党政府解散“文工会”表示极大的愤懑。

沈钧儒说，文化工作机关可以解散，但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精神是无论如何解散不了的。翦伯赞说，机关解散了，到马路上也可以团结起来。郭沫若表示：今天我们是被解散了，可我们更自由了。四月八日，重庆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到会一百余人。中共董必武、王若飞出席。王若飞在会上提出，要求国民党政府选派郭沫若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顾问，如果不能实现，欢迎郭沫若到陕甘宁边区去。与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人民太缺乏民主权利了。六月七日，王若飞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邀集各界人士聚会欢送郭沫若赴莫斯科参加莫斯科科学院二百二十二周年纪念。次日，中苏文协、中华全国文协和全国剧协联合举行会议，欢送郭沫若赴苏联。

四月六日 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偕伍修权、陈家康等由延抵渝。本月十二日，董必武在陈家康、章汉夫的陪同下离开重庆经印度赴美国旧金山。

同日 民盟举行欢送董必武赴旧金山的茶会，沈钧儒、冷通、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张申府、陶行知、史良、刘王立明、翦伯赞等出席作陪。董必武发表了为团结建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共同努力奋斗的

讲话。

四月十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

四月十五日 赫尔利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对华政策问题。二十二日，赫尔利飞抵渝。

四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中共除上届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陈绍禹外，新增加周恩来、吴玉章，共八人。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大后方派出代表团出席了党的“七大”，代表团的主任叶剑英，副主任陈铁铮（孔原）。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制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

入史册。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四月二十五日 由苏、美、中、英四国邀请召开之联合国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历时六十三天，于六月二十六日闭幕。会议闭幕后，董必武暂留纽约。

五月二日 苏联红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

五月四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发动下，昆明市一万多大、中学生及民主人士举行纪念会。会上，大家纷纷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五月二十一日 王若飞、冷遹同赴黄炎培处，共商国共关系问题。二十三日，褚辅成在参政会招待王若飞、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冷遹、傅斯年、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商讨了恢复国共商谈的办法，将以此询问蒋介石的意见。三十日晚，王若飞邀黄炎培、冷遹至住地就国共关系问题作商谈。六月一日，蒋介石邀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傅斯年、王云五谈话，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在坐。褚等谈及发起促

成国共之继续商谈，已商定由他们致电延安。蒋表示“无成见”。六月六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遯、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参政员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两党“从速恢复商谈”。

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就国民党定于七月七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声明中共参政员不出席本届参政会。声明说，中共参政员不出席的原因有三：（一）我党与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再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民党政府代表拒绝。我党为恢复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所提出的一些起码条件，国民党方面不但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二）召集国民参政会，本应同各方协商，而国民党当局却完全一手包办。我党参政员为国民党指派，并非自己推定。国民党对我这种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也与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国民党的“六大”，竟不顾中国人民和各党派的反对，片面决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并拟在本届参政会上强行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中共中央负责人指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即将召开的四届国民参政会，“其性质是反民族的、

反人民的、反民主的，一句话是反动的。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六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付美蒋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给王若飞指示：（一）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扶蒋反共，这是确定的。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是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内战，但又不怕内战，以此压蒋之火焰，坚定同盟者之信心。（二）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要想制止内战，除非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我们除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建立华南根据地外，在大后方应着重积极准备农村武装斗争及深入做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

六月十八日 毛泽东、周恩来电王若飞和国民参政会，告以给褚辅成、黄炎培等七参政员之复电。王若飞接电后，立即约见褚、黄等，转告毛、周复电。电谓：国民党拒绝党派会议，坚持召开包办分裂之国大，已进一步造成内战危机。诸公的热心呼吁，倘能使当局觉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之民主改革，我党无不乐于商谈。复电表示热诚欢迎七参政员赴延。同时，王若飞向褚、黄等说明了我党将不出席本届国民参政会之原

因。

六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在延安召集在延的南方局各有关同志举行座谈会，总结检讨南方局的工作。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到会并作了发言。与此同时，南方局所属各省地下党在延同志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分别召集会议，总结检讨自己地区的工作。在重庆，由王若飞主持的工作委员会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工作总结，并调集各地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回到红岩嘴举办了学习班，总结了一九四〇年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方针以来的经验教训。

同日 重庆文化界在西南实业大厦集会祝贺茅盾五十寿辰。文化界及各界人士七、八百人到会，王若飞、柳亚子、沈钧儒、邓初民、马寅初、邵力子、常任侠、刘清扬、冯雪峰等出席并发表讲话。《新华日报》发表了王若飞为祝贺茅盾五十寿辰撰写的代论《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文章说：茅盾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同日，成都、昆明等地文化界亦集会祝贺茅盾五十寿辰。

六月二十六日 褚辅成、冷遹、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黄炎培七人在中央研究院会商，对团结问题，议定意见三条：（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

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并决定将其意见致函蒋介石，俟蒋同意后，即偕赴延。次日，王世杰、邵力子往见七参政员，力劝不要致函蒋介石。当日下午，七参政员决意面陈，终与蒋会见。蒋表示无成见，可以商谈。褚辅成等决定立即去延。

六月 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动员组织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这项工作主要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执行。南方局其他部门和地下党组织都做了许多工作。到八月二十日为止，先后动员了五百一十余人到中原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又立即组织了一批知识青年到张家口参加我党举办的翻译人员培训班。

七月一日 国民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冷遯、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我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六参政员在延安期间，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三次正式商谈。七月四日，商谈结果：一、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建议：(一)政治会议应由国、共、民(盟)三方各自推出同等数目的代表加上无党派代表组成。(二)政治会议的性质，应该是公开的、平

等的、自由的、一致的，有决定权的。(三)政治会议应讨论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制定民主施政纲领及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等。(四)政治会议前释放政治犯。(五)政治会议前，应由国、共、民(盟)三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中共提出的上述各点及具体内容。七月六日，六参政员由延安回到重庆。

同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在南方局的支持下于重庆成立。该会的理事长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总干事涂长望。成员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一百位科学工作者。“中国科协”出版了《科学新闻》月刊，促进科学工作者的团结，推动科学工作者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报导科学界人士的各种活动以及国内外科技的新发展。

七月六日至二十一日 中共广东省临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广东临委下属各特委和部队各支队、两个行政委员会的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深入学习党的“七大”决议；二、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三、建立广东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省区委员会。区委委员尹林平、梁广、曾生、王作尧、杨康华、林锵云、梁鸿

钧、刘田夫、罗范群、周楠、黄松坚、连贯、梁嘉。书记尹林平、组织部长梁广，宣传部长饶彰风，统战部长连贯，城市工作部长黄康。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研究与指挥全省军事工作，政治部负责研究与指导全省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决议要求大力发展党，扩大主力军，巩固民主政权，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华南民主运动，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七月六日 《新华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重庆群众争相购买。国民党当局为之恐慌，即令宪警没收市面发售的报纸，邮检部门扣留发往外埠的《新华日报》邮件。南方局即令新华日报馆加印一批，并动员各方面力量广为发行。南方局所属各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同志都积极投入了紧张的发行工作。他们采取各种巧妙的办法将这天的《新华日报》送到了广大群众、进步民主人士、海外华侨、各国驻重庆的使领馆和在渝的友好人士，以及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物的手中。新华日报馆还将《论联合政府》印成小册子发行。南方局还指示全党要认真学习，并设法在朋友中组织传阅。

七月七日 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军委会礼堂开幕，为期十四天，中共参政员及张澜等均未

出席。

七月十五日 中国妇女联谊会(简称“妇联会”)在重庆成立。这是在南方局妇女组直接领导下,在民主运动高潮中建立的进步妇女组织,它是在我党和进步妇女团体所组织领导的小型读书会和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妇联会的理事会成员有李德全、史良、刘清扬、张晓梅、曹孟君、罗叔章、韩幽桐,胡子婴、倪斐君、陆慧年、郑英等二十六人。该会在各地“发展据点”基础上先后在昆明、成都、重庆、桂林、南京、上海、北平、港九等地建立了分会。该会从抗战末期到新中国成立,对团结发动妇女,配合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七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电重庆南方局工委负责人徐冰、张明,指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应将延安和各地反内战的情况,在大后方设法传播;应“用最大的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的农村据点,准备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打游击”,并且要求立即派人领导贵州等地的民变。

七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电徐冰、张明,告以在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调集九个师的军队进攻边区。指示徐、张向大后方人民、民主人士及各国使节、新闻界说明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呼吁共同起来制止。并

令王炳南、龚澎在记者会议上进行揭露，《新华日报》加强宣传和戒备。二十五日徐冰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向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国民党军队在参政会期间大举进攻边区，发生“淳化事件”的经过。徐冰为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引起冲突事访晤邵力子，提出双方军队“各回原地”。邵反称此系中共军队突出边区所致，只要中共军队退走，决可无事。二十七日，徐冰等又将南方局编印的《淳化事件真象》材料分送各方面人士。《新华日报》发表了徐冰与邵力子的谈话，并加编者按说明“淳化事件”的经过真相。

七月二十六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七月二十八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四项要求：（一）确实保障人民自由。（二）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三）彻底取消一切特务活动及特务机构。（四）承认各党派公开活动权。

七月 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在青年“据点”的基础上，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

八月八日 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八月九日 毛泽东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

战》。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八月十日至十一日 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命令，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深入东北。我军在东北、平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各线向日伪军开展了全面大反攻。

八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说，苏联参战，日本已表示投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可考虑恢复国共谈判，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取和缓态度。但绝对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应在人民中揭露其欺骗，对他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充分精神准备，而在目前主要应集中力量解决敌伪，夺取最大的胜利。

同日 蒋介石连下达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十二日，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在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

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部队缴械。十五日，蒋介石任命孙良诚、周佛海、罗君强等一批汉奸卖国分子为司令长官。演出了由美帝国主义支持，蒋、日、伪合流的丑剧。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八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阶段过去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我党关于和平建国的方针。

同日 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复电蒋介石，指出蒋在十一日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民族利益，表示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

八月十四日 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重光葵以及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同日 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同日 蒋介石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商谈日本投降后的国家大计。

八月十五日 朱德总司令命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

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向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被国民党包围之日军在外）。

同日 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并要求美国停止对华租借法案，不要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

同日 中国妇女联谊会发表对时局宣言，号召广大妇女组织起来，争取民主、和平、团结建国。提出了彻底解除敌伪武装，严惩战犯等七项要求。

八月十六日 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集团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提出了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再次严正拒绝蒋介石在八月十一日的错误命令。声明表示坚决地彻底地反对蒋的错误命令，直至他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

同日 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提出要待蒋介石对朱德总司令本日电中所提各项要求表示意见之后，方考虑和他会见的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指示徐冰、张明，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十项主张。

八月二十日 蒋介石第二次致电延安，再次邀请毛泽东来渝商谈。

八月中旬 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广东区党委：日本帝国主义已投降，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各级党组织要迅速做好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扩大武装人员，解放中小城市，建立革命政权，接受日军投降。遵照这一指示，东江纵队、琼崖独立纵队等华南抗日游击队迅速向日伪展开攻势，先后解放大小城镇数十处，建立了革命政权，帮助人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受到群众拥护。

八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决定派周恩来到重庆同蒋会见。

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第三次驰电延安，谓时机迫切，盼望毛泽东、周恩来偕同至渝。

八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电复蒋介石，他将偕周恩来赴渝，同蒋直接谈判。

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

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立即实施以下六项紧急措施：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民，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八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告诉全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和我党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及其将根据发展情况所应采取的对策。

八月二十七日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同机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

八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

利、张治中的陪同下由延飞渝。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及沈钧儒、左舜生、董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遹、郭沫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以及中外记者数十人到机场欢迎。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说：“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救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更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希望中国的一切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赴山洞桂园出席蒋介石的欢迎宴会，赫尔利、魏德迈、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等应邀作陪。

八月二十九日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会谈。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同蒋介石会谈，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会谈。这一天的谈判，主要是商讨进行这次和平谈判的必要性及谈判的原则、方针和程序问

题。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举行茶会，招待各方面人士，就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作了说明。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社论说：在今天，全世界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渴望着和平，而真正持久的和平，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毛泽东的来渝同蒋介石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正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力求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之上，合理地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协力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热心与诚意”。“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里所提出的六项办法，代表着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心底要求”，“我们希望在这个历史性的会谈中，能够依据这些要求，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许多报刊都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欢迎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同蒋介石、国民党举行谈判。

同日 蒋介石为国民党谈判代表规定谈判三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同日 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十年内战期间编印的《剿匪手本》(即《剿共手册》), 加紧反共内战动员。

八月三十日 周恩来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对政治军事问题作商谈。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往访宋庆龄、美国大使赫尔利、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王若飞在桂园会见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章伯钧及张澜、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 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张治中举行的欢迎宴会。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傖、吴铁城等应邀作陪。

同日 加拿大加华联谊会等九团体联名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 希望谈判结果使两党“能重新接近”, “以防止内战”, 而“现在最必要的是立即取消一党专政, 并尽早完成民主联合。”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长时间商谈。

同日 毛泽东在桂园宴请柳亚子、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 就团结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举行的欢迎宴会, 黄炎培、王云

五应邀作陪。

同日 苏联《红星报》观察家发表评论说，中国将来的发展靠国共两党民主合作。当今两党领袖在重庆开始的谈判，即是以克服旧日分歧，讨论战后中国的新任务为宗旨。

同日 重庆八大杂志主办人，即《中华论坛》章伯钧，《宪政月刊》和《国讯》半月刊黄炎培、张志让、杨卫玉，《民主世界》钟天心、《民宪》半月刊左舜生、《文汇周报》陈翰伯，《再生》孙宝毅，《中学生》傅彬然等举行会议，一致认为战争时期业已过去，审查书籍杂志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定除致函国民党中宣部、参政会、宪政协进会，请明令废止外，从九月份起不再送审，发行联合增刊。《东方杂志》、《现代妇女》、《民主与科学》等一批杂志即起加入，并于九月六日举行第一次联谊会，采取一致行动，拒绝送审。九月八日，成都《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现代周刊》、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等十余家新闻文化团体联名致函重庆杂志界，响应拒审行动，表示从即日起拒绝送审。至九月十日，成都除《中央日报》和《黄埔日报》继续送审外，其余报刊通讯社均不再送审。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城市的新闻、出版、文化界亦纷纷响应，形成一个反对法西斯新闻检

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九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参事张平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从十月一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八月 日寇投降前后，蒋介石就令阎锡山指挥所部以三个师两个纵队，并与日伪勾结，发起对我军的进攻，至九月初旬，先后抢占了被我军解放或围攻中的城市长治、长子、屯留、壶关、潞城、襄垣等。并派部队插入上党地区，企图将我太行、太岳两地区分割，把我军主力逼进山地消灭掉，进而与胡宗南等部联系起来，一举拿下陕甘宁边区及我在黄河以北的解放区。九月初，刘伯承、邓小平在山西潞城西黄碾村召开我军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保卫上党的命令和作战部署。九月二日，我军收复襄垣城，揭开上党战役序幕。至十九日，我军连克五城，使进攻上党的国民党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只能困守长治待援。

九月一日 周恩来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商谈军事问题。

同日 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定举行鸡尾酒会。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及外宾三百多人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受到与会人士和等候街头的几千名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吴铁城举行的欢迎宴会。

九月二日 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同日 周恩来与王世杰会谈。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在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澜、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冷御秋、张申府、章伯钧、罗隆基、鲜特生等出席作陪。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宾主并就时局问题进行亲切交谈。

同日 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邹鲁及各方来访友好人士。

当晚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的还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伯苓、莫德惠、江庸、王云五、张群、左舜生、傅斯年、冷遯、黄炎培、邵力子、吴鼎昌、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甘乃光、吴国桢、周至柔、雷震、白崇禧、翁文灏、许孝炎等。宴毕，毛泽东同蒋介石单独会谈，双方对军队编组数目、军队驻地和解放区、政治会议、国大代表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九月三日 毛泽东在桂园约见王世杰，周恩来、

王若飞在坐。毛泽东对两党谈判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八项原则性意见，略为：（一）在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果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府；（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谈判。周恩来将中共拟定的两党谈判要点十一项交付国方代表转蒋介石。其要点是：（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宣言中的三民主义。（二）拥护蒋介石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

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至此，两党普遍交换意见阶段完毕。

同日 毛泽东于下午三时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等，五时在桂园接见韩国临时政府全体成员，六时又在桂园会见郭沫若夫妇和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等，询问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七时半赴枇杷山出席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

同日 周恩来应邀出席陈诚举行的宴会。

同日 九三学社筹备会成立。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的胜利，为促进中国各方面力量联合建国和中国人民的民主幸福，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许德珩、吴藻溪、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褚辅成、税西恒等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并于当日成立筹备会。本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会见筹备会的许德珩等，在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毛泽东建议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九三学社筹备会的一致赞同，他们在积极参加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中加紧进行筹备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社章和成

立宣言，选出了领导机构。这年的十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北平，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分别成立了分社。

九月四日 蒋介石召见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了解谈判情况，商讨对付办法。蒋手定“对中共谈判要点”四条，令本此四条作出对中共三日提案之复案。该四条是：（一）中共军队之组编，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双方商定。（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三）拟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同日 上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白崇禧。周恩来在桂园与张治中会谈。中午，赫尔利在美国驻华使馆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吴国桢等应邀出席。美国国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史奈特等在座。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蒋介石为庆祝抗战胜利，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举行的招待中外人士的茶会。会间，毛泽东接见重庆《新蜀

报》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除走和平、团结、民主之道路外，决无他道可循。当今若干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必须修改或予以废除，自由才有保障。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度单独会谈。晚上，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对实质性问题举行首次谈判，主要就军队整编和解放区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同日 美国《先锋论坛报》发表社论：中国民主团结的努力，对美国对世界和对中国一样重要。如果他们失败了，后果是严重的。

九月初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商定，立即派出一批同志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大城市筹办复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纸刊物，周恩来还亲自找派往各地的同志谈话，作具体布置。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又指示说：“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很快筹备完毕，因国民党当局阻挠，遂决定先在上海出版《群众》周刊。一九四六年五月，《群众》周刊在上海出刊。《救亡日报》经过一番筹备，

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改为《建国日报》出版，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但是，这张报纸只出了十二天，就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查封了。

九月五日 毛泽东接见重庆《大公报》记者，就国共团结，实行民主政治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发表谈话。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应邀赴邹鲁午宴。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及其他友好人士。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赴褚辅成、黄炎培、冷遯、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参政员宴会，旋至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蒋介石、宋美龄为招待苏联大使及使馆人员举行的茶会。

同日 昆明教育文化界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发表宣言，提出根绝内战，保证胜利果实的三项具体意见。

同日 国民党令傅作义部进攻察绥解放区，向张家口逼进。十二日，国民党胡宗南、孙连仲部在河南郑州、洛阳、新乡等地集中二十万部队沿平汉线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九月初以来，国民党在广东集中两个师和一个军的兵力，以伪军为先锋，向我解放区和游击区进攻。这一系列的军事进攻和它在山西上党地区发动的进攻一样，其目的都是企图以军事上的压力

逼我党在谈判桌上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并为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共创造条件。

九月六日 毛泽东至山洞林园与蒋介石会谈。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午宴，丁惟汾、叶楚傖、陈立夫、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出席作陪。宴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访晤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和中正学校、中央大学故旧，继至南开中学拜访柳亚子、张伯苓。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宋庆龄欢迎宴会，宴毕往访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

同日 成都文化界叶圣陶、李劫人等二百余人发表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宣言。指出：最近内战的阴霾内战的事实已更加浓密，更为扩大了，这个内战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挽救当前时局危机和奠定团结建国大计的六项措施。

同日 苏联《消息报》观察家发表评论说：巩固亚洲大陆各国的民主制度，首先是中国的民主制度将起决定的作用。这说明为什么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谈判如此吸引世界舆论的注意。美国《华盛顿邮报》亦发表社论，指出蒋介石在庆祝抗战胜利会上所说的“大多数东西都是重复以前的声明”，中国“必须找出政治上团结之道，而这点只有在实现共产党要求方面，远较蒋

迄今所做的大进一步，才能达到”，“国民党专政在战后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社论说，现在重庆的当政者，其中某些人不能被认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

九月七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往访陈立夫，旋即赴覃振午宴。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后往访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旋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出席欧德伦大使举行的招待茶会。晚上，冯玉祥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九月八日 毛泽东在红岩嘴住地会见郭沫若、于立群，讨论了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毛泽东强调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莅会，英国援华会薛穆大使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代表及锐朴等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词，感谢各国友好对解放区和中国抗战的援助。宋庆龄、薛穆、艾德敷相继在会上讲话。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孙科招待宴会。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德安里继续商谈军队缩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代表在本次谈判结束时，向中共代表提交了对三日提

案之复案。

同日 中国劳动协会为重庆工人福利社和美工堂同时落成，举行招待会，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到会的有工业界代表，重庆总工会代表，美国援华团体代表等中外来宾一百多人。

九月十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德安里就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商谈。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设晚宴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张申府等，报告十余日来国共谈判情况。

同日 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分函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团结商谈问题提出建议。

同日 昆明各界人士李公朴、罗隆基、光未然、尚钺、章泯、潘大逵、孟超等六百二十人，为庆祝抗战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全国，提出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彻底实行民主改革，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六项主张。

九月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及叶楚傖、张厉生在德安里，就国民大会问题举行会谈。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宴请张治

中、黄炎培、沈钧儒等，就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还报告了国民党部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情况，张治中等表示愿在和谈中尽力斡旋。

九月十二日 毛泽东、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至林园官邸共进午餐，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作陪。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商谈军队缩编问题。毛泽东表示，中共愿再作让步，由原提四十八师减至二十八师，并询问蒋介石的意见，蒋笼统答复说，对中共的困难政府无不为之解决。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〇一号，就国民大会、政治会议、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及承认解放区五个问题进行商谈。

同日 重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筹备会发表《对时局庄严献言》，提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立刻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严惩工业界汉奸，切实救助工业危机，救济失业员工等十二项建议。

同日 美国纽约华侨领袖李国钦致电毛泽东，对国共谈判表示关切，热望中国实现和平团结，建设真正民主国家。

九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通知说，我们与国民党的谈判已

告一段落。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只强调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具体问题未获进展，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些时候。蒋介石表面上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招待很好，实际上在一切问题上，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们的方针，并企图压迫我就范。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赴赫尔利午宴。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向合众社、路透社的记者们阐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和平民主中国的政策原则，希望两党会谈成功。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戴季陶晚宴。

九月十四日 周恩来、王若飞及张群、邵力子应邀至特园，向民盟诸人士报告国共两党最近商谈的经过情况。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接见日本反战同盟人士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以及各方友好人士。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白崇禧举行的招待宴会。

同日 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作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和谈情况，告诉张已有一部分获得协议，目前症结仍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蒋介石正在美国大力支持下运兵，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

战。张澜建议，应将已谈一致的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承认。并提议采取由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张澜的信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发表。

九月十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在德安里与张群、邵力子就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选的推定、军队缩编数目及驻地问题举行谈判。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宴请中国青年党在渝中委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徐冰、潘梓年等出席作陪。

九月十六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于红岩嘴住地接见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服役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三个美国士兵，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并设宴招待他们。

九月十七日 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赫尔利，张群、吴国桢出席作陪。宴后，毛泽东和蒋介石、赫尔利三人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会谈。

同日 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蕴梅、章乃器、范旭东、颜跃秋等，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钱之光、许涤新等作陪。

同日 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写信给阎锡山，要阎

按《剿匪手本》秘诀，固守上党，努力剿共，消灭太岳、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十月八日，派飞机将信函和“手本”送往山西，在河南焦作被我军缴获。

九月十八日 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举行在渝参政员茶会，纪念“九一八”。到有参政员七十四人，毛泽东、周恩来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致词，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经过。

同日 毛泽东访朱家骅、陈果夫。

九月十九日 毛泽东设宴招待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德安里就军队缩编、军队驻地和解放区问题举行谈判。

九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退江南部队致电华中局，同意他们提议，将我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并谓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国民党提出，影响很好。

同日 大公报社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席间，毛泽东对该报负责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问题，发表了我党的看法。毛泽东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同日 毛泽东先后往访叶楚傖、程潜、陈立夫、贺耀组。毛泽东会见陈立夫时，对陈提出的要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武装和政权，把一切都交给国民党的荒谬意见进行了驳斥。

九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德安里继续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进行商谈。

九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在渝剧作家、导演等戏剧界人士。

同日 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青年党的蒋何田，就国内形势和政治主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同日 美国大使赫伯特·莱曼于十月五日辞职。

九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德安里继续举行谈判。

同日 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参政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及张澜、孙科、沈钧儒、蔡伯钧、廖正兴、张申府、黄炎培等。宴会上，国共双方谈判代表报告两党商谈经过情况。

九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第三次通知》。通知说，在最近的谈判中，国民党除允许我军在原承认的十二个师之上再增加几个预备师外，其他问题基本上无任何进展。三渝混

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并破坏联合公报。中间派为我抱不平，我们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通知说，国民党的方针是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利用敌、伪及美帝帮助，强迫我党接受其反动条件，否则以武力解决。但他的矛盾太多，困难很大。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在渝安全。

九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发表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指出：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声明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中共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严惩汉奸伪军，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德安里继续就军队缩编和解放区问题进行会谈。关于整编军队问题，双方同意另设一小组具体拟定整编计划。关于解放区问题，争执甚久，最后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暂维现状”方案。

九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德安里一〇三号举行第十次谈判。双方互相通报了派出参加军队整编技术小组的人员，中共方面

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接着双方就召开政治会议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谈，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各党各派领袖及社会贤达推举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三十七人。

九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王若飞往访黄炎培，商讨国是问题。

同日 成都文化界二百四十八人联名发出《对时局的呼吁》，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政渝会议，无条件保障人民自由，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严惩一切汉奸，解散伪军等六项主张。

同日 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等在重庆冉家巷集会，决定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

九月三十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宴请各方人士，并商讨政治会议组织等问题。到会的有曾琦、左舜生、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王云五、罗隆基、陈铭枢等。

同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继率国民党军侵占冀东解放区之秦皇岛、北戴河、留守营、海镇、得海镇等地，并驻北平、天津、唐山、开平、

静海等地区，为国民党守护内战战略据点，运输兵员物资。

十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目前时局的通知》。通知说，国共谈判在停顿几天之后，又继续进行。我方在谈判中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国民党是防御架势。民盟诸人批评国民党。京、沪接收，群狗争食，闹得不成样子。美军助蒋占各大城市要道，但大量使用美军打内战，可能性不大，美国舆论助我者多。国民党是外强中干，忠奸不辨，将迅速丧失人心。希望各地坚决斗争，迅速扩大与编组力量，并尽可能争取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

同日《新华日报》发表关于国共谈判答读者问。指出国共谈判所争的是民主与非民主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能否得到应有的民主权利和中国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能否保持的问题，即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之争，因此，谈判才分外困难。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和避免内战，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作了重大让步。“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是建立在它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出发点上面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建国，中国共产党就必定以极大的努力来克服谈判中的困难，去争取实现人民的愿望。文章指出国民党现在还在利用日伪军在许多地方打解放区人民的军

队，国民党的所谓“还政于民”，正是“夺政于民”，反对解放区的民主、自由。如果真正肯“还政于民”，就应该先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府，承认人民从敌人手里取得来的政治自由，同时立刻给大后方的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人身各种自由，结束一党专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给人民以普选的权利。不实行这些，什么“还政于民”，就只能是空谈或欺骗。文章最后指出：“民主自由，不是靠人恩赐，也不能靠好心肠‘还’给你，是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到会的有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重庆以及西北各地的代表四十八人。大会历时十二天，通过了民盟政纲，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张澜为主席。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会议，协商国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团结、统一，废除旧国大代表，普选产生国民大会，废止特务制度等十项主张。

十月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德安里举行谈判，商谈召开政治会议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在召开政治会议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接近；在解放区问题上，国民党只考虑承认六十余县，实际上解放区已是二百八十余县，中共代表提议将解

放区问题交政治会议解决。最后，周恩来提出，中共方面拟将一个月来的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国方代表表示赞同。

十月三日 蒋介石为了镇压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加强对云南的控制，指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以武力胁迫龙云到重庆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免去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

十月四、七日 毛泽东就关于国共和谈问题两次写信给柳亚子说，目前未到具体解决问题的时候，发表文章和谈话仍嫌过早。随函录赠名作《沁园春·咏雪》词。

十月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德安里继续就政治会议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举行会谈。

十月七日 上党解放区军民在磨盘脑、老爷岭消灭驰援长治的国民党军胡三余、彭毓斌部。八日，史泽波率部弃城而逃，我军进入长治。十一日，在桃川村全歼史部一万余人，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歼敌三万五千人，俘获国民党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高级将领多人。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桌上的斗争。

十月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

力子于上午十时举行会谈，商讨即将签署的“会谈纪要”问题。

同日 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到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党派、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五百余人。张治中和毛泽东先后发表演讲。毛泽东指出：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号召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团结一心，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十月九日 毛泽东至山洞林园出席蒋介石、宋美龄举行的午宴，周恩来、王若飞及朱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应邀作陪。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会谈。蒋介石要中共改变政策、方针，把军队和解放区交给国民党政府，为毛泽东拒绝。

十月十日 午后二时，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中国青年党曾琦，就民主同盟和青年党问题进行商谈。

同日 午后四时半，毛泽东同来访的蒋介石在桂园会晤，旋即相偕至国民政府礼堂出席中华民国国庆招待会。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内容包括：（1）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2）政治民主化；（3）国民大会；（4）人民自

由；(5)党派合法化；(6)取消特务机关；(7)释放政治犯；(8)地方自治；(9)军队国家化；(10)解放区地方政府；(11)严惩汉奸；(12)受降，共十二个问题。

【十月十日】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赴林园就解放区政权、召开政协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与蒋介石会谈。次日晨，双方再次会谈，蒋仍坚持不能承认解放区政权。

【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王若飞和张治中的陪同下由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离渝时，周恩来和邵力子、陈诚、张镇、张澜、陶行知、章伯钧、郭沫若等各党派各方面人士和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部分同志到机场送行。毛泽东在重庆机场答记者说：“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毛泽东到达延安时，在机场受到党政军民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对前来欢迎的人们发表讲话，他说：“这次谈判已得到了结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十月十二日】延安、重庆同时发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次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共会谈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两报社论一致肯定重庆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也都指出要把“纪要”上的东西变成现实，仍须全中国人民继续不懈的努力。

同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今后我党的任务与方针的指示》。指示说，毛泽东主席已回到延安，两党《会谈纪要》也在报纸上发表，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争取得到了我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并为人民争取得到许多民主权利，因此谈判是有成绩的。但是，还只是纸上的东西，我们还要不断努力。特别要注意的：(1)和平基本方针虽然奠定，但局部性冲突不可避免，不能稍有松懈。(2)解放区问题未获解决，尚有严重斗争。(3)人民军队的一枪一弹必须保存；虽然谈了按比例缩编军队，但敌人未缴械，伪军未解散，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前，还谈不上整编缩编部队。(4)为了以让步争取舆论的同情，我军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地。(5)东北问题谈判中未提出，按原计划执行。

同日 王若飞与张治中同机由延返渝。

十月十三日 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司令长官，命令遵照他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对共产党和抗日的人民军队“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有功者必得赏”，“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

十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报告了谈判的经过情况，总结了谈判斗争的经验；指出这次谈判获得的成功，和今后全党的斗争任务。告诫大家不要对蒋介石国民党抱

幻想，应和全国人民一道团结起来坚持斗争。

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江南部队(包括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各地军队)即日起撤往长江以北的苏北、皖北解放区，履行谈判诺言。

十月十九日 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业家星五聚餐会，演讲《当前经济大势》。他指出：战后工业建设，首先需要政治的安定，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是要做到和平民主两件事。中国今天不仅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国民党在经济上管制得多，统制得太过份，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蔽，今后一定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剥削经济。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所以工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接着，周恩来着重讲述了关于发展资本、税收和劳资问题，他说，我们坚决反对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和侵略资本，而主张发展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合作资本三种形式的民族资本。民族资本应在节制资本和互相配合下共求发展。关税的重心应放在保护民族工业上面，工业税原则上应该课得比较轻。中国今天的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该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的发展。

同日 重庆文化界人士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

行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柳亚子、沈钧儒、许寿裳、叶圣陶、茅盾、巴金、曹靖华、冯雪峰、胡风等五百余人到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抗战胜利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化工作者，在这大时代中，跟政治跟革命的进展是息息相关，无法分开的。他号召文化工作者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动员广大民众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奋斗。

十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和庄炎林到达重庆向南方局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对广西地下党今后的工作作了指示。钱兴、庄炎林于年底回到广西。

十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个阶段的斗争，将是决定我们今后的政治地位的关键。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友好，争取同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发动民众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救济经济恐慌和失业。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重庆德安里继续举行谈判。双方就政治协商会议之

性质、代表总数和各方应推出的代表数、会议之职权、表决方式以及由谁出面召集等五个问题进行了商谈。

同日 王若飞往访张澜商讨出席政协会议之各方代表名额问题。

十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德安里就停止进兵、重划受降区、恢复交通、解散伪军和承认解放区等问题进行谈判。

同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会议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会址举行，到会的有郭沫若、老舍、叶圣陶、巴金、傅彬然、冯雪峰、胡风、常任侠、华林等五十余人。周恩来应邀出席，向与会文艺界人士介绍了延安文艺界活动的情况。

十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重庆青年路国民参政会继续就停止进兵、恢复交通和解放区政权问题进行谈判。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指示在谈判中，必须首先解决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区和承认解放区三大问题，否则其他一切问题皆谈不到。如谈到军队缩编，又必须先谈国民党军队如何缩编。至少也是两党军队的缩编同时商谈。国民大会最早也只能在

明年双十节召开。

十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重庆德安里就停止军队前进和军事冲突问题举行会谈。

十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在重庆德安里继续就国民党停止进兵、恢复交通、避免冲突问题举行谈判。国民党方面奉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三点：（一）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二）中共军队撤退铁路线以外，其已占领区域，暂维持现状；（三）中共军事代表叶剑英应早日来渝，进行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要求以此三点电达延安。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提出了关于恢复交通、避免内战的具体方案，请中央指示。二十九日，中央复电周恩来、王若飞，同意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并指示周、王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退各地区进攻我军之部队，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民选地方自治，国民党政府不得委派人员。目前最急迫者是停止内战问题，不停止内战，一切无从谈起。

十月二十七日 中共代表就关于国共会谈恢复铁路交通问题的真象在重庆发表谈话。本日，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对外国驻渝记者发表谈话说：在二十六日的谈判中，政府“同意中共部队在让出各铁路以后，其在铁路沿线以外之驻区维持现状，惟铁路交通必须迅速恢复，使无障碍”，“双方谈判仍极融洽”。中共代表亦于本日发表谈话说：二十六日会谈中，关于中共部队让出各铁路线一议，系由政府代表提出，并非中共代表提出。谈判中，中共方面指出，要恢复铁路交通，必须停止进攻，停止进兵，停止利用敌伪，才能有济于事；政府代表同意停止进占，而不同意停止进兵。双方在进兵问题上并未得到协议这一点必须弄明，方能了解发生内战、隔断交通之症结究竟何在。

十月三十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重庆德安里举行谈判。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对国方二十六日所提出的三条之答复意见：“一、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中共方面提议：（1）停止进兵、进攻、进占；（2）停止利用敌伪；（3）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4）政府方面如须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方得拟具具体办法，否则无权解决此事。三、如万一问题不能于事先商得协议，中共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

开时必须先行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四、在回延安前须向政府方面先行问明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双方就这四项问题进行了商谈。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王若飞，指示正面告诉王世杰、邵力子；开“国大”必须慎重，不可草率决定，强制执行。我党坚决反对旧国大代表、旧宪草及速开“国大”。

同日 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会议，商讨停止内战问题。议决分函国共两党谈判代表，主张：(1)国共双方电令停止冲突；(2)组织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3)早日召开政协会议。

十月 南方局指示成立重庆地区工人运动领导小组。抗战胜利后，重庆失业工人急增，达五万五千余人，占重庆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工人生活普遍更加恶化。工人们纷起罢工、请愿，以至许多厂矿企业联合起来发表声明，进行斗争，要求安置失业者，救济饥寒交迫中的工人。根据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南方局及时指示中共重庆市委成立了工人运动领导小组，市委书记王璞(孙仁)任组长。任务是以反内战、反独裁为中心，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十一月一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就避免冲突、恢复交通问题进行谈判。国民党代表将拟定的对我在三十日谈判中提出的四项提案的复案交付我党。该提案主要内容是：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各驻守原地，不得对他方进攻；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干线千里以外；国民参政会组织交通考察团会同当地公正人士赴各铁路线考察；中央军队如在平绥、同蒲、正太、胶济、平汉北段、津浦北段各铁路有运输之必要时，共同协商定之；双方应在一月内商定对中共军队驻地及其整编等根本办法，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六项。双方围绕这六项进行了一般商谈。

十一月二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谈判避免冲突与恢复交通问题。这次谈判对停止军事行动问题，拟出了具体办法，商定在分别请示自己中央后再谈。三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王若飞说：我方对傅作义、阎锡山军队发动自卫反攻，具有充分理由，如他们诬我发动内战，我将发表蒋介石酉皓致胡宗南电及其他各项内战文件。国大代表必须重选，会期必须推迟一年以后，否则我方坚决反对。政治会议问题，由你们商定初稿，待恩来回来讨论后再定。平、津、青三市应驻我军。

十一月三日 王若飞往访黄炎培，表示中共接受黄等关于派调查团调查军事冲突之建议。

十一月四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重庆对西北军及其他一些国军展开工作，促使他们不参加内战，以牵制与打击蒋介石的反共计划。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广东林平、李碧山、魏金水、朱蔓平转发方方关于闽粤赣边区工作的意见。方方意见是：（一）目前形势决定闽粤赣边区不是集中大搞，而是分散的发展时期，因此不必成立庞大的领导机构，宜暂时成立闽粤赣边区临委，采取正副特派员制度，以魏金水为正特派员、朱蔓平为副特派员。另再民主推出一人为副特派员，与魏、朱三人组成临委。二、在有安全保证条件下，可召开一次临委会，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讨论今后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三、潮汕及梅属地区可划成二个工作单位，暂由广东区党委领导。

同日 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办法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次日，中共中央电复周恩来、王若飞指示说，邯郸战役获得大批文件，证明国民党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指示在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

十一月五日 中国农业协进社、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世界科学社、农村科学

出版社、寰球出版社六团体发出紧急呼吁：我们不能再有内战，敌伪武装应立即解除以绝挑拨，我国境内盟军也应及时撤退。七日，中国妇女联谊会呼吁妇女界和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反对内战，提出了严惩内战祸首等四项主张。八日，《民主周刊》、《东方杂志》、《中苏文化》等二十七大大杂志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不要内战。十日，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紧急呼吁：内战祸害国家，违反人民公意，应即停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治争端，拟订和平建国纲领，以资信守。

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和谈判问题致电周恩来、王若飞说：目前的两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他们的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你们提的意见很对，我们的宣传是应当采取哀兵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目前谈判的方针是，在不束缚手足的条件下，可以保留伸缩余地。

十一月八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为有效的停止内战，应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先下令所属部队，实行下列四事：（1）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2）从进占区全部撤退；（3）从八条铁路线撤退；（4）取消各地‘剿

匪’命令，保证以后再不进攻各解放区。”国民党代表以我党所提四点对他们在本月一日提出的六项，“未予明确之答复，无从商谈”，使谈判僵持。

同日 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得迈在上海发表谈话，声称在华北之美军“可能向共产党军队前进”。十一月十一日，美国军舰三十一艘运送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

十一月九日 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致电《新华日报》说，美共于本日举行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示威。《新华日报》即日复电，对美共《工人日报》表示致敬，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十一月十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王世杰继续举行谈判。

十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我党决不能同意国民党运兵东北。运兵即是内战。

同日 国共双方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邀请民主同盟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鲜特生、周鲸文在特园举行会议，商谈政协会议和国民大会召开的时间及停止军事冲突问题。

十一月十二日 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发布将于明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

十一月十三日 重庆复旦大学等三十多个文教单位强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二十七日，重庆各大学学生联合致书美国政府，呼吁美军退出中国，阻止美国政府资助国民党加剧内战。十二月二日，中央大学等五院校学生，发表三项制止内战主张。

十一月十五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在重庆德安里就避免内战、解放区政权、敌伪受降、国民大会、政治协商会及外交等问题举行会谈。

十一月十六日 重庆中共发言人对《新华日报》发表评论，驳斥赫尔利发表的谈话。日前赫尔利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发表谈话说，如果日本向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投降或缴械，定将造成中国内战之延长。中共发言人指出，赫尔利这个谈话“极不公正”，且又“与事实完全不符”，他在今天发表这样的谈话，完全是“为了扩大和延长中国的内战”。

十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在重庆德安里谈判东北问题等。

十一月十九日 重庆各界人士五百余人集会，成立“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郭沫若、陶行知、黄炎培等在会上发表反内战讲话。会议制定了章程，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包

括以罢工罢课罢市、拒绝纳税等来制止内战；号召国民党官兵拒绝内战。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

十一月二十三日 马来亚华侨团体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

十一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由重庆飞抵延安。

十一月二十六日 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代表董必武偕章汉夫回到重庆。

十一月二十八日 朱德总司令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执行诺言，不干涉中国内政。

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电董必武、王若飞，指示向国民党提出再开谈判之门，并开政治协商会议。由董必武找王世杰、邵力子商谈，并提廖承志为我党代表，叶挺为无党派代表，要求国民党先释放他们，以避免争论。如彼同意先放人，又要求不为代表，我方可以同意。

同日 昆明市发生“一二·一”惨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响应党中央“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通过昆明市地下党组织及外围组织推动各校联合举行反内战座谈会。十一月二十五日，西南联大、云大、英专、中法四大学和昆华、天祥、南菁、五华、联大附中等中学及部分职业青年约六千余

人，以联大学生自治会名义举行反内战晚会，请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潘大逵等教授讲演。国民党派军队包围会场，放枪恫吓，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二十六日，各校学生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决定全市学生总罢课，以示抗议，至二十九日，参加罢课的已有三十四所大中学校。十二月一日，国民党派出大批军警特务至各校镇压罢课学生，打死南菁中学教员共产党员于再、西南联大学生共产党员潘琰、西南联大学生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四人，重伤二十五人，轻伤百余人，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在党的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重庆、成都分别举行了几千人的大会，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声讨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屠杀爱国师生的罪行。董必武、王若飞出席了重庆的追悼会。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师生及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暴行，通电要求追查祸首，公葬烈士，赔偿损失，保障人权，停止内战，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本月九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和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大会发表演讲说：我们正处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五四”青年运动未完

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昆明青年学生表示强烈抗议。十五日，毛泽东指示全党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情者，扩大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十二月二日 周恩来关于争取西北军工作问题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转告他们重庆所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请参照办理。

十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策略问题致电董必武、王若飞。指示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之前，不要明确答复国民党提出的问题。

十二月九日 中共中央就关于目前形势及国共谈判问题致电董必武、王若飞。指示四点：甲、局势并非对我不利，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赫尔利在中国的政策已经失败，马歇尔来华后，美国的扶蒋反共方法可能改变。我们应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乙、我党政协代表除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外，加派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丙、党中央正在准备施政纲领和宪法草案。丁、请告民盟我主张通过民主途径解决问题，要他们也在纲领、

联合政府、国大及宪草方面做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由延安飞重庆。同机抵达的有中共代表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及工作人员李澄之(山东大学校长)、何思敬(延安大学法学系主任)、齐燕铭(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王世英(十八集团军总部副参谋长)、沈其震(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常委委员)等三十余人。叶剑英在重庆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如何停止军事冲突,是迫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抱着和平的希望,希望双方先停战。军事三人小组的成立及开会商讨军队整编的事,要看政治洽谈情况来定。

同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抗战期间,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受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排斥和吞并。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垄断加剧,美货充斥市场,加之恶性通货膨胀,使民族工商业处在崩溃的境地,无法维持下去。为了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与发展,民族工商业者深感有建立组织,加强团结,以争取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和“迁川工厂联合会”的部份成员发起,酝酿成立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者及其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政治团体。八月二十一日,由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黄墨

涵、施复亮等发起筹备，本日，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推举胡厥文、黄炎培、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等十一人为常务理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并决定创办《平民周刊》。该会从筹备到正式成立，都得到南方局的支持。

同日 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至本月二十七日结束，发表了中国问题公报。三国协议，要求停止中国内争，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新中国，重申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两国军队尽快撤离中国。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美、英、苏三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发表谈话说，该协议是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的。

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等分访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张澜等。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社论指出：根据《国共会谈纪要》规定，政协的使命是“邀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的各项问题”。既然“国是”有待

各党派与社会贤达“协商”，那么现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必然有“不是”之处，是无庸置辩的。而“其中最大的‘不是’就是进行内战与固执独裁。”因此，政协的“最大使命也就是要找出一条把‘不是’变为‘是’，即把内战与独裁变为和平与民主的可行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邓颖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叶剑英先后发表谈话，说明中共代表团此次到渝的任务，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此次来渝的任务，一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为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当前首先急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只有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因此，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件事即是停止内战。第二件事是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中共对这些都有具体意见。同时，我们还将就国民大会的代表改选、会期、宪法、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等问题，向政协会议提出我党的主张。叶剑英说，目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战或和的问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主张和平，主张商谈解决问题的。可是事实上内战在扩大着，已影响及国内生活、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这需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共同努力，

才能制止内战，实现和平。

十二月十九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宴请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席间，双方就召开政协及停战问题进行了商谈。邵力子谓中共军队必须先撤离铁路线，始谈其他。周恩来等则提出双方无条件停战，迅速召开政协会议，一切问题在政协会议中商谈。周恩来说：我党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迅速开幕，并望在政协开会前，立即停止内战，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都可以在战争停止后用商谈方法求得解决。中共希望双方不提任何停战前提条件，以求得立即停战，如能做到这点，就可以使全国人民不失去对和平解决争端的希望和信心。要求邵将此意见转陈蒋介石，并使张群、王世杰尽速返渝，以便国共谈判重新继续进行。

同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五代表往晤青年党代表曾琦，对有关政协会议各项问题初步交换意见。中国民主同盟张澜、张东荪、梁漱溟、蒋匀田往访我党参加政协代表，双方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十二月中旬 中共中央南方局改名为中共中央重庆局，仍由周恩来任书记。重庆局的任务和管辖地区与南方局时期基本相同。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代表团全体代表及随员应邀出席邵力子、雷震举行的招待会，江庸、黄炎培、李璜、褚辅成、王云五、左舜生等亦应邀到会。

十二月二十二日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抵达重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访晤马歇尔。

同日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简称“经协”）成立。在我党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后，经济界的进步人士亦纷纷起来公开表示拥护我党主张。南方局经济组认为这是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团结经济界进步分子的很好时机，于是在本年的夏天向南方局提出了把国统区的经济机关、企业中的上中层人员、工商界人士、经济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设想。这个意见，立即得到董必武、王若飞的批准。遂于七、八月间酝酿成立了筹备会，由许涤新、沙千里、罗叔章、杨修范、陈希、王寅生组成核心小组。九月十三日，“经协”筹备会发表《对时局庄严献言》，提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立刻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严惩工业界汉奸，切实救助工业危机，救济失业员工等十二项建议。十月二十四日，以筹备会名义提出了经济民主九条主张。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经

济实业协进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了成立大会，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沈钧儒、马寅初、梁漱溟、胡厥文等应邀出席。会议通过了章程，推选阎宝航为理事长，沙千里、杨修范、林大琪、罗叔章、胡子婴、王寅生、耿一民为理事。并通过了《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次年三月底，又提出了《对于当前几个经济问题的意见》。一九四六年初，由于主要负责人转移京、沪，二月十八日在重庆成立了四川分会，由阎宝航、彭友今、洪沛然负责。分会的中心工作是反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并参加民主运动，支持中小工业。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于政局更加恶化，四川分会停止工作。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在代表团驻地招待文化界人士。

十二月二十五日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往访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商谈恢复谈判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就全面停止内战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谈。周恩来说，在一周之前，我方已向邵力子提出过双方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并托邵转蒋介石，兹再提出三项具体办法。即：（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

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和平协商解决；（三）在政协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发生战争区域实地考察，并将事实真相公布之。并提出政协会议最好能在明年元旦开幕，一般会议，应允许记者旁听。此外，还要求恢复被国民党查封的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国民党方面答应将这些意见向蒋报告，待指示之后再续谈。

同日 马歇尔宴请周恩来，双方就政协会议和东北问题等进行了会谈。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代表团在曾家岩五十号设午宴宴请民盟政协代表及在渝民盟中央常委，交换对政协之意见。

同日 中国妇女联谊会举行同乐晚会，并欢迎出席政协会议的唯一女代表邓颖超。邓颖超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经过及这个会议的性质讲演，并介绍了延安及解放区妇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共代表就继续举行国共会谈问题催问国民党代表。张群向周恩来表示，因二十七日的会谈内容报告蒋介石后尚未得到蒋的指示，故谈判暂时不能继续进行。

同日 中共代表团分别宴请救国会方面的沈钧儒、陶行知、邓初民、李公朴、史良及第三方面的章伯钧等，就政协会议的问题交换意见。

同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中国科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马叙伦、严景跃、陈已生、林汉达、郑振铎、王绍鏊、周建人等十一人为理事。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

十二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函复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重申中共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主张，表示完全同意于明岁元旦国共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但我方关于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及一切问题经由和平协商解决之提议，迄今未见国民党的具体答复。现正催促当局，速求实现。

同日 国民党代表复函中共代表团，对我二十七日的无条件停止内战提议表示原则上赞成。同时提出由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施政办法，提请政府实施。同意中共关于组织军事考察团的意见，但主张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推定人选。

同日 蒋介石宣布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庆召集政治协商会议，会期十四天。

一九四六年

一月一日 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新华日报》公布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党交付国民党的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提议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的复文。

同日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停止中国内战等问题。

同日 农业协进社招待出席政协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了会议，并就农民问题作了发言。

一月二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时局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同时恢复交通。但一切军队，应各驻原地，不能利用铁道，调动军队”。“关于国民大会，我们与蒋主席意见恕不相同。我们主张重订国民大会之组织法与选举法，成立真正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而蒋主张保留十年前之代表，另外增点名额，这“根本与民主精神不相符合，此实开玩弄法制之恶例”。开放政权，改组政府，“应由协商会议共同协定，不能由一党以延揽方式出之”，并且应从中央到地方同时实行。赞成军队统一于国家，但必须与政治民主化并行之”。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林平、曾生，指示广东关于坚持原地斗争的原则。电报说，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表明，他们商定中国必须是团结民主的国家，对中国停止内战亦有一致意见。电报告诉他们：周恩来同志等在重庆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获得国内外广大同情，和平局势大体可定，但“达到和平还会有曲折，还须经过严重的斗争，国民党必然想再进行军事上对我更大的压力，夺占我一些重要阵地之后来实现有利于他的和平局面。在粤闽两省之内，我们已经有了力量，但还必须坚持一个时期的很艰苦的斗争。你们目前处境相当困难，我们已告重庆在与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问题时，包括广东琼崖等地停止军事进攻”。电报同意林平提出的在江南各地区留下精干武工队，坚持斗争，主力则向惠紫突围的建议。

一月三日 国共双方代表继续商谈停止军事冲突问题。中共代表团原则上同意国民党复文中提出的三项办法；希望马上全面停战，尤其对热河的军事进攻应迅即停止。建议全面恢复交通（包括邮电、航空在内）和撤出封锁线，军事考察团的成员应包括各界人士。

一月四日 国共双方代表继续商谈停止内战问题。

同日 东北政治建设协进会举行茶会，招待政治

协商会议代表，交换对目前国是和东北问题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出席。周恩来在会上说，东北问题要和全国问题联系起来看，东北急待有一和平局面，全国迫切要求停止内战。

一月五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对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其要点为：（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二）国共两党各派出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迅即商定实施办法；（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协会议各推出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成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至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之事项。本“协定”于一月十日随停战命令和声明之发表同时公布。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指示三点：（一）国民党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国共问题，限制政协的职权及开会时间，我们必须坚持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国共问题，这将成为我们及其他党派与国民党斗争的第一个问题，望你们对此点加以注意。（二）现在是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以后，全国停战问题也基本获得协议，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

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问题，那这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对政协应作解决一些问题的准备。(三)如果政协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

同日 周恩来与马歇尔举行会谈。

同日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致函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我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七人。另外，还有顾问八人，即是李澄之、何思敬、王世英、沈其震、许涤新、张友渔、华岗、王炳南。

同日 重庆文化界在重庆江苏同乡会馆举行纪念人民歌手冼星海演奏会。到有周恩来、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及中外人士一千几百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人民急迫的需要生活的权利，需要和平民主。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和民主权利，为中国的和平而奋斗。

同日 中共代表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应邀出席中国青年党政协代表曾琦、陈启天等五人举行的招待会，双方就政协会议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

同日 中共代表团宴请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胡政之、王云五、郭沫若、傅斯年、李烛尘、缪云台、钱新之

等。

同日 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一月六日 中共代表团成员应邀先后出席冯玉祥、孙科举行的招待会，与冯、孙二人就时局若干问题分别交换了意见。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七条和各方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员名单。全部会员共三十八人，分配情况是：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燕生；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勱、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九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并宣布政协会议秘书处组成，由国民党雷震任秘书长，共产党齐燕铭、民盟蒋匀田、青年党肖智僧任秘书。

一月七日 商定停战和恢复交通等实施办法的三人会议举行首次商谈。根据国共双方代表五日协议，中共方面派出周恩来会同国民党张群及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当日，马、张、周三人在马歇尔寓所怡园就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和遣俘等问题，

初步交换了意见。

同日 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新年鸡尾酒会，招待中外各界人士。到会的有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官，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各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友人、中外新闻工作者共五百余人。周恩来等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同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会议室举行全体茶话会，交换关于会议各项问题的意见。政协会议秘书长雷震报告了秘书处筹备的经过，宣布了会议召开的日期；各方面代表就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中共代表周恩来、陆定一在会上发了言。周恩来对政协议程提出了意见，并说明中共方面决定撤回关于解放区问题原案，将这个问题列入《和平建国方案》中去解决。关于停止内战问题，他希望能在两三天内就发表停止内战的命令，以使政协能在和平空气中开幕，并请政协会议考虑“永久消弭内战危机的办法”。陆定一还表示赞同黄炎培关于在会议期间，各党派在宣传上“应尽量友谊”的提议，并希望中央社能将会议上各代表的发言和主张全部如实的广播出去。

一月八日 周恩来与张群、马歇尔两度举行谈判，除国民党在当日新提出的若干问题尚待进一步商谈外，大部分商得一致。

同日 中共代表吴玉章、邓颖超招待重庆各界妇女代表，交换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同日 中共代表团在渝招待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的宁萝岩、阎宝航、宁恩承、王回波、周鲸文、徐寿轩、徐仲航、周维鲁、刘东轩、卢乃庸等，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同日 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各方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出席。民建诸人一致主张政协开会前内战要停止，人民的基本自由必须迅速获得。

一月九日 中共中央电中共代表团，指示向美方提出，要求美国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和华北。

同日 上午十一时许，周恩来往访马歇尔，就美国停止帮助国民党运兵和在中国停止一切军事冲突问题进行了商谈。

同日 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继续举行。会谈中，本已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的命令及监督停战的执行机构之组织等获得一致，并拟就文件只待签发。这时，张群突然提出要“接收”八路军从日伪手中解放出来的赤峰、多伦等地，致使停战问题又有拖延不决之危险。周恩来即提出，首先将已获协议之停战命令公布，争论之点留待以后解决，以使政治协商会议能在和谐空气中开幕。然此一解决问题之新议，又为张

群拒绝，以至全盘协议无法达成。晚上，马歇尔与蒋介石会商，蒋表示可赞成周恩来之意见，撤回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午夜，马歇尔电话通知周恩来、张群，次日的三人会议提早举行。

同日 中国妇女联谊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会，招待出席政协的各方面代表。中共代表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出席。邓颖超发表讲话说，我们中国妇女是要管国事做主人的，无论那一党那一派要想实现民主政治的话，就必须注意多数受压迫的妇女，也只有广大的被压迫的妇女站起来了，真正的民主国家才能实现，如果妇女没有能站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我愿把大家的意见反映到政协会议中去，因为这是代表着人民的意见。她勉励妇女姊妹们团结起来共同为争取妇女的权利和建设一个民主的国家而坚持奋斗。叶剑英在会上指出：实现民主，还要靠大家长期坚持争取，因为统治者的作风是难改变的。郭沫若、张申府、罗隆基、陈启天、杨叔明、李德全、史良、曹孟君等先后发言。

同日 重庆文化艺术界、出版界七团体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协代表。吴玉章、陆定一、冯玉祥、邵力子、沈钧儒、郭沫若、陶行知、茅盾等五百余人赴会。文化界郭沫若、洪深、邓初民、曹靖

华等在会上陈述了所受的迫害和痛苦，强烈要求民主与自由，指出种种黑暗压迫不解除，“中国将变成沙漠”。吴玉章在讲话中指出：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要靠全国人民的努力，靠文化界的努力，大家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文化界对国家民族所尽的责任，是极光荣的，文化界过去领导过许多伟大的运动，今天文化界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的呼声。他表示将把文化界的意见反映到政协会议中去。

一月十日 上午八至十时，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举行第六次会谈，终获协议。签定了四个文件：（一）停止军事冲突的命令草稿；（二）了解事项；（三）在北平设军事调处执行部；（四）国共双方共同声明（前两项为国共美三方代表共同签字的，后两项系国共两方代表签字的）。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要求中共各级委员会，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和各级政府“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并号召“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蒋介石亦于当日电令国民党各军政长官“恪切遵行”上述协定，但他同时又密令国民党军队利用宽限时间，拼命猛攻，抢占战略要地。因此，停战命令虽有

一月十三日午夜全国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之规定；国民党军队还是打到十六日才基本上停止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当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有中外记者三十余人。周恩来向记者们报告了停战命令发布的情况，并答复了记者们提出的十个问题。周恩来指出，这次国共双方公开发表停战命令，是历史上未有的事情，这一重大成功，主要归功于全中国人民的要求和督促。

同日 上午十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开幕，各方代表三十六人出席。蒋介石首致开会词，许下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周恩来接着致词说，中国目前现况之不满人意，是毋庸讳言的，虽然在今天国共双方下令停战了，但这还不够，还“应痛下决心”，“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实行和平建国的方针，使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化，而在当前的过渡时期中，首先是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政府。只有有了这样的和平团结的局面，民主统一的基础，中国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普选和实施民主宪政，也才能有真正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建设。他表示中共代表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

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他欢迎蒋介石刚才宣布的四项决定，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一月十一日 国共双方代表张群和周恩来相继在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报告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商谈经过。周恩来的报告在阐述了谈判的三点经验及停战如何进行后，又提出了消弭内战的五点意见：(1)国内问题应由政治解决，不可演成军事冲突。(2)军事考察团应由公正人士组成。(3)敌军投降后，仍残杀我国军民的，应以战犯论罪。(4)伪军参加内战、挑拨内战者，应予严惩。(5)政协会议有必要商讨整军问题。

同日 民主建国会、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中国人民建国会(前“救国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组织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次日起改称“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即日开始工作。每日举行大会一次，分请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向重庆各界群众报告政协会议进展情况，借以表达民意。

同日 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已生、刘大杰、沙千里、唐韬、赵朴初、周建人等四十二人，代表上海的一部分文化界、金融界、工商界、牧师、教授及社会服务者致书马歇尔，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全民的民主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一切人民基本

自由有保障，各党派都有合法地位，首先应扫除由特务所引起的恐怖。

一月十二日 周恩来和邵力子在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报告关于国共会谈的经过。周恩来讲述了抗战以前及胜利以后两个时期的谈判经过，指出两党已多年对立，要求得一协议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应从以往的痛苦经验中求得教训，共同做到：（一）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二）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三）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同日 政协第三次会议，对张群、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商谈经过的报告通过一项决议。决议说，国共双方“以最大决心，相忍相让，使军事冲突由此终止，和平由此奠基，深感欣慰。尤盼继此协定，对于永久消弭军事冲突之方策，迅速实施。”

同日 政协五方面代表陈立夫、董必武、梁漱溟、王云五、陈启天等协商，推出何基鸿、林可玘、王葆楨、章元善、李德全、周炳琳、杜斌丞、陆观基八人为军事调查团团员，冷遹、林虎、张奚若、任鸿隽四人为候补团员。

同日 中共代表团全体代表应邀出席张治中在桂

园寓所举行的欢迎宴会，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到会作陪。

一月十三日 政协会议五人程序小组商定政协会议的主要议程。政协开幕后，代表们对会议的议程和会期问题争论热烈，意见较多。十二日，中共代表陆定一提议，由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中推举出五人组成程序小组单独会议商决，到会代表一致推出陈立夫、董必武、梁漱溟、王云五、陈启天五人组成。

同日 中共代表团在其驻地举行全体政协代表、顾问人员会议，研讨了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问题。

同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叶剑英（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郑介民（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罗伯逊（美国驻华代办）偕随员一行十五人由重庆飞抵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

一月十四日 政协举行第四次会议，主要议题为中央政府机构之改组与扩大问题，涉及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与地方政权等问题。王世杰代表国民党代表团提出《关于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曾琦代表青年党代表团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董必武代表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关于改组政府的八项主张》。

中共关于改组政府的提案要点为：（1）要有一个包括人民自由权利等问题的共同纲领；（2）政府委员会是

政府的最高决策机关，要有权决定政府的人选；(3)政府主要职员数目大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4)政府委员人选应由政治协商会议协商产生；(5)手令制必须防止；(6)为便于召开会议和进行工作，政府委员会可产生少数人组成常委会；(7)政府改组应包括各院部会；(8)政府改组后，应明文规定党的费用开支不得由国库付出。周恩来就人民自由权利问题作了发言，要求政府全部实现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许下的四项诺言，立即释放为团结抗日、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功绩的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政治犯。

一月十五日 政协举行五次会议，讨论共同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代表吴铁城提出，这个纲领应仿“抗战建国纲领”拟定，青年党代表常燕生表示赞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在会上系统地报告了中共对共同施政纲领的意见，提出确立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保障人民权利，取消一党专政，改革军事、财经和文教制度等十项主张。董必武说，这些即是我党将提交会议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基本精神。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均赞成共同纲领用“和平建国纲领”的名称，并以此为基础，不同意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主张在广泛征求人民意见之基础上，参考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纲领进行起草，驳斥了吴铁城关

于政协会议没有法律根据的谬论，指出：“能够适应人民的要求，就是法的根据”。

同日 政协会议公布代表的分组情况及各组的召集人名单。全部代表共分五个组：（一）改组政府组：王世杰、陈立夫、王若飞、陆定一、曾琦、余家菊、罗隆基、沈钧儒、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二）施政纲领组：陈布雷、张厉生、董必武、王若飞、常乃惠、杨永浚、张申府、黄炎培、李烛尘、郭沫若、傅斯年，召集人董必武、张厉生。（三）国民大会组：吴铁城、张厉生、董必武、邓颖超、曾琦、余家菊、章伯钧、梁漱溟、邵从恩、钱永铭，召集人曾琦、邓颖超。（四）军事组：张群、邵力子、周恩来、陆定一、陈启天、杨永浚、张东荪、梁漱溟、缪嘉铭、胡霖，召集人胡霖、张东荪。（五）宪法草案组：孙科、邵力子、吴玉章、周恩来、陈启天、常乃惠、罗隆基、章伯钧、傅斯年、郭沫若，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

同日 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一号新闻公告。公告说，为制止各地仍在发生之局部军事冲突，军调处执行部决定从即日起派出美国海军陆战队飞机飞赴各冲突地区散发停战令，并将于最近派遣停战小组往各冲突区域，实地调查情形。

同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为

军队整编问题在桂园举行会谈。

同日 冯玉祥写信给蒋介石，要求颁布大赦令，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和普通犯罪人民。

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指示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斗争方针。指示说，政府改组，各方委员应有一定比例，国民党不得高于三分之一；军队国家化，首先要国民党军队作到。

同日 中共代表团宴请张治中、雷震及国民党政协代表团，就政协会议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商谈。

同日 中共代表团向政协会议正式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该草案由总则、人民权利、中央机构、国民大会、地方自治、军事改革、复员善后、财政经济改革、文化教育改革及国际和平和保护侨民等十条四十八款组成，全面反映了我党对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主张。

同日 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六次大会，讨论军事问题。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提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党派，归属国家，现役军人脱离党籍，大量裁减常备兵额。青年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主张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但陈启天在对此案说明时，却说什么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非先军队国家

化不可”，改变了提案原意。会上，国民党代表张群报告有关军事三人会议的情况，国民党军政部次长林蔚报告整军计划和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继之作“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提出中共关于军事改革的十二项建议。他说：我们非常赞成所有的军队国家化，但对于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必须有共同明确的认识，即不仅要两者同时平行的进行，而且还要认识过去的政治历史情况，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迫而拿起武器来的。强调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标准是军队属于整个国家也属于中国人民，军队不应该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不同意陈启天对青年党提案所作的口头解释，他说，如果以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那末，今天的协商问题，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平心静气来商讨，以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目的。周恩来的发言还批判了国民党军队教育中流行的“军人第一”的错误观念。邵力子即起辩护，又受到中共代表陆定一的驳斥。陆定一指出：“决不能使军人站在老百姓头上”，用“军人第一”并不能真正提高军人的地位，军人只有愈爱护人民，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和爱护。并且指出，把政治民主化放在军队国家化之后的主张是很危险的办法，要军队国家化，必须

尽快政治民主化，特别希望蒋介石宣布的给人民的四项权利，能立即实施。

同日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协进会，在沧白堂举行第四次会议，由政协代表张东荪、郭沫若介绍政协会议情况，到会群众千余人。国民党特务起轰捣乱，使会议中断。以后四天的群众会议上，先后由政协代表曾琦（李璜代）、邵力子、王若飞、梁漱溟作讲演，均遭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以致打伤听众，引起各方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愤怒和抗议。

一月十七日 政协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国民大会之意见》，坚持十年前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旧代表仍然有效，受到中共、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中共代表邓颖超、吴玉章在会上先后发言指出，坚持旧代表有效，是不顾事实，将剥夺许多人民的权利，有失人民信任。主张由协商重新制定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并依据新选举法普选国大代表。

一月十八日 政协举行第八次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大会问题。罗隆基首先发言，他重申民盟的主张，国大代表必须重选。周恩来接着发言，对邵力子歪曲引用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对王世杰说的“中共坚持旧代表无效，惟不会因得不到协议而不出席”一段话作

了驳斥和正确解释。他说，既然要协商，要政治解决国是问题，就应大家坐下来本着和谐的态度，彼此把意见提出来，供会内外人士批评，也就要互相容忍妥协。但是，妥协、容忍、和谐不在徒求形式，而在实际解决问题。比如改组政府，我们就不是注意要几个国府委员的位置，而在实际解决问题。特别要重视有一确定的共同纲领。对于旧的国大代表，因为它是在十年前国民党一党统治下产生的，我们不能承认，但如果一切其他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一个问题而与政府分裂。如果别的问题不解决，又坚持要中共在代表问题上作妥协，我们将无以向人民交代。我们的妥协和忍让是有原则的。陈立夫继之发言，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辩护，认为中国只能实行一党制，旧代表的产生是民主的。陆定一列举国内外大量事实驳斥陈立夫的所谓中国只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谬论，并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要能办好，只应实行多党合作。”

同日 周恩来与张群、马歇尔会商迅速停止军事冲突问题。

同日 九三学社筹备会致书政协会议，提出开放政权，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切实执行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等十项意见。

一月十九日 政协举行第九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问题。孙科首先对《五五宪草》逐条加以说明，黄炎培、张申府先后发言，提出《五五宪草》必须修改，反对宪草中总统权力过大，提出对人民自由应有积极保障。沈钧儒主张采取地方分权制，承认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并首先在这些区域试行地方分权制。吴玉章代表中共代表团提出四项原则意见，强调宪法应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应限制人民的权利，采取中央与地方均权，总统的权力应受约束，不能过大；省为自治单位，选省长，制定省宪；明白规定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民主政策。

同日 重庆文化艺术界纷纷联名致书政协会议要求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废止文化统制政策，保障文化工作者应有各项基本自由，确定民主的文化政策。

同日 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筹备组向政协会议提出书面申诉，呼吁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坚持反对垄断的官僚买办性的经济，提出十五项要求。

一月二十日 重庆各界在沧白堂举行庆祝实现国内停战的和平大会，到会者二千余人。李德全、冯玉祥、陈铭枢、王若飞、郭沫若、李公朴、刘清扬、罗隆基等相继发言，一致指出，中国必须实行和平建国，

政府应即实现四项诺言，释放一切政治犯，解散一切特务机关，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一月二十一日 军调处执行部发表第二号公报，命令冲突区内之国共双方军队，一律停止开火，各自后撤至少六十华里，恢复到十三日午夜前的状况。

同日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选出军事考察团，团员为林虎、范予遂、武肇煦、周谦冲、许德珩、苏廷、冷遹、罗衡八人，候补团员为江庸、郑振文、褚辅成、王普涵、梁实秋、但懋辛六人。

同日 李济深对记者发表谈话说：“须先政治民主化、而后军队国家化，方符合民主的要求”，假如能彻底实现民主，军队国家化就不难解决。并希望蒋介石关于民主的四项诺言“立即付诸实施”。

一月二十二日 政协各组在许多基本原则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无法获得一致协议，会期延长三天。三天之后，仍不能获得协议，又再次推迟闭幕时间。

同日 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廖承志获释出狱，是为抗战胜利后政治犯获得自由之第一人。

一月二十三日 政协会议成立综合委员会。为使各项议案经各方代表充分协商，达成协议，由国民党、

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五方面代表各派二人组成综合委员会。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吴铁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民主同盟代表章伯钧、张东荪，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曾琦，无党派人士代表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孙科。

同日 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的招待会，政协代表三十五人到会。

一月二十四日 重庆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成立。为促进政协成功及其决议的实现，重庆文化界在育才学校城内分校(管家巷二十八号)举行文化界政协协进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七十余人。

同日 昆明教育学术文化界、华中文化界、香港十二报刊分别致函政治协商会议，要求政府实践四项诺言，停止军事冲突，改组政府。

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指示可以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中占二分之一的名额。

同日 重庆市沙磁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校、中大附中、重庆中学、蜀都中学、四川教育学院、国立艺专、育才学校、国立商业职业学校等院校，为促成政协会议成功，举行示威游行。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各大学教授马寅初、金善宝、楼光来、张永贵、李旭旦、

蒋孟行、唐培经等一百余人及各校学生一万多人参加。“新青社”根据重庆局的指示秘密领导与组织了这次运动。游行队伍至国民政府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七项国是主张：（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党派私见；（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三）国民大会代表必须合理产生；（四）严格执行停战命令；（五）实践四项诺言；（六）党派一律退出学校；（七）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成功以前，不许闭幕。政协代表孙科、周恩来、陈启天、张君勱、邵力子、莫德惠接待了游行师生，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学生们提出的七项要求，并愿意和大家一起为此而奋斗。他说：政协会议开头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停战。不过，要使内战完全停止，内战永绝，还要靠大家来努力监督，还必须做到的是使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合法化。最后，他讲到：“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学生是人民的先锋，你们的呼声就是人民的呼声”，“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这次群众活动，由于重庆局青年组的正确引导，学校党的组织和进步青年较好的运用了斗争策略，因此取得了成功。

同日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到达广州，调停广东地区内战和解决广东中共部队北撤问题。该组中共方面代表方方少将，美方代表米勒上校，国民党代

表为黄维勤少校(后为罗晋淳接替)。执行部第八小组到达广州后，广东国民党军事当局拒绝调停。二月五日，国民党军委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拒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称广东没有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存在，只有零星“土匪”，广东只有“剿匪”，不存在执行停战令的问题，阻挠谈判，并调集十七个师的兵力进攻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张发奎这一横蛮行径，引起中共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领导下的闽粤地区武装部队坚决实行自卫还击。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又与马歇尔、张治中进行了反复谈判，并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这一罪行。经过一系列斗争，军事三人小组签订了北撤协定：(一)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同意北撤二千四百人，不撤退的复员，发给复员证，并保证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三)北撤军队由美国派船只运送至陇海路以北。三月三十日，军事三人小组派出的由美国代表柯埃、国民党代表皮宗石、中共代表廖承志组成的三人会议代表团，偕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由重庆飞抵广州，执行军事三人小组关于广东问题的协定，会同军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与国民党广东当局谈判中共广东部队北撤问

题。四月四日起双方开始谈判，中共参加谈判的代表为廖承志、方方、曾生、尹林平。经过约五十天的谈判，于五月二十一日达成了广东中共武装人员（不包括海南地区）北撤山东的具体协议。五月三十日，东江纵队二千五百八十三人在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率领下撤离广东，七月五日到达山东烟台解放区。

同日，中国妇女联谊会发表对当前政治的五项意见。

一月二十六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提出了政府应即实行双十纪要及在政协会议上许下的四项诺言等六项主张。

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代表周恩来、陆定一返延安向党中央报告与商讨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问题，三十日回到重庆。

同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请政协代表张厉生、吴铁城、郭沫若、王若飞及中共代表团顾问李澄之报告，与会听众三千余人。王若飞首先报告了政协会议各组讨论的经过及已获之部分协议情况，他说，在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一些基本问题上，已商得许多共同意见，将可能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但在保证人民基本权利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至今还未得到政府的答复，并且在昨天又发生了非法搜

查政协代表黄炎培、张申府住宅的事情，希望迅速兑现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诺言。李澄之介绍了山东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情况后指出：“山东解放区人民胜利，就击破了人民不懂民主的谎言，若把人民的束缚解除了，人民是会站在主人的地位上行使主权的”，他希望“以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使民主能在全中国普遍实行”。郭沫若报告说，共同纲领已经拟定，执行还待大家努力。郭沫若报告时，混杂在人群中的特务不时发出喧嚷和谩骂声，但为群众的掌声所淹没。随后，董必武又到会报告。

同日 民盟及各界人士致书蒋介石和政协会议，谴责昨日国民党军警特务无理搜查黄炎培住宅，要求实践四项诺言。

一月二十八日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六号公报称：晋北、冀南、绥东南等地之一切军事冲突已完全停止。鉴于各地执行小组工作进展迅速，军调部已开始会商恢复全国交通问题。

一月二十九日 陪都青年联谊会在重庆青年大厦成立。该会以促进青年团结，砥砺学行，维护青年权益，推进民主运动为宗旨。

一月三十日 在中共广州市委领导下，中山大学、中华文化学院、中大附中等院校二千多学生举行“反内

战、争民主”的示威游行。

一月三十一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国府礼堂闭幕。闭幕式前举行了第十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七人。会议逐项讨论并通过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以及宪法草案五项决议。在讨论时，黄炎培提出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得到中共、民盟代表的一致赞同，其他代表亦多数表示支持。董必武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很快成立，中共代表团决定全体加入为发起人。蒋介石在会上声明二点：（一）宪草修正案提供国大采纳，“采纳”并非接受；（二）施政纲领应不分界限、党派、地区，全国一律实施。接着举行闭幕式，蒋介石、周恩来及张君勱、曾琦、莫德惠先后致词。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中共拥护政协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并保证为这些决议的全部实现而努力。次日，各大报纸发表了政协会议通过的全部决议。

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说政协已取得重大胜利，为巩固国内和平及我党和解放区的合法化创造了条件，我党要为实现政协决议而继续斗争。

同日 中共代表团在中山三路驻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有关政协会议的九个问题。周恩来说，这次政协会议结果与我党的主张是

有距离的，但为了团结合作，我党作了最多的让步，希望以此促进中国进步，并希望尽快实现改组政府。

同日 新华社重庆分社正式成立。

同日 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发刊。发行人张澜，社长罗隆基，总编辑马哲民。

二月三日 延安各界二万余人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朱德、林伯渠、黄齐生先后在会上讲话。

二月五日 周恩来在曾家岩五十号举行茶会，招待重庆文化、戏剧界人士，到者百余人。周恩来就政协会议成果和民主宪政发展的趋势作了详细分析，他强调指出：“民主道路崎岖，大家要努力争取”。

同日 周恩来赴民主同盟总部与民盟人士商谈参加国民政府的人选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指示力求采用和平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二月七日 周恩来应重庆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会之请，至该校讲演当前世界形势和中国民主问题。到会听众达三千余人。

二月八日 中共中央电中共代表团，指示整军方针问题，不同意国民党提出的国共两党军队混编办法。

同日 政治协商会议设立的宪草审议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各方推定代表及公推出的会外专家共

三十五人组成。中共方面由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参加。

同日 张治中夫妇在重庆纯阳洞举行庆祝政协成功招待会。应邀出席的有政协各方代表及文化界人士共三百余人。周恩来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说：写在纸面上的文字应该大家都共同去做，坚决去做，各方面自己遵守诺言，自己努力去实践，不折不扣的实行政协各项决议。他希望大家多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意见，来逐步实行政协的决议。

二月九日 毛泽东在延安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就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加以扫除。各党派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

同日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举行会议，对实现国内和平、恢复交通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商讨，获得若干协议。

同日 由政协会议决定组设的人权保障委员会（原发起时叫“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讨论章程和推举筹备委员。沈钧儒、邵力子、冯玉祥、董必武、张玲宜、王若飞、陈启天、章伯钧、陶行知、史良、陆定一、易礼容、

黄洛峰等六十余人出席，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侯外庐等十余人在会上作了发言。会上一致推选沈钧儒、邵力子、冯玉祥、董必武等二十五人为筹备委员。

二月十日 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由重庆回延安，十三日返渝。同机到渝的还有秦邦宪、冯文彬。

同日 重庆各界近万人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特务、暴徒数百人在国民党党棍刘野樵、吴人初率领下对会场进行捣乱破坏，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公朴等和与会群众六十余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正当国民党特务、暴徒行凶的时候，周恩来、冯玉祥等赶到，周恩来等见此情形十分愤怒。特务暴徒见周恩来、冯玉祥等来到，遂四散而去。这场血案，是蒋介石国民党密谋决策，而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直接策划进行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反对政协决议的罪行。当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推出周恩来等四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沈钧儒、张君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梁漱溟、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联名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但蒋已于早晨飞上海，未能面晤。次日，《新华日报》、《民主报》、《商务日报》均以本报讯对“较场口血案”作了报道，披露了实情。《商务日报》因此被迫停刊二日。

同日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二十三团体，在

中苏文协招待中外记者，报告较场口惨案的情形，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查办肇事凶手。次日，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说明血案全部经过并提出严惩主犯，彻查幕后，立即解散特务机关，从速颁行妨碍人身自由治罪法等七项要求。重庆各界各团体亦相继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特务暴行。

二月十一日 周恩来与张治中在桂园就执行停止军事冲突命令中所发生的临时问题，商谈解决办法，并对军队整编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午，周、张二人同访马歇尔，继续就中共军队整编办法进行协商，所涉及的十余个问题，大体接近。

同日 叶剑英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上说，停战与恢复交通均已解决，执行部应即着手进行遣俘等重要问题，并迅速命令张发奎执行停战令。

同日 军调处执行部新闻发布组发表第十号公告。公布经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委员核准的关于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的第四号命令，命令国共双方各部队长官应立即协助恢复各交通线的工作。

二月十二日 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廖承志等到医院慰问较场口惨案中受伤人士。

同日 政协四代表周恩来、张君勱、李烛尘、陈启天往见吴铁城，陈述代表们对较场口惨案的意见，要

吴代电蒋介石，并提出由四代表会同国民党代表共同彻底查究此案真相。

二月十四日 根据上年国共两党签定的《会谈纪要》和本次政协《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为研究军队整编问题，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在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举行首次会议，就近二十日来三人会议协商制成的方案，逐项加以讨论，予以明确决定。

二月十五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军官二百余人到会。会议研讨了进攻解放区的方针、计划和军队整编复员问题。

二月十六日 成都、昆明各界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政协成功，并抗议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制造“二·一〇”血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履行政协决议，严惩凶手，追究主使者。

二月十九日 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次日，原机飞渝，当晚即与马歇尔晤谈。

二月二十一日 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举行第五次会议。以前在第三、四次会谈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皆因周恩来回延请示商讨后提出新的意见而获得解决。周恩来于会上再次提出了停止东北内战的建议。

二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借东北问题和“张莘夫事件”，煽动不明真象的学生，举行反苏游行。混在游行队伍中的特务分子趁机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馆，打伤工作人员。同日，成都《新华日报》营业部亦遭国民党特务、流氓捣毁。中共代表团于当日和三月七日、二十五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三次抗议，要求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民主秩序。同时公开声明爱国主义与排外主义是有区别的，中共绝不把不明真象的青年与特务暴徒等同看待。中共将始终坚决为和平民主建设而奋斗，绝不受挑拨，也绝不退却。在我党严正抗议和广大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让重庆地方法院审理了这一案件，至四月五日宣判，将凶犯宋跃仁等判处有期徒刑。宣判毕，《新华日报》代表于刚当场声明指出：此案是一个重大政治案件，虽已捕凶犯并已宣判，但事件本身并未真正解决。解决本案之关键在于国民党政府是否采取负责态度，真正做到：（1）严惩凶犯，追究同案主犯；（2）赔偿全部损失并道歉；（3）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同日 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举行第六次会谈，军队整编方案获全部协议。

二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饶漱石、周

恩来，指示暂时拒绝交出我军战斗序列。

同日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张西曼、许德珩、孟宪章、吴藻溪、何思敬、潘震亚、章友江、李澄之、王卓然、任丹戈、崔国翰、马哲民等二十五人为理事，并发表宣言。

二月二十五日 《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重庆中四路尧庐(德安里一〇一号)举行签字仪式，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分别代表三方在整军方案上签字，并相继致词。周恩来说：自一月以来，我们先后签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协定和决议，这表明中国向民主化的道路开步走了，但是这些协定和决议要付诸实行，将会遇到若干的困难和阻碍。中国共产党将同全中国人民一道努力克服和扫除这些困难和阻碍。他还指出，军队之整编和统编“包括全国范围的无论任何地域或任何武装力量，都不能除外”。

二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三人继续商谈执行整军方案各条各款之计划，及前往各地视察问题。商定马、张、周三人亲赴华北、华中各地视察停战与恢复交通及整军工作情况，军调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三委员将随行。

同日 苏联军队驻中国东北总部发表从中国撤退

军队的声明，在国民党政府两次要求苏军缓撤后，苏军已于一月十五日重新开始撤退，完成撤退的日期当不迟于美军的撤退日期。

二月二十八日 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及随员由重庆飞抵北平，出巡各地。三月一日，军事三人小组一行由北平飞张家口、集宁二地视察，新华社、中央社、《新华日报》、《解放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华北日报》等新闻通讯社、报社记者随行采访。二日，马、张、周一行赴济南视察，即日又赴徐州。三日，周恩来赴河南新乡主持释放马法五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交接式。马歇尔、张治中以及随行人员、新闻记者同往参加交接活动。政协期间，中共代表团强烈要求释放被国民党囚禁五年之久的叶挺军长等，国民党方面见再已无法阻挠作梗，便提出要中共以释放在平汉战役中俘虏的马法五等五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为了国内和平团结的大局及使叶挺将军早获自由，中共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于当日率先实施，赢得了舆论的赞扬。同日，三人小组一行赴太原视察。四日，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及各界群众六千多人的热烈欢迎。在当晚的欢迎会上，朱德、张治中、马歇尔先后致词。朱德在演讲词中说：中共

对停战及政协决议已在忠实执行，整军方案也一定切实执行，务使其彻底实现。张治中说：政府签订的几个协定，是促成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几个伟大文件，“政府当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付诸实施，贯彻到底”。他在结束演词时还说，“我刚才和毛主席谈过，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马歇尔表示愿为中国的和平复员努力，他将进一步帮助整编全中国的军队。五日，三人小组一行离延飞汉。六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回到重庆。

三月一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十七日结束。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通过了多项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三月初 重庆局青年组在红岩嘴召开青运工作会议，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中共中央重庆局青年组同志以及一部分青年工作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特别是今年“一二·五”和“二·二二”两次游行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国统区青年工作的任务。

三月四日 新四军军长叶挺获释出狱，回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次日，叶挺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日，中共中央电复叶挺，热忱

的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月七日 中小工厂联合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成立。拥有会员工厂二百八十余家。该会是在重庆局的领导和重庆局经济组的直接帮助下，由罗叔章、徐崇林等人出面筹备组成的一个经济统一战线组织。

三月八日 重庆各界妇女五千余人在川东师范广场举行纪念“三八”节大会。即有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妇女慰劳总会、重庆女青年会、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民主同盟妇女委员会、现代妇女社、职业妇女社、中华妇女节制会等五十余妇女团体。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妇女代表也出席了纪念会。各方代表相继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邓颖超在讲话中号召全国妇女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曲折，定要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建设成功。大会还通过了团结全国妇女建设民主新中国的宣言。同日，广州、昆明等城市均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会。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三八”节社论，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局面的到来以及前进路上的重重障碍，号召中国妇女在抗战团结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团结起来，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为争取我

们和后代过上安居乐业的新生活而努力。社论提出：妇女们一定要建立民主的统一战线，广泛发动组织和团结各阶层妇女，为实现政协决议，实现和平建国纲领，反对法西斯反动分子的破坏而斗争。还提出要团结动员劳动妇女，要求政府免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制定劳动法，以减轻负担及改善生活。同时，要求政府救济失业，帮助提供交通工具，使能回乡等等。

三月九日 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举行会谈，研讨整军方案各项条款的实施计划、部队整编次序及给养问题。

三月十一日 中共代表团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东北问题办法。一致认为，鉴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东北问题仍以求得解决为前提，其方针应为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撤退区，而以同时解决政治问题为交换条件。

同日 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再度举行会谈，商讨扩大北平执行部权限及东北问题，获得原则协议，并决定由军调部派出执行小组前往东北。

同日 马歇尔奉美国总统之召回国报告工作，离华期间，暂由吉伦中将代理其职务。四月十八日，马歇尔返回重庆。

同日 奉中共中央和重庆局命令到重庆为解决东江停战问题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东江纵队抗战期间，打击敌伪，保卫广东，建立了大功；救护港九盟侨脱险，获得国际赞扬，而国民党军对此抗日有功部队竟加以藐视，大举进攻，妄图消灭，实属荒谬。

三月十二日 重庆局分电各地指示工作要点：一、东北问题尽量鼓动各界发表主张，提出：(1)苏美双方应撤退驻华军队；(2)反对政府秘密外交；(3)东北问题是内政问题，要用协商方式解决；(4)东北要实行民主等项要求。二、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为最低民主表现，如有破坏决议或延误不实行者即是摧残民主，应一致反对，予以打击。三、努力促进罢工运动，以达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物价高涨，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目的。

三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对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指示四点：一、在目前情况下，东北同志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是好的，只有如此，才能逼蒋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但在国民党真意与我谈判，并承认我在东北的地位时，我们必须有某些让步，才能达到妥协。二、谈判中，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中长路上的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国军

以后再要进驻那些和我军须从那些地区撤退，须待政治问题的解决及我军驻防地区确定以后，并须与东北的我军负责人商讨。这一点必须十分重视。三、你们在交涉中，须通盘计划，步步设防，并与中央及东北密切联络，以期做到算无遗策。四、希望你能回延几天。

三月十五日 政协会议综合委员会及宪草审议会协商小组在国民政府举行会议，研讨宪草问题。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与会。会议在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决定修改政协决议之宪草修改原则三点：（一）国大为有形之国大；（二）政协修改之《五五宪草》第六项第二条取消；（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时，加以歪曲报道。周恩来、董必武、张君勱、罗隆基、章伯钧等为此联名致函政协秘书处及立法院长孙科，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更正，以正听闻，尊重政协之结果。十七日，中央社不得不按原决议文稿重新发表。同日，政协秘书长雷震函潘梓年，说明是自己误将草拟的决议原稿投交中央社，表示承担责任。

三月十六、十八日 中共中央两电中共代表，不同意十五日政协综合委员会及宪草审议会协商小组作出的关于修改政协决议的宪草修改原则。同时指出，国民党之六届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

然要坚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望与民盟商议，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三月十七、十八日 周恩来为东北问题同张治中、吉伦两度进行商谈。周恩来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初步方案，都因国方不同意该方案中提出的临时办法（即先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执行命令），未获得结果。

同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声明中国共产党信守政协会议的一切决议，决不动摇。政协的一切协议，特别是宪法的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作任何修改。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还致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张群，指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动摇了政协会议五项决议；政协会议闭幕以来，各地暴徒暴行层出不穷，人民自由毫无保障。邀国民党四代表于十九日下午至中共代表团商谈实施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具体办法。

三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指出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它的六届二中全会又推翻了政协的原则，应坚决反对。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举行中外记者

招待会，谴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许多决议违反政协决议。指出：政协决议是民主契约，决不容动摇或修改。希望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起来，监督政协决议全部实现。继周恩来发表谈话之后，博古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和新四军第五师江汉军区政委郑绍文，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对东江纵队、新四军五师部队进行围攻、封锁等行径。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出尔反尔——评国民党二中全会》，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行径。社论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各项重要决议，“从根本上从实质上从基本精神上完全动摇了政协决议，使各民主党派及全中国人民几个月以来的全部努力，有完全枉费的危险，使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光明前途，罩上一层暗云。”二中全会所以走入这种出尔反尔不信不义的歧途，固然是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煽惑，把持操纵和威胁利诱的结果，但是“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动派于阴谋活动初起之时，又未曾坚持政协决议于全会会堂之上，反而亲临主持反对政协要案之通过，以致二中全会全部动摇了也是蒋先生亲自主持起草通过之政协决议。”社论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信守诺言的，为着中国的和平民主，我们将无条件的

坚持实现政协决议，我们也决不容许任何人来动摇或破坏政协决议的任何一字一句。社论号召全中国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民主的真正信徒，为保卫与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而奋斗。

三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电告中共代表团，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即将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当日，董必武就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本次参政会中，某集团占有极大数量，预料可能重演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各幕活剧，出席参加无补于事。因此，中共参政员决不参加，至意料中之各种造谣诬蔑，我们准备在会外加以答复。

同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王世杰就国民党二中全会动摇政协五项决议及如何保障政协决议的全部实现问题进行谈判。

同日 宪草审议委员会在国民政府举行第七次会议，中共代表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出席。会上，中共及民盟代表，谴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动摇政协会议决议。

同日 民主同盟政协代表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政协决议不容改变，不能把国家百年大计的宪法当作儿戏，既是共同协商的决定便当共同认真执行。

同日 王若飞、张澜等各党派各界人士百余人在重庆欢宴李济深、叶挺、廖承志、田汉等。李济深在会上提出：要扩大民主力量，应具备有斗争之组织。经过与会人士商讨决定，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推出代表组成“民主统一阵线大同盟”，内分政治、文化两大部门，政治部门由各党派之代表负责，文化部门由郭沫若、沈雁冰、田汉等负责。

同日 美国政府派至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团成立。

三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指示开展关于东北问题的宣传斗争。

同日 政协综合小组举行会议，商讨政协决议的实施问题。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出席。

同日 国民党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未出席。会议通过了攻击政协决议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议案。四月一日蒋介石在会议上作政治报告，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就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决议，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决议，目的在维持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

楚，我们民盟不愿贸然参加政府。

三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自渝飞延，向党中央报告工作，研讨整军问题、东北问题以及对付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坚持法西斯独裁的方针、策略。

同日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到有张西曼、吴藻溪、甘祠森等十余人，讨论通过了“推选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发表“对东北问题主张”，“对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决议事件的声明”等六项决议。

三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在延安电董必武、王若飞，告以对国民党谈判应持强硬态度。

同日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和字第六号命令，重申双方军队恢复到元月十三日午夜时的位置，如不遵守以违反停战命令论罪。

三月二十三日 重庆二十九兵工厂（即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因厂方扣发应增加给工人的工资百分之八十，激起工人和低级职员的不满，举行全厂性的罢工。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资按军政部的调资公文增加百分之百，成立有工人参加的管理委员会等项条件。厂方拒绝接受，并使用军警进行镇压。工人在各方的支持下，坚持斗争，至四月四日，终于迫使厂方释放了被捕工人，答应增加工资百分之百，暂时实行八小

时工作制等条件，罢工斗争胜利结束。

三月二十四日 董必武由重庆飞汉口转宣化店，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解放区军民。帮助解决粮食和解释停止冲突问题。四月十八日由汉口回到重庆。

同日 香港海员工会等三十余个工团在中央戏院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各界代表及民盟负责人士发表演说，一致拥护政协决议，抨击一党专政，呼吁彻底实行决议。

三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当晚即与张治中、吉伦举行会谈。二十六日，吉伦先后与周恩来及蒋介石商谈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调处停战问题。

三月二十七日 上午，周恩来、张治中、吉伦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怡园进行商谈。决定精选人员组成执行小组，立即前往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并签定如下协定：（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为苏军驻留的地区；（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公平的调处。下午，三人继续会谈国民党军队包围攻击广东东江纵队及中原新四军第五师问题。

三月三十日 政协综合小组举行会议，王若飞代

表中共代表团就国府委员名单问题发表声明。王若飞说，鉴于政府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乱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之争端未解决，国大代表名额总数国民党又提修改之议，而中共应有之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之名额，政府亦未作最后之肯定，在此情况下，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中共代表团声明：只有在上述各项问题确定决议后，中共方面方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人选。

三月三十一日 国民党军队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街等地大举进攻，破坏东北停战协议。

三月 根据重庆局决定，中共重庆市委进行了调整，书记王璞，副书记刘国定。五月，中共成都市工委成立，书记蒲华辅，副书记马识途。成渝两地新市委组成后，即着手清理恢复原失散的党员关系，发展新党员，逐步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

三月 王若飞指示云南继续准备开展武装斗争，重申了一九四四年关于准备武装斗争的指示。

四月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指示在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上应采取之立场和态度。指示说，近日来，我党代表坚决斗争的立场是很对的。只有如此，方能保卫政协决议，务望精心研究，密切注意。省自

治法仍应改为省宪，如目前不便提，将来适当时机应提出。在宪草与国大等问题没有解决及中央没有最后通知以前，我党拟提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参加政府的名单不要提出。

同日 政协综合小组继续讨论国大和宪草等问题。在讨论地方自治根本办法时，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提出“省议会制定省自治法经立法院通过后，中央法令不得变动之”，企图以此取消地方自治。王若飞当即指出其观念糊涂。曾琦、陈启天恼羞成怒，退席而走。

同日 中共代表分别在重庆、北平向国民党和美方提出严重抗议。抗议美国帮助国民党运入东北的由美械装备起来的军队已超过“整军方案”规定的五个军，是破坏“整军方案”的行动。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调兵，美国停止帮助国民党运兵。四月十三日，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东北局势已发展成为内战状态，再次抗议美国输送国民党军队往东北。声明东北民主联军有充分权利接收东北主权，接防苏军撤退的城市。

四月二日 中共代表团严重抗议国民党以战斗机八架威吓延安。

四月三日 北平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宪及

便衣特务，包围搜查军调部叶剑英委员的军事顾问滕代远驻地，包围搜查北平新华社、解放报社，并捕去工作人员多人。经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最高当局严重抗议和叶剑英、滕代远向北平当局抗议交涉，迫使北平当局道歉，释放全体被捕押人员。北平《解放报》照常出刊。

四月四日 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目前谁在破坏政协会议决议，谁在煽动内战等问题发表谈话。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共为保护政协各项决议而奋斗，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继续加紧进行破坏政协决议，煽动内战。他指出，如果这些问题不澄清，中共决不参加政府，并望盟邦在目前中国继续着不和平不民主不安定的情况下，应慎重考虑对华援助问题。

四月六日 驻中国东北的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离长春转哈尔滨回国。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代表董彦平会见苏驻军参谋长特罗曾科，再次要求苏军缓撤，遭到拒绝。

四月八日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秦邦宪、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及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等一行十三人由渝飞延，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延安、

重庆都为死难烈士隆重举行追悼会。十九日，在重庆各界联合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报告了烈士的生平事迹，号召大家继续烈士未完成的事业，使任何破坏政协决议的企图都不许其成功，任何冲突都要停下来，为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而奋斗！把悲痛化成团结的力量，去冲破黑暗，去迎接光明。

四月九日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吉伦（代表马歇尔）、秦德纯（代表陈诚）、罗瑞卿（代表周恩来）、陈士渠（代表叶剑英）赴东北视察。四代表于十二日由北平飞沈阳，在东北作三日视察之后，十五日返回北平，次日由平抵渝述职。

四月十日 中国民主同盟在特园宴请国共双方代表，交换对东北局势的意见。民盟建议国共双方下令停战数天，此间全力进行商谈，使东北政治问题得到解决，然后进行和平接收。国民党代表坚持“接收”第一，先“接收”才能停战，商谈其他。中共代表坚决要求彻底实行三月二十七日双方签订的停止东北军事冲突的三点协议，先停战再商谈一切。出席宴会的有民盟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勱、张申府、蒋匀田；国民党孙科、邵力子、张群、吴铁城、陈诚、王宠惠、张厉生；中共周恩来、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和平民主团结统

一而奋斗》。社论说，抗战胜利八个月来中国共产党诚心为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作的努力，真可谓言必信，行必果，且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以致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而国民党则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尽耍流氓手法，坚持内战、独裁、分裂的反动方针。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已把中国的局势弄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是再不能忍受了！社论最后说：“我们要再一次严重警告国民党当局：内战独裁分裂的反动政策决没有出路。”

四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重庆局致电中共中央，呈报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名单及分工提议。中共四川省委拟由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三人组成，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傅钟任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代社长，于代生（江震）任组织部长，魏传统任秘书长，梁华管报馆党内工作，杨超管情报工作，郑伯克（云南秘密党工作），廖志高（川康党工作）、候补委员周文（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日报副社长），何其芳（文化组组长），赵世兰（妇女组组长）。十九日中共中央复电重庆局说，除廖志高不能来川工作外，其他均同意，并告程子健可调川任民运工作。二十二日，中共四川省委召集第一次会议，董必武代表重庆局出席，宣布了中共四川省委成立。次日，《新华日报》用大字标题刊登

中共四川省委沉痛哀悼“四·八”烈士的两则电报，是为中共四川省委首次公开。

同日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指示明确向马歇尔表示在东北问题上我方不再让步。

四月十五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约集政协综合小组各方代表，商谈“国大”及政府改组问题。中共代表周恩来、陆定一出席。蒋介石表示“国大”要在五月五日召开，希各方在本月二十日前提交国大代表及国府委员名单，并声明改组政府与借款问题无关。周恩来立即发言指出：中共对政协决议及停战、整军两协议，一向主张百分之百的完全付诸实施，国大代表和改组政府问题，政协均有原则协议，本可照此经由各方协商从速决定。但二、三两月来，枝节横生，全国各地侵犯人权事件，层出不穷，政府至今仍未处理，人权自由毫无保障。政府委员比例，国方代表又不同意原来支配否决权之数目。至于修改宪草原则，政协原有决定，亦发生争论，迄今未决。国大代表名额，国方近亦要求增加，两个半月来，磋商多次，都因国方动摇政协决议而发生争执，不得结果。此外，整军方案与停战协定之实际执行，亦发生不少问题，中共方面多次提出，希望经过谈判能获得通盘解决。国民党政府方面虽表示可以商谈，但一再拖延，并无具体回答。

现蒋先生既提到改组政府与国大问题，我们仍希望政府方面指定全盘负责之谈判代表，将上述各项问题在二十日以前迅速一道解决，以利国是。在周恩来义正辞严的批评和坚决要求下，蒋介石只得当场指定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为代表，雷震襄助，负责与各方全盘商讨一切问题。

四月十六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与国民党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三代表商谈。周恩来再次说明昨日所提各项问题是互相联系的，有一道解决之必要。尤对国方代表所提国府委员之比例数目，认为有违协议，决无考虑余地，希望国方代表尽快约请各方代表商谈，以如期解决。

四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周恩来打给中央的报告电。周恩来的报告说，蒋介石现表面愿求妥协，以欺国人，而暗中积极布置内战，阴谋甚大，提醒全党注意。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

同日 邵力子往访中共代表，商谈国大及政府委员名额分配等问题。《新华日报》记者为此问题走访陆定一。陆定一回答说，此次谈及内容不止国府委员名额一事，政府委员名额按八四四四的比例分配，仅为国民党一方之意见，我党代表认为无考虑余地，故未

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仅作为消息电告。

同日 民盟张澜、罗隆基和郭沫若等七十五人联名致电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呼吁停止美军帮助国民党运兵打内战。

同日 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遇难后，中共中央决定罗迈(李维汉)到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罗迈当日上午由延安飞抵重庆，同机到达的有刘宁一等。刘宁一是为同朱学范一道出席世界职工联合会执委会而来到重庆的。

四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指示谈判重点和对美之态度。电报说，谈判中要力争东北停战，东北问题政治解决，力争民主宪法，力争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兑现，国大和宪草审议问题可放后一步。对国民党应强硬，但不要与美国搞僵，与马歇尔要搞好关系。对民盟应搞好团结，但对张君勱应保持警惕，他提出的修改宪草意见于蒋介石国民党有利。

四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指出反对独裁是制宪最基本的原则，是我们的立足点。

同日 周恩来写信给国民党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三代表，指出原定二十号之约期已过，促其迅速邀集各方谈判解决各项问题，并随函送上中共代表团之书面声明。声明指出，当前内战蔓延，时局严重，国民

党拖延不实施各项协议，不澄清破坏协议混乱情形，并且变本加厉，继续坚持一党独裁之各种活动。中共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只有各项问题全部解决，方能考虑。

四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在重庆怡园同马歇尔举行会谈。周恩来强调说，非实现全面停战，中共不能参加政府。

同日 民主同盟鉴于国大及改组政府问题，拖延不决，派出章伯钧、罗隆基两代表至国民党政府，递交书面声明，催促国民党政府三代表继续与各方商谈，迅速解决问题。

同日 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函复中共代表团，泛泛表示将尽最大之努力，使政协决议获得实行，然对中共所提各点无任何具体答复。

四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至怡园同马歇尔会谈有关东北停战问题。

同日 周恩来函复国民党三代表张群、邵力子、张厉生，重申中共对保障人权、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宪草修改及国大等各项问题之严正态度，指出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二十二日的复函，在卸脱责任。再一次希望对中共所提全盘解决意见作具体有效之回答。

同日 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因国民党政府将还

都南京，重庆设立“国民政府主席行营”，由何应钦兼行营主任，何未到前由张群代理。重庆行营恢复，成都行营即日撤销。

四月二十四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茶会，招待政协综合小组各方代表，被迫宣布原定五月五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延期。会上，周恩来询问蒋介石对四项诺言的保证问题，蒋表示已经在办。

四月二十五日 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三方面政协代表于重庆特园集会，商讨调解东北问题之办法。到会有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梁漱溟、张君勱、陈启天、杨叔明、莫德惠、郭沫若、缪云台及东北人士周鲸文、阎宝航等。会议决定派出代表分别与国共双方会谈，求得妥善解决办法。遂由陈启天、莫德惠往访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罗隆基、章伯钧至中共代表团与周恩来晤谈。

四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在渝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无条件停战为讨论与解决目前东北问题的先决条件。他说，“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无条件停战。这是我们很久以来的一贯要求，中共自去年十一月起即提出这一要求。”他谴责国民党政府当局现在不仅在关外正以全力扩大内战，而且在关内到处挑衅。国民党发言人吴国桢在此之后亦发表谈话，公开表示反对周恩

来关于东北立即无条件停战的主张。

四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宴请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王昆仑、谭平山等各方人士。

同日 周恩来出席重庆文化界人士集会，报告东北问题谈判的经过及我党一贯坚持的主张。

同日 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二十余个团体联合组织的民主运动联盟，在重庆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九单位为理事，并决定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呼吁东北停战。

四月二十九日 马歇尔分别与蒋介石、周恩来会见，商谈东北问题，因蒋介石坚持先取得长春而后再谈其他，未获结果。

同日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等二十团体联名致书马歇尔，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五项主张。要求立即停止东北内战及一切军事运输，协商解决政治问题、整军问题，政协决议未实施以前，美国不应贷款给中国政府。此函同时分送各党派及社会贤达。

四月三十日 周恩来在重庆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东北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为停止东北内战，中共、第三方面、马歇尔多日

以来，奔走商谈，曾作过各种努力，但至今仍未达到目的。而东北内战仍在政府当局非先拿下长春不能停战的坚持下继续扩大，实令人焦急万分。他警告国民党当局说：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的主张是十分危险的，“早下决心，回头不晚”，仍然希望协商能在南京继续进行。最后，他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新华日报》代社长傅钟、副社长周文等介绍给大家。

五月一日 周恩来为国民党军事当局密令十一个军三十余万之兵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所部一事，往晤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同时致电南京马歇尔。周恩来指出，此系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的阴谋，企图突然发动全国性大内战。要求立即采取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制止对停战协定之任意破坏，提出与徐、马同往宣化店监督停战。五月四日，周恩来在南京为调处中原军事冲突访马歇尔。五日，周恩来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徐永昌由南京飞往汉口。六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代表白鲁德、徐永昌代表王天鸣，率领随员，会同军调部第九小组三方代表及各通讯社、报社记者共四十余人出发去中原解放区，八日抵达宣化店中原军区司令部。当晚，周恩来出席中原军区举行的欢迎晚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翌日，周、白、王

等返汉口，继续同徐永昌会商。十日，周恩来、白鲁德、徐永昌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关于停止中原内战协议，并即将此协议发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要求即转饬该区双方指挥官遵照执行。接着周、徐同机飞南京。当晚，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十七号接见《中央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中原之行的谈话。

五月三日至十八日 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和重庆局同志飞往南京。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南部国民党统治区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移到了南京，中共中央重庆局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代表团迁南京后，重庆设立驻渝联络办事处，与中共四川省委合署办公。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公开身份驻重庆，负责领导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全面领导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和《新华日报》的工作。在党中央和南京局的领导下，四川省委保持并发扬了南方局、重庆局时期的坚强的战斗精神，为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武装斗争，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展民主运动，揭露美蒋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继续作出了重大贡献。

附 录：

中共四川省委大事记

（一九四六年四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



一九四六年

四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四川省委。

四月二十二日 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成立会，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重庆局出席，宣布中共四川省委组成人员，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委员傅钟（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代社长）、于江震（组织部长）、魏传统（秘书长）、杨超（社会部长）、程子健（统战部长）、梁华（《新华日报》总支书记）、郑伯克（云南省工委书记），候补委员周文（宣传部副部长）、何其芳（文化组长）、赵世兰（妇女组长）。中共四川省委是我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对西南地区联系而设立的公开机关。

四月三十日 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中共四川省委，并介绍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新华日报》代社长傅钟与记者们见面。

五月三日至十八日 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重庆局同志去南京。中共代表团和重庆局迁南京后，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的公开身份驻重庆，全面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及西南地区党的工作。

五月四日 吴玉章在《新华日报》发表为纪念“五四”运动的题词：“‘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新阶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专制独裁反变本加厉，民不堪命矣。最近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及民主的宪法，必须于最短时间内促其实现。”

五月十九日 重庆各界在北碚召开张自忠殉国纪念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写大幅对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人民何堪？”置于会场显眼处。这副对联不仅在会上引人注目，而且各报纷纷报导，中共四川省委的名字因此广为传开。六月三日，国民党当局企图以中共四川省委成立的手续不周（未事先报经他们同意），压迫其撤销，为吴玉章严辞拒绝。吴玉章说：蒋介石在政协的四项诺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一条；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们在重庆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理应当有党的组织。吴玉章要国民党重庆当局以此回报他们中央。此后，国民党不再问及中共四川省委是否存在，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四川省委的合法地位。

五月二十六日 在中共四川省委的发动和组织下，重庆各界举行时事座谈会，到有民主建国会、中国

经济事业协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妇女联谊会、重庆杂志联谊会、民主青年联谊会等人民团体代表及大学教授、各界人士百余人。罗隆基、邓初民、史良等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决定征求各方签名，发表反内战宣言。宣言指出：中共军队既撤出长春，应就此时立刻停止军事冲突，一切问题由政治协商求取全盘合理解决。苏军既已撤出东北，其他友邦也应立即撤军，并停止单方面援助。在宣言上先后签名的有罗隆基、史良、鲜英、邓初民、周新民、吴晗、吴藻溪、朱蕴山、刘王立明、饶国模等九十人。

六月六日 由于中共代表团的坚持努力和各方人士及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宣布东北暂时停战十五天。

同日 中共代表陆定一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周恩来关于东北停战的声明。声明说：为不放弃任何机会，以求和平之实现，中共同意休战十五天的办法，并愿尽一切努力，谋取谈判成功。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具有最大的诚意，使过去一切协议付诸实施，并使暂时休战变为长期休战，永远停止进攻。

六月十六日 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刘宁一在重庆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工人运动当前的任务是争取和平，改善工人生活，促进劳资合作，统一

工人运动；并与世界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争取世界和平。他号召国民党区的工人不分男女、新、老、帮派、地域、产业、部门，加紧团结；国民党区工人与解放区工人团结统一起来；中国的工人与民族资本家携起手来，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

同日 重庆市基督教协进会在公园路青年会举行全市和平祈祷大会，对时局发表意见。指出，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希望各党派和人民密切联系，在和平大道上前进，使中国成为真正民主的国家。和平是从公平而来，政府有许多固执的地方，应当听取人民的意见。并分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和平。次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争和平的浪潮》。社论说：“重庆佛化同人在长安寺举行祈祷和平法会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在青年会举行和平祈祷大会这不是寻常事，而是全国人民普遍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运动声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表明了在今天全国范围真是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职业的人民的迫切要求，迫切需要，不是别的，只是这样一个东西：第一、是和平。第二、是和平。第三、还是和平。”在今天的中国，“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能站到反对内战的阵线上，都不会是孤立的，而是有广大人民做你的后盾，以致佛堂、禅房内、基督像前、礼拜堂中，都有成千累万为

和平而斗争的勇士做你的后盾。”“那些好战分子们：赶快‘收刀入鞘’、‘回头是岸’吧！”

六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致电吴玉章、王维舟，指示速派党员去川军、滇军中做联络工作，进行反内战活动，达到其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之目的。

同日 重庆各界人士分别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以谈判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把十五日的停战。变为永久的停战，在通电上签名的有金融界、工商界、司法界知名人士及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文化工作者、基督教徒、佛教徒、回教徒、职业妇女、家庭妇女、护士、职业青年、工人、大中学校学生、店员及抗属等四千二百七十一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公推黄墨涵、王卓然、鄢公复、徐崇林、黄次咸五人为代表，拟去南京向蒋介石陈民之困，诉民之求。这次签名运动和上海和平运动呼应配合，影响很大。

六月二十一日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在重庆招待新闻界及各报负责人，发表了对目前时局及中共所持态度的谈话。

六月二十二日 重庆中等学校教职员联谊会，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呼吁永久停战，循政治途径解决国内问题，并提出对时局六项主张。

六月二十三日 上海各界十余万人为争和平、反内战召开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同时送代表马叙伦、胡厥文、董廷芳、包达三、张纲柏、盛丕华、阎宝航、吴耀宗、雷洁琼、陈立复、陈震中等赴南京请愿。代表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造成“下关惨案”。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各界人士及社会团体纷纷致电慰问受伤代表，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挑动内战及其法西斯暴行。

六月二十六日 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三十余万人，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中国的时局进入到表面谈判，实际大打的阶段。中共代表团为了继续坚持谈判斗争，以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阴谋，教育广大人民，继续留在南京。

七月三日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悍然单方面宣布，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

同日 中国共产党为国民党单独宣布召开国大事发表声明。四日，周恩来、董必武在陈诚寓所同陈诚、王世杰、邵力子商谈军政问题，无结果。会上，邵力子将国民大会已定于十一月召开一事口头通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即表示，此事中共事前毫无所知，对此一党之决议，不愿受任何约束。同时指出，希望近期召开政协会议，讨论一切政治性问题。七日，周恩来、董

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七代表，为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大，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及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指出此举完全违反政协精神，中共坚决反对，不受任何约束。坚持迅速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讨论国大及有关问题。

七月四日 民盟代表对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定期召开国大提出抗议，呼吁重开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

七月十一、十五日 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十七日，云南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协会发出通电，为李、闻血案提出紧急呼吁，指出昆明惨案是反动派剿杀全国民主人士的开端，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援华，以制止法西斯凶焰。昆明学联代表全市三万多名学生发出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严惩凶手及幕后指使人等六项要求。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新华日报》致电吊唁，并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在中共四川省委的发动组织下，重庆各界群众六千余人于二十八日在青年馆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经过多方工作，争取到大会由四川省主席张群主持。吴玉章、胡子昂、史良、邓初民等出席，并在会上致词。吴玉章在致词中指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要求是独立、和平、民主，而这要求决不会因屠杀之恐怖而停止，

他号召大家以千百倍的勇气，来继承死者的遗志，保持中华民族的光荣。邓初民愤慨讲道：为和平民主奋斗的人，是杀不完也杀不绝的，李、闻是人民的朋友和同志，照着他们的路走是不会错的。胡子昂在会上三呼“要和平”。八月九日，李、闻在渝友好八十余人及重庆五十余个社团，共同发起的“陪都李闻惨案后援会”召开成立大会，发表宣言。提出限期缉拿凶手，并对凶手及主使者处以极刑，切实保障人身自由，立即撤销中统、军统以及一切变相的特务组织，厚恤李、闻遗族以及彻查政协以后各地所发生的血案暴行，公布并严惩祸首等六项要求。八月十八日，成都各界召开追悼李、闻大会，张澜、李璜、范朴斋等二千多人到会。民盟主席张澜在致词中要求严惩凶手及幕后主谋人，希望大家前赴后继，力争民主之实现，并表示自己“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族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殴伤张澜等。次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致电张澜，表示慰问，支持他们继续为民主尽力，并谴责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径和反民主罪行。九月四日，张澜致函民盟政协代表，要其对他们在成都被殴辱事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李、闻血案和成都特务行凶捣乱，完全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破坏和平，坚持独裁、

压制民主的反动面目。

七月十七日 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就目前时局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最迫切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要求国民党当局少作违反事实的宣传，立即下令全面停战，否则要负内战全部责任。声明说，一连串的暗杀事件“完全赤裸裸的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中共代表团于当日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重申四项诺言；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安全；彻查各地惨案，严惩祸首；取消一切特务组织及释放政治犯。

同日 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王维舟、秘书长魏传统一行返延安。由张友渔接任省委副书记职并兼重庆《新华日报》社代社长，袁超俊继任省委秘书长。

七月二十二日 宋庆龄发表对当前时局的主张。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制止内战灾难，要求美国撤走军队，停止援蒋。宋庆龄提出的主张获得国内广大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及海外侨胞的一致拥护。

七月二十四日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国民党方面所谓中共重庆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召开会议，岗哨森严，与附近

居民引起冲突，并无此事，完全是一种别具用心，有计划蓄意捏造的谣言。

七月二十五日 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因遭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匿居友人家，并因加紧工作，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患脑溢血不治逝世。周恩来、邓颖超闻讯赶至，悲痛不已。周恩来当晚即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多加关照》的电报。称颂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要负责保护，经济上要给予帮助，在政治上要时时关照。中共四川省委亦分别致电张澜、沈钧儒和陶行知夫人吴树琴表示哀悼和慰问。八月四日，重庆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在和平路管家巷二十八号举行陶行知追悼大会。到有各方人士、团体代表千余人。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张友渔、傅钟、周文及民盟邓初民、鲜特生、史良、黄次咸、周新民等到会。吴玉章在沉痛的讲话中说，陶先生是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实行家、创造者，主张教育与政治相结合。他不仅教人会做人，而且教会人怎样去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甚至改造全世界，使全社会实现大同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吴玉章说，这正是陶先生的精神所在，大家要努力去完成陶先生未完成的事业。他说：“今天，伟大的时代已经到来，社会

都到了必须解放的时候了。陶先生是时势产生的英雄，陶先生所创造的事业，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九月二十二日，重庆各界又在沧白堂举行陶行知追悼会，到会群众二千余人。

八月二日 国民党七架飞机轰炸延安。次日，周恩来会晤马歇尔指出，“此系空前严重事件”。五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强烈抗议。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抗议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指出：解放区人民为自己的力量和全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具有充分的信心。国民党当局想拿美国的炸弹及其全部援助来吓唬解放区人民，那简直是梦想！

八月六日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指使“重庆总工会”伙同警、特、宪武装占据中国劳动协会及其附属单位，逮捕工作人员三十八人。事件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委支持劳协与反动当局开展斗争，《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谴责这一暴行。劳协主席朱学范在上海呼吁各界主持公道，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被捕人员，查办主使人，保障人权，强占该会机关者即行退出。重庆工人及各界人士纷纷声援。国民党反动分子十分孤立，被迫于九月放出逮捕的劳协工作人员。九月二十二日，重庆文协、经协、民盟、民建等二十一团体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欢迎出狱人员大会。

八月十二日 重庆工商、文化、学术、文艺、戏剧、新闻、律师、教育各界人士一百三十六人联名向全国同胞发出公开信，响应七月二十二日宋庆龄发表的对时局主张。公开信说，宋庆龄的主张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我们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拥护这一主张，誓为其实现而奋斗。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促进中国内战的停止，把中国从内战、分裂、混战、恐怖和穷困中拯救出来，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奠定东方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础，中国人民才能从水深火热的深渊里解脱出来，过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八月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通令各军办事处限期撤销。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西安等地的办事处，均奉命于八月底前后撤返延安。重庆办事处本月内结束全部工作，红岩嘴的房屋大部交还农场主人饶国模，一部分交予育才学校使用，以后一切交涉，由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办理。

九月二十二日 自本日起至二十八日止，美国民主人士在三十五个大城市同时举行的“美军撤出中国周”。有四十五万美国人民签名上书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九月二十九日，重庆二十四个人民团体为响应美国人民举

行的“美军退出中国周”发表宣言，呼吁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中国的事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保持中国主权完整，提高民族自尊，中美两国人民联合起来争取世界和平。

九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指示发动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运动，其口号是：要求美军无条件退出中国！

同日 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等二十余人民团体，就美国支持国民党一党政府，造成中国空前大规模的内战并威胁世界和平事，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安理会、斯大林、艾德里及马歇尔，要求切实履行莫斯科决议，纠正美国对华政策，并为响应美国人民举行的“美军退出中国周”发表宣言。同时，重庆七十四名记者致书美国国务院，要求杜鲁门实践去年十二月发表的对华声明和莫斯科三外长会议的决定。一些教师也写信给在华美国士兵，警告他们赶快退出中国去，不然，中国人民的怒火又会象烧毁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一样，把美帝国主义烧毁掉的。

同日 《新华日报》用两个整版的增刊发表《一年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纪要》，系统地揭露了美国借“调停”之名，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罪行。

九月三十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

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致函蒋介石，就国民党军九月二十九日发动对张家口的大举进攻严正声明：如果国民党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布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应由国民党政府方面负责。周恩来又以同样的内容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十月一日，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说：现在不管三人会议也好，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也好，国大也好，一切问题的中心，都在于停战，只有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才有和平谈判的余地。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停止进攻张家口，美国政府不改变现行政策，仍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中国必将全面分裂，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完全由国民党负责，中共决不屈服于国民党内战与奴役的政策之下。

十月四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董必武，指示因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应停止进行谈判。如要谈，就应使军队恢复一月十三日前的位置，否则周回延，并要求马歇尔协助撤退我驻沪、京、渝人员。不要挽留马歇尔和司徒雷登。

十月十日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国庆感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今天的国庆，

可庆又不可庆。可庆的是，从成立以来，先后消灭了“袁皇帝”，打倒了北洋军阀，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庆的是，现在抗战虽胜利了，而国权的丧失比任何时代都更大更多，国内的战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广更烈，民生的痛苦，比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巨。在这样的环境中来纪念国庆，不但不可庆，而且使人不胜悲愤栗栗危惧。文章最后正告国民党少数的反动好战分子和美国少数的反动好战分子：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帝国主义、法西斯蒂、个人独裁，少数人统治的世界，而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起来，求得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世界，中华民族已经是经过了三次伟大革命战争锻炼的民族，而且已锻炼出了一个钢铁一般坚强的，不可战胜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国内外的少数反动好战分子，不顾历史教训，硬要把中国变成法西斯独裁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要把他打得粉碎，到那时，我们才有真正可庆的国庆。

十月十一日 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蒋介石正式下令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

十月十二日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重申：国民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表示他决心推翻政协决议，实行全面破裂，我们不受“国大”的约束，因此引起长

期内战，全面分裂，国民党政府应负全责。

十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示在大打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参加谈判只是在揭露蒋介石，教育人民。只要蒋不公开宣布放弃政治解决，我党也不公开宣布破裂，不公布谈判记录。今后谈判一定坚持双方军队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及实现政协决议两大原则。

十月十六日 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张友渔、于江震、袁超俊联名复电延安党中央和南京周恩来、董必武，报告省委工作安排情况。报告要点是：（一）袁超俊因工作需要，年内不能离渝。（二）省委及报馆工作人员都尽量精减，已送走五十人，拟继续抽一、二十人送走。（三）省委干部拟尽可能兼任报馆工作，但两机构不宜合并。吴玉章、张友渔既留渝，非到不得已时，省委的牌子似无自动摘下之必要，因为这将影响到民盟及广大中间人士的存在与活动。（四）自时局严重化以来，此间工作已作最坏之准备与布置。一方面加紧精简疏散，另一方面把工作之重心转移到外面。群众工作特别是青年工作已采取化整为零，由广泛到深入，由城市到农村，掩蔽少数进步分子，争取广大中间群众等办法，并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分析其能力、地位及所处环境，作出各种不同的措施。总之，主要作长期

打算，但不放弃当前应做的工作。至于上层统战工作，则为掩护下层起见，更有加强的必要。(五)重庆为西南中心，此地工作之重要性，必不下于京、沪，人应加强，不须松懈，只是工作形式应随环境之变化而变更。由此间返延之干部，还有轻视此间工作之倾向，应予纠正。

十月二十四日 重庆市文化界邓初民等三十八人致电正在南京做商谈的各方代表，呼吁立即停战，不可边谈边打，而本次政治谈判应以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为依据，只许谈判成功，不许失败。

十月二十五日 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三民主义同志会重庆分会、民主建国会四团体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张澜，到有各界名流百余人。吴玉章出席并详尽介绍了张澜多年来为民族民主事业奋斗的事实，希望民盟要始终坚持和平民主立场，号召各界人士加强团结。

十月二十八日 中共云南省工委派侯万岳到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报告了李、闻惨案斗争的过程，云南党组织的情况及准备武装斗争等问题。

十一月四日 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所谓“互惠”条件的掩护之下，给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华，大开方便之门，使中国进

一步殖民地化，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在中共四川省委的发动和领导下，渝、蓉、昆各城市纷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卖国商约。

十一月六日 中共中央致电方方、林平并周恩来、董必武、刘晓、吴玉章，指示南方各省党组织根据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一、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应即建立。二、凡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采取隐蔽待机的方针。后一种情况在目前当然占多数，但其目标仍是积极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而不是不管条件是否成熟，一概采取长期隐蔽的方针。

十一月八日 蒋介石片面颁布所谓的停止军事冲突令，命令全国军队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一律于本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停止军事行动。再次宣布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行政院在国大未开会以前，不作重大变更。要求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国大”延至十五日召开。

同日 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蒋介石声明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所宣布之“停止其它军事行动”令，事前既未与中共代表协商，而且其中“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除外，仍可作一切军事行动的借口。至于政治方面所提之一

切办法，均与政协决议及其程序相违背。因此，谈判前途，实未容乐观。

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一手包办国大，表明其决心长期独裁和内战；为粉饰此种企图，乃宣布所谓“停战令”，实则等于作战令。如果蒋氏实具有和平诚意，即应停止召开一党国大，撤退侵入解放区的军队。凡属以真正和平为目的之商谈，中共均愿参加；凡属欺骗行为，则一概反对。

同日 国民党调集三路大军，准备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延安。

同日 重庆市二十一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分裂的国大，并认为国民党当局八日的声明，既系片面行为，复置政协决议及程序于不顾，实属欺蒙人民手段。

十一月十二日 民盟在南京代表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申府于上午八时集会兰家庄，商讨并决定对召开国大的态度。通过声明说：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的依据。同人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

未完成以前决不参加。

同日 民盟主席张澜于晚八时由重庆电话通知在京的民盟政协代表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即失去了同盟之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十四日，张澜向记者严正声明：民盟不参加一党国大。

同日 国大代表邵从恩由成都来到重庆，拟去南京，吴玉章遵照中共中央和董必武的意见，亲自说服邵留在重庆，不去南京参加国大。经吴玉章的工作和张澜的影响，邵从恩逐渐认清了问题，于十二月下旬返回了成都。

十一月十五日 国民党最高当局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历时四十一天，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闭幕。这个所谓“国大”除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国社党和部分“社会贤达”到会外，其余各方面代表均未出席。

同日 中共代表团重庆办事处和中共四川省委员会由中山三路二百六十三号迁至春森路三十三号和上曾家岩二十三号吴公馆（即原五十号周公馆）。在这前后，省委的傅钟、周文、程子健、于江震、杨超等许多同志相继撤走，吴玉章、张友渔、袁超俊等部分同志留下坚持工作。

十一月十六日 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国大”，是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民意，是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的分裂的“国大”，中共坚决反对，决不承认。中共愿和全国人民为真民主和真和平奋斗到底！周恩来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和谈之门已最后关闭。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返回延安。但京、沪两办事处仍将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国民党如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将坚决抵抗，誓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十一月十九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人，于上午八时乘美军专机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董必武、邵力子等往南京机场送行，朱德等在延安机场迎接。

同日 周恩来在延安接见记者时说，中共将同意与南京重开谈判，唯谈判须以下述三点为目的，即重新成立各党各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召开新国民大会。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电叶剑英、董必武，指示力争在国统区的京、沪、渝、平、长春五地保留公开机关，以便宣传群众、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现在

和平之门已关闭，国统区情况恶化，要求马歇尔在紧急时派飞机将我公开机关工作的同志送返延安，同时也要准备进集中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事件。美军的暴行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爆发了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抗暴运动。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都相继罢课，举行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要美军撤出中国。中共四川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在平、津、沪、渝、昆、蓉、杭、港等各大城市及海外侨胞中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省发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抗议美军暴行。《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以行动答复美军暴行！》、《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挺进》等社论，号召全中国一切爱国主义者更加广泛而坚强地团结起来，组成强大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以行动答复美军的暴行，并严惩那些为美军暴行辩护的根本违反民族立场的奴才！一月一日，中共成都市工委领导成都市大中学生集会游行，五日又举行大中学生代表会议控诉美军暴行，要求废除中美商约，美军撤出中国。六日，云南省工委组织昆明全市三万大中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和示威游行。重庆市大中学校学生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直接组织领导下，

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于一月三日起举行全市性罢课，六日举行了有六十三所大中学校一万五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派出代表向美军驻渝领事处递交抗议书，提出严惩凶手，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等强烈要求。会后成立“陪都人民抗暴委员会”等组织，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随后，十五所大中学校组成宣传队，各区又相继组成宣传队分散在重庆市各地进行宣传。二月上旬，宣传队遭到国民党重庆反动当局的镇压，但学生们不畏强暴，坚决斗争，使重庆市的反美抗暴运动持续达六十余天。

十二月 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撤出中国，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重庆的实际情况，决定再次发动各界举行签名运动。至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签名者达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八人，名册汇交美国驻华使馆转致美国总统杜鲁门。

一九四七年

一月一日 吴玉章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元旦献辞》。指出，过去这一年，是新时代在战斗中前进的一年。一年来的事实证明了新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谁要阻止它，谁就会自遭毁灭。但是，反动势力

还没有死亡，还相当强大。我们的斗争还是残酷的、艰苦的、曲折的。我们毫不松懈，不怕困难，不辞艰险，胜不骄，败不馁，小心翼翼，不屈不挠，依靠广大的人民来打倒必归于灭亡的反动势力。吴玉章最后号召大家要勇敢！勇敢！！再来一个勇敢！！！！

一月十日 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同志在化龙桥报馆举行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大会。到有各方面人士和群众共五百余人。张友渔在会上报告了该报一年来的工作，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坚持过去的方针，发挥过去的优点，更进一步改进各部门的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吴玉章到会致词，他说：《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中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宝贵的队伍，坚持把这面旗帜插在大后方，其英勇与成绩，并不亚于解放区自卫前线的战士。他勉励全体同志，以更大的努力，克服困难，改进工作，迎接更大的胜利的到来。会议从下午二时开至七时半，气氛十分热烈。

同日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打电话给中共四川省委说，形势有变，应作准备。当晚吴玉章、张友渔立即召集省委同志进行研讨，对省委机关、新华日报社、地下党组织、统战工作、群众运动一一作了布置。

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蒋管区党组

织的六项指示。其要点是：一、南京局在中共代表团回延后，应加入各地负责人组成之，由董必武在宁主持，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一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二、南京局、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组织不公开，对外仍用南京办事处、四川省委、上海办事处接洽。三、上海另设上海分局，统一管理刘晓、钱瑛所管之秘密组织。分局下设上海市委，刘晓不参加；钱瑛原管之组织除西南的川、康、滇、黔由重庆分局管辖外，余均划入上海分局，仍由钱直接或间接管理；刘光原管理之青年组织及外围组织移交钱瑛领导。四、上海分局由刘晓、钱瑛、张明及上海市委中一人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的秘密工作。五、重庆分局除直接领导《新华日报》及统战关系外，对川、康、滇、黔党的工作仍应设法加强领导。六、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均直属南京局，但有关全局的工作，中央将给与直接指示。因时局急剧变化，有的组织的调整工作未能完全实现，如重庆分局就没能正式建立。

同日 《新华日报》营业部在重庆市七星岗德兴里二十九号营业。重庆市民生路二百零八号《新华日报》营业部自去年二月被国民党特务暴徒捣毁后，经中共代表团一再抗议交涉，国民党当局也曾口头表示赔偿损失，然又无故拖延，不予解决，致使原址无法营业。

为满足读者要求，自即日起改在德兴里新址营业。

一月十八日 《解放日报》报道，自去年冬季以来，云、贵、川康民变武装纷纷崛起，达数十万众，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动摇了它在云、贵、川康的统治地位。

一月二十九日 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会议之关系，并决定终止其对军调处执行部之关系。军调部之美方人员，将尽速撤退。

一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就关于撤销军调处执行部问题指示董必武、叶剑英。指示说：美国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可表示：（1）美国破坏了协定，我当不受其约束，但愿为一月协定奋斗；（2）赞成美方退出调停，中国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但美国应停止援蒋；（3）要求美军退出中国。

同日 中共中央电叶剑英，对军调处执行部取消以后，中共人员处置问题作出指示。希望争取以解放区救济总会的名义留下少数的同志，在北平坚持工作。二十一日，军调部中共方面委员叶剑英偕参谋长薛子正等二十一人，由北平飞返延安，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到机场迎接。

二月十九日 国民党云南当局，以《新华日报》刊

登有滇南民变的消息为借口查封了《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销处。该报董事吴玉章、社长潘梓年得悉后，遂函当局予以驳斥，要求立即启封，保证正常营业。当局百般刁难，致使该处未能恢复。

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胁迫我驻京、沪、渝三地联络工作人员自动撤离事发表声明。指出：京、沪、渝三地中共联络处之设立与存在，以前为国美两方所请及国方所许可。其任务为与中外各方联络，除非国方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谈判，正式通知中共撤消此等机关，或中共方面自行决定撤回，则决无取消之理。如果国方既不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还要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自应由国方负责。南京局得悉国民党要赶我党机关和封闭《新华日报》后，即由童小鹏电话通知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要注意准备。

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电董必武、王炳南，指示坚持不自动撤退京、沪、渝的我党联络办事机构。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再电驻京、渝、沪联络办事处，指示一定坚持非赶不走的方针，并抓紧建立秘密据点，其任务主要做调查研究，必要时跟党中央联系。

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致电南京、上海、重庆、香港的董必武、钱之光、吴玉章、张友渔、方方、林平、

对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作重要指示，特别要求吴、张在撤退前，尽可能将此意见转告隐蔽的同志。

同日 京、沪、渝三地国民党卫戍警备机关分别通知驻该地中共办事处，限于三月五日前撤退，并强令《新华日报》停刊，严密监视和强迫集中上述各地中共人员。当日凌晨三点，重庆警备司令部、警察总队、宪兵司令部及国民党特务机关同时出动，包围、袭击中共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曾家岩二十三号（原曾家岩五十号）、春森路三十三号，《新华日报》化龙桥报馆及德兴里营业部、纯阳洞记者站（即采访课），将中共在渝人员二百四十九人软禁在指定的地方，搜查了所有的办公室及宿舍，抢走部份财物，《新华日报》的材料亦被所谓“点交代管”。上午，吴玉章先后向重庆市市长张笃伦、警备司令孙元良提出抗议，并质问是谁的命令，张、孙二人皆答是上司的命令。吴玉章严正声明：我们的驻渝联络办事机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非有你们政府的正式公函，或我党中央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不能撤退，要求撤走军警宪特。张、孙表示转告上方，但坚持不撤包围的人员，诡称是为了“保护”我党同志的安全。此后，我留渝全体同志在吴玉章领导下，同国民党军

警宪特，直接展开了为时一星期的艰苦而尖锐的斗争。

同日 周恩来致电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等并转告方方、林平、章汉夫。对京、沪、渝三地我党代表办事机关撤退前的工作及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了具体指示。电谓：一、顷据蒋方广播渝宁两地均已下逐客令，估计上海必跟着来，剩下解总联络处，为时必不会久。二、蒋此次逐客，系用地方当局出面，不保护安全的形式，但我们须逼其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办法有五：甲、由周电蒋；乙、由董（必武）、王（炳南）在沪宁分别以口头及书面询问吴铁城、吴鼎昌或宋子文，国民党及政府是否知道京渝两地方当局此种行动。如知道，则请其以正式公文通知中央驻京代表董必武，我联络机关自当撤退，但必须限期延长。丙、蒋若对甲、乙两项不答复，我则向中外公布。丁、动员京沪中外记者质询蒋方人员，逼其回答，以明责任。戊、董在撤退前发表谈话，并宣布交涉经过。三、王炳南立即向美方说明经过，交涉撤退所需全部飞机。四、渝方撤退计划已告，如不可能疏散隐蔽，只有全部回延。五、京、沪两处附解总联络处外，可否分别疏散（如钱之光、刘昂等速去香港）、隐蔽（刘恕速隐蔽经商），凡无法疏散隐蔽者，均撤延。一切均请董依情

况决定。六、解总人员将来撤退，应要求联总行总由海路送烟台或其他口岸。当日，周恩来就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其全部工作人员于三月五日前撤退事，致电蒋介石，提出质询和抗议。并指出，为判明谈判破裂的责任与手续起见，要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须延长撤退时限至三月底。

三月一日 《新华日报》停止出版。这份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至今日被迫停刊为止，坚持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出版发行了九年零四十九天。

同日 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至曾家岩会见吴玉章，送来董必武打给吴玉章的电报，告知我党中央已同意留渝人员撤退。布德说，美国将在三月五、六两日派出飞机共两架，送中共人员回延，吴玉章坚持要求再增派四架。至四日，国民党和美方表示同意增派飞机将我在渝蓉两地之人员全部送回延安。

三月二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就蒋介石强迫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事发表声明。指出：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蒋介石

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同日 吴玉章、张友渔先后将《新华日报》馆的经理于刚、总编辑熊复和营业部刘瞻找到曾家岩，详细听取了关于国民党反动派包围查封《新华日报》几个地方的情况，研讨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及各方面的安排。吴玉章、张友渔说，大家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和高尚的人格，渝、蓉、昆三地的三百多人要团结一致，不怕压迫，不怕牺牲，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三月三日 董必武由上海抵达南京，往访张治中、张群，为我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问题进行交涉。

三月四日 《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的同志抵达重庆。

三月五日 董必武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二十余人。董必武就国民党逼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事对记者发表了谈话，并表示：盼能与诸位重晤于南京。

同日 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及在沪《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十三人，在国民党军警严密监视下，乘车至南京。中共代表团房产、汽车、图书、家俱交民盟代管。

三月六日 吴玉章、张友渔、熊复、于刚、李亚

群、漆鲁鱼等在曾家岩二十三号举行会议，最后商定撤退人员的分批名单及有关事项。

三月七日 中共驻京、沪人员在董必武的率领下由南京飞回延安。中共留渝、蓉两地（昆明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因阻尚未到渝）公开工作的全体同志（包括《新华日报》报丁、报童），自即日起，三日内先后乘飞机返回延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张友渔于八日抵延。至九日为止，除去由伍云甫任代表的解放区救济总会继续留沪外，中国共产党驻国民党区的谈判联络机关及《新华日报》人员全部撤走。国共两党间的和谈大门终由蒋介石国民党全部关闭。

为了适应全面破裂后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成立了城工部，周恩来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中央城工部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继续全面领导着国民党统治区我地下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解放斗争。国统区的革命斗争不仅没有因我党的公开机关被迫撤走而停止，反而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愈来愈高涨，很快形成了一条强大战线——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后 记

这本南方局大事记，是以红岩革命纪念馆提供的初稿为基础，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重庆等省市党史工作部门共同协作编写的。

《大事记》的编写，是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在编辑方法上，主要是：（一）按编年史的体例，以时间为序，同时也对有些事件和问题，适当集中叙述。（二）反映的时间范围，主要从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立南方局开始，到一九四六年中共代表团迁南京，设立南京局为止。为了前后衔接，对“七七”抗战以后的历史背景作了一些交待；对一九四六年四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段的情况，另拟《中共四川省委大事记》，作为附录。（三）主要表述南方局直接进行的活动。为了把背景交待清楚，对党中央的有关重大决定，以及敌友两方的重要活动也适当表述。地方党组织的活

动，表述到所属省特委一级的组织变化和重大事件。

(四)中共代表、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的主要活动，也作为《大事记》的重要表述内容。

这本《大事记》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我们掌握的部分文献资料，当时的报刊记载和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各有关省市提供的资料。由于南方局进行的大量活动是秘密工作，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又处于地下状态，原始文献和有关资料很少保存，加之编者水平有限，因此，《大事记》所反映的内容，难免有不够全面，不尽准确之处。希望当年参加实际斗争的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批评，指正。

《大事记》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出版社、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单位的指导、支持与帮助，谨此致谢。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南方局党史研究室和红岩革命纪念馆资料室的同志参加了《大事记》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执笔者王明湘。

